



引用格式:李琳. 习近平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J]. 郑州轻工业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6,17(3):1-7.

中图分类号:A81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9/j.issn.1009-3729.2016.03.001

文章编号:1009-3729(2016)03-0001-07

习近平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

Xi Jinping and the popularity of Marxist

李琳

LI Lin

郑州轻工业学院 政法学院, 河南 郑州 450002

摘要:十八大以来,围绕着治国理政这个主题,立足于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习近平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讲话。这些讲话立足中国现实,始终坚持人民群众利益至上,构建起一套具有浓郁生活气息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习近平系列重要讲话始终贯穿着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包括维护人民群众利益的价值立场、追求共产主义的社会理想、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的思想理念等。不仅如此,习近平还在实践层面给予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以示范引导:以人民大众为对象,推进马克思主义走向人民;以人民利益为导向,推动马克思主义走进人民;以人民喜闻乐见的形式,推进马克思主义贴近人民。具体表现为:推动了全国范围内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习和运用;建构了具有生活气息的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增强了我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自觉和理论自信。

关键词:

习近平;
治国理政;
马克思主义大众化;
话语体系

收稿日期:2016-03-02

基金项目:河南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项目(2015-SZK-002);河南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项目(2016-GH-178)

作者简介:李琳(1964—),女,河南省信阳市人,郑州轻工业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中共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着“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篇大文章继续写精彩”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讲话。讲话坚持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回答当前社会现实问题;讲话立足中国传统优秀文化,借鉴世界文明成果,用老百姓喜闻乐见的方式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展现中国形象;讲话充满了亲和力、感染力、号召力,得到了人民群众的认同,拉近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人民大众之间的距离,为人民群众进一步认识和运用马克思主义作出了表率。

学界对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进行了深入研究,呈现出百花齐放的研究态势,形成了一批有分量的研究成果。但是,目前的研究成果要么分析习近平讲话的语言风格、思维方式等如何体现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要么探讨中国梦、“四个全面”等具体内涵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关系,要么仅从工具的角度探讨如何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与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之间是什么关系?习近平总书记是如何推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对于这些重要问题,目前学界缺乏深入探讨。鉴于此,本文拟在对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与马克思主义理论之共性进行分析的基础上,探究习近平对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实践推动和新贡献,以期为推动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的普及提供一定的借鉴。

一、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与马克思主义理论之间的共性分析

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够被中国人民所接受,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这一科学理论具有普遍的适用性。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之所以能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是因为这两者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共性。

1. 关注人民利益这一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价值追求,是习近平系列重要讲话的基本立场

“理论在一个国家的实现程度,总是决定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程度。”^{[1]12}而理论的实现程度则取决于两个基本条件:一是理论的科学性,即理论是否揭示了客观规律;二是理论的彻底性,即理论是否被人民所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之所以能够不断扩大,其根本原因在于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马克思主义揭示了客观世界的本质及其规律,为无产阶级和全人类解放提供了世界观和方法论指导,是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改造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但科学理论与人民的认可、接受并非简单的正相关关系。理论不会因为其是科学就自然而然地被广大人民群众所接受,科学理论要想被人们所接受,必须满足人们的利益诉求。“思想一旦离开了利益,就一定会使自己出丑。”^{[1]286-287}因此,理论能否被人民群众接受以及其被接受的程度,取决于理论能否给人民带来利益以及利益的实现程度,任何忽视人民利益的思想都是空洞的、虚假的宣传。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英国高教会派宁愿饶恕对它三十九条信纲的三十八条信纲进行攻击,而不饶恕对它现金收入的三十九分之一进行的攻击。同传统的财产关系相比,无神论本身是一个很小的过失。”^[2]由此足见,利益之争,古今中外概莫能外。

习近平总书记非常关注人民的利益,始终强调我们党来自于人民、根植于人民、服务于人民,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政党,让人民过上幸福的日子是我们党的奋斗目标。2012年11月,习近平当选总书记时就通过中外记者向世界庄严承诺:“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3]3}2013年3月,习近平当选国家主席时再次承诺:“我们要不断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使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在经济社会不断发展的基础

上,朝着共同富裕方向稳步前进。”^{[3]42}这些充分显示:努力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关心人民疾苦,为人民谋利益,是我们党执政的动力源,也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动力源。

2. 实现共产主义这一马克思主义的崇高社会理想,是习近平系列重要讲话所凸显的奋斗目标

唯物史观揭示了人类社会从低级向高级发展的一般规律,剩余价值学说揭示了资本主义必然被社会主义所代替的特殊规律。由此得出结论:“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一个人的自由发展将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4]马克思主义为人们指明了未来社会发展的方向、原则和基本特征,即未来社会将是一个物质财富极大丰富、人们精神境界极大提高、每个人自由而全面发展、“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社会^[5]。马克思主义所追求的这一社会理想反映了人类共同的期盼,也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执政理念。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凸显了这一奋斗目标。

中华民族是一个为了实现美好理想而不断奋斗的民族,中国共产党作为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的无产阶级政党,其奋斗的最终目标是实现共产主义。习近平总书记非常强调理想信念的作用,要求共产党员要有坚定远大的理想,指出“革命理想高于天”。习近平多次强调,“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念,是共产党人的政治灵魂,是共产党人经受任何考验的精神支柱”^{[3]23}。现阶段,党根据时代特征和社会发展实际,制定出长远性与阶段性相结合、坚定性与灵活性相结合的共同理想——建立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并立足国情,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具体化为“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这些充分反映了人民群众的心声,体现了马克思

主义社会理想与现阶段中国实际的社会追求之间的融合。

3. 理论与实践相统一这一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特征,是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的精神实质

马克思主义不是脱离实际的经院哲学,而是适应工人运动的需要、为无产阶级和人类解放服务的科学理论。马克思运用唯物史观揭示了人类社会从低级到高级的更替过程,并以此来剖析资本主义社会,揭露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罪恶,论证了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必然性和合理性。但马克思主义不是书斋里的学问。所以马克思离开书房,积极参加工人运动,毕生致力于人类解放事业。马克思强调,认识世界的目的是指导实践、改造世界。“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1]502}实践产生理论,理论又指导实践,并在实践中不断推动认识的深入,构成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核心。因此,马克思主义又称为实践唯物主义,实践的观点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首要的基本的观点。

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充分体现着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精神实质:坚持“摸着石头过河和顶层设计相结合”的改革路径;践行“空谈误国、实干兴邦”的实践观,即注重理论与实践相结合,通过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反复过程获得真知;注重调查研究,不断收集群众的意见,将群众在实践中的真知灼见上升为国家政策,并不断接受实践检验……这种精神和风格在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报告的起草过程中表现得极为突出。文件起草组成立以来,在将近7个月的时间里,广泛征求意见,开展专题论证,进行调查研究,反复讨论修改,先后征求过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中央政治局,党内老同志、民主党派中央等部门和人员的意见,并将征求意见稿下发党内一定范围征求意见,最后形

成共识,成为国家施政方针。

二、习近平对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实践推动

针对时代发展的特点,根据新阶段实践的需要,习近平不断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做出科学阐明,在“对谁说”“说什么”“怎样说”等方面进行了新的探索,以人民大众为服务和话语对象,以人民利益为导向,以大众喜闻乐见的形式,进一步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

1. 以人民大众为服务和话语对象推进马克思主义走向人民

“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而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1]11}“人”是马克思主义的核心概念,马克思主义非常注重对人的实践活动和实践经验进行科学总结,并明确将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作为自己的目标。因此,马克思主义能够被广大人民群众所接受和掌握,人民理应成为受众的主体,成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接受者和认同者。“历史活动是群众的活动,随着历史活动的深入,必将是群众队伍的扩大。”^{[1]297}因此,必须在实践中将马克思主义与广大人民群众有机结合起来,否则,马克思主义就会丧失生命力。

“人民群众”是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的核心词和关键词,其讲话始终围绕“人民”二字展开,在“为了谁”“依靠谁”等问题上处处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人民群众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实践者,理所当然地成为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的常见语。在当选为党的总书记时,习近平就明确指出:“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群众才是真正的英雄,人民群众是我们的力量源泉。”^{[3]5}这充分体现了一位马克思主义者的人民立场,即在实践中始终充分发挥人民主人翁

作用,保障人民当家作主的权益。

但“人民”并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作为代表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中国共产党必须了解人民所需、所想,不仅要了解人民中不同群体的共同渴求,也要了解不同群体的具体渴求;既要代表人民群众的整体利益,也要满足不同群体的利益。只有这样,党才能应对不同群体提出的不同要求,调动各个群体的积极性,为社会主义建设贡献力量。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历史博物馆参观“复兴之路”展览时,基于国家数千年来的历史变迁,提出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1]36}习近平在当选为国家主席时强调:中国梦就是人民群众的幸福梦,“中国梦归根到底是人民的梦”^{[3]40}。在“五四”青年节同优秀青年代表座谈时,习近平强调,中国梦是代表青年的梦,“中国梦是国家的、民族的,也是每一个中国人的。中国梦是我们的,更是你们青年一代的,青少年要敢于有梦、勇于追梦、勤于圆梦”^{[3]53}。在会见国民党荣誉主席连战时,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梦是民族共同的梦,“两岸同胞要携手同心,共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3]240}。这些讲话充分体现了习近平一贯坚持人民立场并注重对之进行科学表达的风格,让不同群体都感觉到自己的存在、明白自己的责任,争取其理解与融入,从而充分发挥其主人翁精神。

2. 以人民利益为导向推动马克思主义走进人民

马克思主义的旺盛生命力源于其人民立场,即一切为了人民、坚决维护人民的利益。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起来的中国共产党是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利益的忠实代表,她没有任何自己的特殊利益。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始终牢记和践行自己的宗旨,把时代的需要、人民的

期待时刻放在心上,因而能取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实现国家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使中国的综合国力、国际影响力、人民生活水平都跃上了新台阶。当前,中国正处在一个极其难得的历史机遇期,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经济总量居世界第二位,成为继美国之后第二个 GDP 上 10 万亿的国家;人民生活幸福安康,全国上下正满怀信心到 2020 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这种成功既是中国人民努力奋斗的结果,也是中国共产党正确领导的必然反映,更是作为指导思想的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的最好证明。

当然,中国共产党在代表人民利益的过程中,也有个别动机不纯的党员之行为与党的宗旨不相符合,影响了人民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和对社会主义的信心。人民群众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不仅是看党说了什么,更是看党做了什么。党围绕干部群众现实生活中遇到的热点问题和迫切需要,坚决维护人民群众利益,敢于同侵害人民群众利益的行为作斗争。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针对思想僵化、利益固化的现象,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发展路径;根据社会治理现代化的要求,提出全面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针对个别党员的行为违背马克思主义的要求,同党的理论不相符合的实际,尤其是腐败现象,提出全面从严治党的要求。这些正是以人民利益为导向在推动马克思主义走进人民。

3. 以大众喜闻乐见的形式推进马克思主义贴近人民

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只有有效地传递给人民群众,才能得到贯彻执行,否则就会是仅仅停留在纸上的红头文件,无法化为群众的自觉行动,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来说也是如此。必须用老百姓喜闻乐见的形式阐释马克思主义,让老百姓自觉地接受马克思主义。“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

息,而代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6] 习近平对此非常明确。他坚持将复杂的社会问题简单化,将高深的理论问题通俗化,以百姓易懂的形式推动当代马克思主义大众化。

首先,在形式上,习近平用形象化比喻、网络流行语来推动当代马克思主义理论具体化。例如,在谈到工作方法时,他要求先熟悉群众、了解群众,指出,“如果不懂群众语言、不了解群众疾苦、不熟知群众需求,就难以掌握正确的工作方法,难以发挥应有的作用,正所谓张飞买豆腐——人强货不硬”^[7],认为人民的工作状态是“蛮拼的”,提出要努力工作取得成绩的人们由衷地“点赞”。这些做法避免了官话套话,运用生活的语言拉近了党与人民之间的距离,语言风格为之一新。

其次,在内容上,习近平借用中国传统优秀文化和世界文明成果来阐明我国的路线、方针、政策,有效地推动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通俗化。例如,用“宰相必起于州部,猛将必发于卒伍”来说明我国的干部遴选机制是一级级锻炼培养出来的,干部必须有丰富的基层经历;用“雄关漫道真如铁”来形容昨天的苦难,用“人间正道是沧桑”来比喻今天的变迁,用“长风破浪会有时”来展现明天的美好;引用英国哲学家弗兰西斯·培根的话“不公正的审判则毁坏了法律——好比污染了水源”^[8]⁷¹⁸,强调执法机关严格执法、公正司法的重要性;在谈到坚定社会主义理想信念认识时,引用车尔尼雪夫斯基的话:“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证明,无论会遇到什么样的曲折,历史都总是按照自己的规律向前发展,没有任何力量能够阻挡历史前进的车轮。”^[3]²⁷³ 这些做法赋予了传统文化以新的时代内涵,为人类文明增添了中国特色。

最后,习近平注重用老百姓的大白话和身边的故事来推动马克思主义理论生活化。例

如,在讲到改革的决心时,用英语语法的完成时、进行时来表达,提出“改革开放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3]67}。在谈到腐败问题时,直接表达出自己的愤怒情感:“我不满意,甚至愤怒的是,一些扶贫款项被各级截留,移作他用,扶贫款项移作他用,就像救灾款项移作他用一样,都是犯罪行为。”习近平《在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讲述了自己在“三年自然灾害”“文化大革命”期间饿肚子的记忆,强调粮食安全的重要性:“对我这个年龄的人来说,使用粮票就像是昨天的事情。我们这一代人或多或少都有吃不饱、饿肚子的记忆。”^{[8]659}通过这些生动故事,习近平让人们认识到马克思主义理论并非高深莫测,并非专家学者的专利,并非远离生活,而是与生活密切相关。他同时强调:领导干部也是普通群众的一员,和群众一样对国家发展进步感到兴奋、对社会恶习气愤、对苦难记忆深刻,与国家人民同甘苦共患难。这些讲话拉近了中国共产党与人民群众的距离,有利于在全社会形成和凝聚共识。

三、习近平对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新贡献

1. 推动全国范围内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习和运用

马克思主义作为人类文明成果,必须“掌握群众”,转化为改造世界的物质力量,“这种意识只能从外面灌输进去”^[9]。这就要求领导干部尤其是高级领导干部要重视学习、理解、掌握马克思主义。作为中国共产党的总书记,习近平对此作了很好的表率。2013年12月3日、2015年1月23日,习近平分别围绕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带领中央政治局进行集体学习。时隔1年零2个月,中央政治局两次集中学习马克思主义,充分显示了习近平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视程度;2013年1月5日,

习近平又在新进中央委员会委员、候补委员学习贯彻中共十八大精神研讨班上,专门讲授世界社会主义五百年发展史,以坚定全党对马克思主义的理想信念。习近平始终强调“原原本本学习和研读经典著作,努力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自己的看家本领”。早在2011年5月14日,在出席中央党校开学典礼时,习近平就专门围绕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发表了长篇讲话,特别强调:“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蕴含和集中体现着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本源和基础。”2012年6月19日,习近平到中国人民大学考察《资本论》教学与研究中心,要求“精读马克思主义经典的代表性著作,追本溯源,把握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为进一步推动马克思主义理论在全国范围内的学习和运用,习近平总书记号召全党开展了一系列学习教育活动:2014年,在党员领导干部中开展了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2015年,在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中开展了“三严三实”专题教育活动;2016年,在全体党员中开展了“两学一做”学习教育。这一系列学习教育活动,既是党要管党、从严治党、提高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的重要举措,也是推动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和运用的战略部署;通过这些学习教育活动,不仅党员干部受到了马克思主义理想信念教育,而且人民群众也感受到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魅力,有利于提高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自信、道路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总之,习近平总书记坚信马克思主义,带头学习马克思主义,强调学以致用,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方法指导我国改革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进一步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在全国范围内的学习和运用。

2. 建构具有生活气息的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

中共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

中央紧紧围绕“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等主题，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进行了深入探索，不断深化认识、总结经验，实现了理论创新与实践创新的良性互动，发展了21世纪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构建了具有时代特点和生活气息、贴近人民大众的话语体系。例如，在远大理想信念上，提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概念，指出理想信念就是共产党员精神上的“钙”，缺乏就会得“软骨病”；在深化改革上，强调要有“钉钉子”精神、有“踏石留印、抓铁有痕”的决心；在反腐败问题上，提出“老虎、苍蝇一起打”的零容忍态度和“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的制度目标；在对外关系上，阐明和平合作发展共赢的外交政策，提出怎样圆中国梦、美国梦、亚洲梦和世界梦等。这些论语既具有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内涵，又是一些通俗的概念，具有极强的亲和力和感染力，易于掌握且便于执行，更容易将科学理论转化为改造世界的物质力量。

3. 增强我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自觉和理论自信

理论自觉是理论成熟的标志，理论成熟是理论自信、民族自信的前提。长期以来，西方凭借其强大的科技和经济实力，到处推行文化霸权，强迫世界各国接受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话语体系，形成了美国文化中心主义，人们因此深陷资产阶级思维陷阱，也逐渐习惯了这套话语体系。甚至有不少人竟然认为接受美国话语体系，就是与世界先进文明接轨，对之拒绝就是离开人类文明大道，就是逆流而动。这种错误认识严重影响了民族自信心和自尊心，严重影响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

伴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推进，我国的综合国力大幅提升。我们必须改变这种话语权不平

等现象，创造出属于中华民族自己的理论话语体系，决不能有媚外和奴性思想。我们不能妄自尊大，更不能妄自菲薄。讲清楚中国特色，一定要“着力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3]156}。习近平总书记及时总结新时期我国现代化建设中的特色经验，并将其上升到理论高度，形成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向世界传递了中国声音，展示了中国道路，提高了民族自信心、自豪感。随着中国道路的成功，世界上对中国道路更加认可，中国模式具有越来越大的影响力；与之相应，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力也将越来越大，中国人民对未来应更加充满信心，对社会主义道路应更加坚定，对马克思主义应更加坚信。

参考文献：

- [1]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C].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 [2]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C].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10.
- [3]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国外文局.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M]. 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
- [4]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C].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53.
- [5]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C].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436.
- [6] 毛泽东选集：第2卷[C].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534.
- [7] 习近平. 在中央政治局第四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N]. 人民日报，2013-02-23(01).
- [8] 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
- [9] 列宁选集：第1卷[C].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317.



引用格式:张珍. 马克思主义系统自然观的生态文明思想探析[J]. 郑州轻工业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17(3):8-13.

中图分类号:A81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9/j.issn.1009-3729.2016.03.002

文章编号:1009-3729(2016)03-0008-06

马克思主义系统自然观的生态文明思想探析

Exploring for the thought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in Marxist system views of nature

张珍

ZHANG Zhen

郑州轻工业学院 思政部, 河南 郑州 450002

摘要:马克思主义是系统论的理论先导,为当代系统论提供了不可或缺的哲学基础。马克思主义系统自然观具有层级整体性、自组织突现性、动态开放性和跨层次因果性等特征。这些基本特性蕴含着丰富的生态文明意蕴:层级整体性与生态环境本身具有的层次性、整体性相契合;自组织突现性揭示了自然界生态系统的必然性及其运行过程中规则的重要性;动态开放性反映了生态环境自身的固有属性亦即它的开放属性及其运行机制;跨层次因果性深刻凸显了自然界自身的复杂因果关系及其辩证属性。马克思主义系统自然观为当代中国的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重要启示:把握层级整体性,统筹兼顾地促进多种文明形态协调可持续发展;把握自组织突现性,做好顶层设计,制定完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把握动态开放性,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实现经济与社会、环境协调发展;把握跨层次因果性,培育生态文化,提升建设美丽中国的软实力。

关键词:

马克思主义;
系统自然观;
生态文明

收稿日期:2015-08-07

基金项目:河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2013BKSO06);河南省科技厅软科学研究计划项目(132400410198);河南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项目(2013-DJ-23);郑州轻工业学院博士科研基金资助项目(000292);河南省科技厅软科学研究计划项目(152400410027),河南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2015-SZK-013)

作者简介:张珍(1979—),女,河南省淇县人,郑州轻工业学院讲师,博士,主要研究方向:系统科学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

中共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了五大发展理念,其中,“绿色发展”是对我国生态文明建设提出的新要求。随着全球性生态环境问题的凸显和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发展的迫切要求,马克思主义自然观的研究已成为当前学界的一个热点。作为马克思主义自然观的现代形态,系统自然观本质上是一种整体主义的自然观。马克思主义系统自然观蕴含着丰富的生态文明理念,深入分析马克思主义系统自然观的特征及其内涵,能够为我国生态文明建设提供方法论指导,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一、马克思主义自然观的系统论特征

系统论与马克思主义哲学有着内在的一致性。马克思主义哲学是系统论的前提和基础,系统理论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继承和发展。钱学森曾指出:“最终到了马克思、恩格斯,建立了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个时候又最后综合起来,变成了现代的科学的系统思想。”^[1]系统科学特别是复杂系统科学及其哲学的兴起与发展,进一步拓展了马克思主义的自然观,使人类对自然界的认识在经历了古代朴素自然观、中世纪神学自然观、近代机械自然观之后,形成了以联系和发展为两大特征、突显关系性和整体性的马克思主义的系统自然观。对此,有学者指出,“辩证唯物主义自然观在形成以后,被19世纪末物理学的新发现(X射线、放射性、核电子)和20世纪初相对论和量子力学等现代物理学证实和发展,被20世纪60年代起兴起的复杂性系统科学丰富和发展”^[2]。

马克思主义自然观具有突出的整体主义特征,可以将其发展历程分为前后相继的两个阶段:一是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辩证唯物主义自然观;二是马克思主义系统自然观。辩证唯物主义自然观是在当时形而上学机械论、还原论

自然观盛行的历史时期形成的,重视联系和发展、结构和演化,并指明元素与元素之间是一种既对立又统一的矛盾关系,正是这种对立统一使事物获得发展变化的初始动力,而后事物遵循质量互变和否定之否定规律运动、变化、发展。马克思主义系统自然观则进一步探究元素之间的关联为何、如何会使整体突现生成部分所不具备的性质与功能,其发展经历了“三次浪潮”:一是标志着系统科学形成的控制论、信息论、一般系统论;二是以自组织为主要特征的耗散结构理论、协同学、超循环理论;三是代表复杂系统科学兴起的混沌、分形、复杂适应系统理论(CAS)。马克思主义系统自然观,在机理研究方面引入了突现、层次、通讯、控制、下向因果关系等概念体系,在机制探索方面涌现出自组织、元胞自动机模拟等理论与研究方法。

系统论与唯物辩证法之间存在着密切联系。“系统论是现代科学的产物,但在系统论的创立过程中,马克思和黑格尔的辩证法思想起过重大作用。所以,系统论的创立者贝塔朗菲把马克思和黑格尔的辩证法作为系统论的理论先驱。”^[3]系统运动的第一次浪潮从哲学层面确立了系统论,即通过通讯与控制来研究元素之间关系的整体主义思想,这与唯物辩证法所揭示的事物之间存在普遍联系和事物是永恒发展的观念高度一致;第二、三次浪潮对自组织条件、机制、演化方向等展开探索,自组织概念强调的自发性与马克思主义的矛盾概念“可通约”;自组织突现历时形成的机理揭示是对质量互变规律的进一步解释;混沌边缘创生新的自组织与否定之否定规律吻合。^[4]

因此,可以说,马克思主义是系统论的理论先驱,系统论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自然观的新发展,马克思主义自然观具有明确的系统论特征。

二、马克思主义系统自然观的基本特征

以上可见,马克思主义系统自然观是马克

思主义理论与系统科学特别是复杂性科学相结合的产物,是具有时代特色的、与时俱进的马克思主义自然观。从系统科学发展的三次浪潮及其所产生的概念和思想体系出发,可以总结出马克思主义系统自然观的基本特征,即层级整体性、自组织突现性、动态开放性和跨层次因果性。

1. 层级整体性

系统论首先表达和倡导的是整体主义思想,这也是贝塔朗菲创立一般系统论的独到之处。马克思主义系统自然观的首要特征就是整体性,即整体大于组成它的各个部分之和的非加和性。当然,当代复杂系统科学的发展显示,这种整体性不同于古代的不可拆分的强整体性,也不同于近代的为部分之和的弱整体性。这是一种具有中间道路特征的、以层次为基本单元的层级整体性。“层级”这一概念在系统科学中体现的是一种整体—部分关系。为了与日常语言的“系统”一词区分开来,阿瑟·凯斯特勒、彼得·切克兰德、肯·韦尔伯等学者将这种“既是一个整体但相对于更大的整体来说又是一个部分”的层级称为“整体子”^[5]。也就是说层级整体性既强调任何系统都具有其组成部分所不具备的新的性质和功能,又主张每个系统都是更高层次上、更为宏观的系统的组成部分。

马克思主义系统自然观的层级整体性与生态文明本身所具有的层次性、整体性相契合,前者蕴含着看待后者的层级整体性思维。广义生态文明是指人类遵循人、自然、社会和谐发展的客观规律,改造世界而取得的物质与精神成果的总和。^[6]生态文明具有明显的层次性,至少涉及生态系统、文明系统、全球循环系统三个层次。其中,生态系统是生态文明系统的基础层次,是生态文明各要素相互作用的场所;由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等构成的文明系统是

生态文明系统的高一层次,随着科技的进步和社会的发展,其对生态的影响日益增强;全球循环系统是生态文明系统的更高层次,国际交往的增强使得国家间相互的生态影响也越来越突出,一国的生态环境会影响全球的气候变化,因而全球循环系统是处于更宏观层次上的生态文明系统,是生态文明系统的外部环境。这三个层次的生态文明系统既各自独立存在,又彼此密切相关,形成多层次的生态整体。

2. 自组织突现性

系统科学的层级整体性主要通过其核心概念“突现”来表达,指的是系统内部要素之间的协同作用会自组织生成组成部分所不具备的、新颖的整体性质,这种整体有其部分所没有的新性质即突现性^[7]。自英国突现主义以降,突现概念始终体现为一种可分但又不可彻底还原的、具有中间道路特征的整体性,即前文所归纳的“层级整体性”。当代复杂系统科学对突现生成的动力学机理的研究表明,整体突现的形成是系统在一定环境条件下自发地、依靠内部相互作用而不是外部指令达到的。这种低层次客体通过局域相互作用而生成高层次结构、功能、有序模式的自发过程被称为自组织^[8],也可以简单地理解为无需借助外力作用的自我组织。自组织突现性是马克思主义系统自然观的第二大特征。其中,突现是自组织的结果,自组织是突现的形成机制。近年来,计算机模拟等研究方法对突现历时形成机制的探索催生了突现的理论创新,揭示出整体突现现象主要是由系统的内部要素遵循基本规则自组织形成的。“朗顿蚂蚁的模拟”案例显示,虚拟蚂蚁遵循两条规则运动,在迭代运行了1万个时步后,开始沿与网格空间成45°角的方向修筑一条笔直的高速公路,说明“元胞自动机的规则虽然极简单,却能产生出超乎想象的复杂行为。……从哲学的观点看,基本法则是非常重要的”^[9]。

自组织突现性揭示了复杂系统突现形成的必然性和自组织过程中规则的重要性。第一,系统内部要素相互作用必然会突现形成某种整体结果。在远离平衡态的开放系统中,随机涨落会在临界点被放大进而形成巨涨落,使系统发生突变而生成新的有序结构。因此,生态系统作为典型的复杂系统,因其本身具有自组织的特性,生态环境的微小因素一旦遭到破坏,它们之间复杂的相互作用就会在关节点被放大,将会造成小原因导致大结果的自然和社会恶果,而且这些恶果的破坏程度和形成速度远超我们的想象。第二,自组织突现的结果可确定但不可预测,关键在于自组织的过程遵循什么规则。与生态系统这一子系统相比,生态文明融入了人的因素,是人与自然、社会互动的结果,因而必须通过法律和政策来规范、引导和约束人类活动。只有这样,才能使生态文明的发展遵循合理的运行机制,从而在长期的内部相互作用中突现生成良好的社会效应。

3. 动态开放性

系统运动的第二次浪潮发生在不同的学科领域,学者们对不同系统由无序走向有序的自组织过程进行探索,进而从哲学层面揭示了具有一般意义的系统自组织的条件与机理。自组织的条件是远离平衡态的开放系统,因而所有的自组织突现系统都具有动态开放性特征。封闭系统的熵或无序度趋于无限增大,而开放系统由于不断从环境吸收物质、能量等各种负熵,使系统及其元素处于动态循环中,而后以低能高熵的形式输出,这样可以减缓熵增,远离热平衡态。非平衡是有序之源,这种在不同系统中以不同形式出现的“新陈代谢”就是自组织的条件。远离平衡态的开放系统通过涨落而自组织突现,使系统由原来的无序状态突现形成时间、空间或功能上的某种稳定的有序结构。另外,这种新的有序结构只有持续地与环境进行

物质、能量和信息的交换,才能使系统因引入负熵流而抵抗外界干扰从而维持自身的稳定性。因此,马克思主义系统自然观的第三大特征是动态开放性,即系统动态地维持某种活的有序结构。

生态文明的动态开放性特征十分明显。首先,作为其子系统的生态系统是典型的复杂系统,其稳定性的维系需要不断从外部输入物质或能量,使生态系统的结构与功能保持某种良性循环与动态平衡,否则便会有崩溃的危险,所谓“流水不腐,户枢不蠹”说的就是这种动态开放性。其次,生态文明系统是在持续保持对同层次其他文明系统和更为宏观的全球循环系统的开放性中维系自身生机与活力的,它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系统之间时刻发生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存在物质、能量、信息的交换,因此生态文明不可能孤立地通过改变生态结构而实现,需要借助多个系统的协同作用才能达到。

4. 跨层次因果性

由于自组织突现生成的新系统与其组成部分处于不同的层次之上,因而,同层次系统与跨层次系统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便成为系统哲学研究的又一个突出问题。当前理论研究结果的主流观点认为,层次之间的因果关系包含上向、下向和同层三种,层次之间、系统之间基于这三种因果关系而形成复杂的因果关系网络。其中,下向因果关系的存在被视为系统突现的一个重要依据,突现论与还原论争论的一个焦点就是高层次整体对低层次组成部分有没有下向因果关系。下向因果关系最早由唐纳德·坎贝尔提出,指的是“低层次的所有过程都受到高层次规律的约束,并遵照这些规律行事”^[10]。

生态文明的层次整体性决定了其各层次系统之间会形成复杂的因果关系网络,而层次之间也存在跨层次的因果关系,特别是高层次系

统对生态系统本身有着下向因果关系。惟其如此,文明形态的和谐发展所形成的良性整体效应,会对自然环境系统产生下向约束或下向因果的影响;反之,自然环境系统是否能获得良性发展,会对文明系统产生直接的影响与因果效应。

三、基于马克思主义系统自然观的生态文明建设路径选择

马克思主义系统自然观为我们正确认识和处理好人与自然的关系提供了新的思维方式,以这种具有突现整体主义特征、自组织发展特性和跨层次因果关系的自然观为指导,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应该从以下四个方面着手。

1. 把握层级整体性,统筹兼顾,促进多种文明形态协调可持续发展

马克思主义系统自然观的层级整体性特征,要求采取一种分层次的整体主义视野来审视生态文明建设,既要保持生态系统内部的整体性,又要体现狭义生态文明与其他文明系统之间的整体性,从不同层次入手,有重点地、统筹兼顾地解决问题。首先,生态系统内部要素的协同,要求加大污染治理和环境保护的力度,既要“以提高环境治理为核心,实行最严格的环境保护制度,形成政府、企业、公众共治的环境治理体系”^{[11]26},又要通过科技创新提高防控与治理环境污染的技术水平。其次,文明系统的整体性特质要求统筹兼顾,以实现经济社会的协调可持续发展。广义生态文明的层次性决定了狭义的生态文明建设只有与物质文明融为一体、共同发展,才能发挥其作为子系统的良性功能。

2. 把握自组织突现性,做好顶层设计,制定完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

马克思主义系统自然观的自组织突现性特征说明,发展过程中的规则制定极为重要,要建

设生态文明,必须做好顶层设计,实现规则对行为的良好约束作用。因此,我们一方面要完善立法体系,以可持续发展为出发点,体现群众需求特别是对生态环境的生存需求,“建立健全用能权、用水权、排污权、碳排放权初始分配制度”^{[12]11}等;另一方面要加大执法力度,“实行最严格的环境保护制度”^{[12]11-12},真正实现党的群众路线指导下以人为本的政府管理模式,使生态文明系统的内部规则能够在运行过程中突现,从而生成良好的社会效益和生态效应。

3. 把握动态开放性,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实现经济与社会、环境协调发展

马克思主义系统自然观的动态开放性,对生态系统和狭义生态文明系统的开放性都提出了新要求。目前,我国生态文明建设面临的一个突出问题是:物质文明系统与生态文明系统的发展形成一种“两难困境”:经济的发展似乎必须付出高昂的环境代价,而保护环境、实现生态文明似乎又限制了经济的发展。要解决这种两难困境,必须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将传统的资源依赖型模式转向循环经济发展模式,引导企业节约资源,倡导消费低碳化,从而实现我国经济社会健康可持续发展。

4. 把握跨层次因果性,培育生态文化,提升建设美丽中国的软实力

马克思主义系统自然观的跨层次因果性特征,特别是对下向因果关系的揭示启示我们,培育良好的生态文化对生态文明建设极为重要。作为生态文明更为宏观的环境,生态文化可以助推生态文明建设。目前,我国生态文明建设中的跨层次下向约束效应还没能有效凸显:一方面,我们没能创造出有利于生态文明建设的多样化的文化产品;另一方面,现有的生态文化艺术产品并未进入群众的主流消费,生态文明的理念尚未深入人心,特别是在广大农村,居民消费的主流依然是物质欲望无限膨胀的消费主

义生活方式。因此,我们应完善生态文化培育机制,“加强资源环境国情和生态价值观教育,培养公民环境意识,推动社会形成绿色消费自觉”^{[11]24},助推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的转型。

参考文献:

- [1] 钱学森. 钱学森系统科学思想文选[C]. 北京:中国宇航出版社,2011:82.
- [2] 张明国. 马克思主义自然观概述[J]. 北京化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4):2.
- [3] 陈先达,杨耕. 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112.
- [4] 张珍. 马克思主义理论案例教学探析:基于复杂系统自组织突现的思想[J]. 新乡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4):141.
- [5] 张珍,张华夏. 整体子的本体论理论和认识论功能[J]. 自然辩证法研究,2009(9):27.
- [6] 王玉庆. 生态文明——人与自然和谐之道[J]. 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1):58.
- [7] 颜泽贤,范冬萍,张华夏. 系统科学导论[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98.
- [8] 张华夏. 两种系统思想,两种管理理念[J]. 哲学研究,2007(11):91.
- [9] 肖帕尔,德罗兹. 物理系统元胞自动机模拟[M]. 祝玉学,赵学龙,译. 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3:35.
- [10] AYALA F J, DOBZHANSKY T. Studies in the philosophy of biology:reduction and related problems[C].//CAMPBELL T D. Downward causation in hierachically organized biological systems [M].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74:180.
- [11]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
- [12] 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公报[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



引用格式:李龙强,许建文. 邓小平思想中“科技兴农”战略探讨[J]. 郑州轻工业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17(3):14-21.

中图分类号:A849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9/j.issn.1009-3729.2016.03.003

文章编号:1009-3729(2016)03-0014-07

邓小平思想中“科技兴农”战略探讨

Exploring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revitalizing agriculture strategy of Deng Xiaoping's thought

李龙强, 许建文

LI Long-qiang, XU Jian-wen

西南科技大学政治学院, 四川 绵阳 621010

摘要:1970年代末到1990年代,我国农业发展出现了人口增长、农产品需求增长、耕地减少、人均农业资源占有减少等问题,这一增一减形成了制约中国农业发展的突出矛盾。为破解这些难题,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提出了“科技兴农”战略构想。该构想将制定实施中国农业科技发展战略的必要性提升到了新高度,革新了中国农业科学技术的发展路径,实现了农业科技体制改革与推进农业科技和农业生产发展的有机结合,推进了农业科学技术的运用,使中国农业的发展逐步迈向现代化的道路。

关键词:
邓小平;
科技兴农;
农业现代化

收稿日期:2016-01-10

作者简介:李龙强(1972—),男,山东省莱芜市人,西南科技大学副教授,博士,主要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理论;许建文(1966—),男,四川省射洪县人,西南科技大学教授,主要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理论。

长期以来,中国农业面临着诸多压力。例如,由于人口增长、耕地减少、农产品需求增长而人均农业资源占有量减少,许多地方严重依赖化肥、农药、农膜等石油衍生品,既浪费了大量的资源,也带来了食品安全与环境污染问题;同时,需要较好灌溉条件的农业增产模式过度消耗了水源;一味追求增加耕种面积、提高农产品数量增长的生产模式也破坏了农业生态平衡。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开始强调将农业经济效益与生态效益有机结合,总结农业发展的经验教训;随后开展了农业资源调查和农业区划工作,调整了农业生产和产业结构布局,实施了植树造林、改良土壤、防治水土流失与荒漠化等改善农业生态环境、防治农业污染的政策。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根据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基于科学技术对农业增产的重要性,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提出了“科技兴农”的战略构想,主张调整我国农业科技发展战略,改革农业科研推广体制,提高农民科学文化素质,推进农业科学技术的运用。这些构想蕴含着极其重要的理论创新,在我国农业科研推广政策改革的实践中,推动了农业科技的进步,促进了我国农业的发展。本文拟对邓小平思想中“科技兴农”战略进行探讨,以深化该问题的理论研究,进一步推进我国农业的发展。

一、将制定并实施中国农业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的必要性提升到了新高度

基于对中国农业长期发展的考察,邓小平认为1980年代初期中国农业政策改革的作用是有限的,因为“靠政策只能解决一段时间的问题,农业还要靠科学”^{[1]216}。中国农业的发展还是要依靠农业科学技术的突破,因此必须实行科技兴农战略。根据改革开放后农业生产的新形势,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

体深化了对农业科学技术作用的认识,阐释了在中国实行科技兴农的必要性。

1. 通过对改革开放前中国农业科技发展教训的总结,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认识到革新中国农业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的紧迫性

清末民国时期,现代科技就开始应用于我国农业生产。然而当时中国科学技术基础薄弱,工业化水平和农民识字率较低,无法为中国农业生产提供应有的良种、化肥、农药和技术支撑。新中国成立后,国家采用计划管理手段,强力推进农业科技的发展,农业科技水平取得了显著进步。但由于当时受苏联科技界错误批判遗传学说的影响及领导人农业现代化思想的局限,中国农业科技发展在目标选择上出现过一些失误。1950年代国家确立了以机械化、电气化、水利化和化学化为特征的农业技术路线,到1960—1970年代却变调为片面强调以农业机械化为主要内容的发展战略。另外,僵化的计划管理体制也在实践中使目标与手段错位,导致不少工作上的失误。例如,1950年代,农民把国家配给购买的犁头变为“挂犁”、集体农业组织强行征调劳动力兴修水利工程,不加区别地在各地全面推广农业机械化等。

改革开放前,中国农业科技发展的教训,归结起来,主要表现为:农业科技的投资主体单一,资金全部来源于国家财政拨款、信贷和集体农业组织的高积累,加重了集体农业组织的负担;片面强调种植业的机械化,压缩了对生物技术等其他农业科技的投入,导致农机具生产重复建设,生产成本偏高;按政府计划进行农业科技产品和服务的分配,不能满足千差万别的中国农业生产区的实际需求,集体农业组织丧失了对农业科学技术的选择权和采用先进技术的积极性。

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对

我国农业科技发展历程进行了总结与反思。1962年,邓小平指出,“如何根据各地的不同情况,采用适合的农业机具,长期以来没有很好解决”^[2];国家花了很多钱搞水利建设,但是利用水利设施取得的灌溉效益不理想;不但如此,就连哪个地方的土壤适用哪种化肥,也不甚了了。1975年,邓小平提出要对中国农业科技发展战略进行调整,明确提出“农业现代化不单单是机械化,还包括应用和发展科学技术等”^{[3]28}。1980年4月,中国开始放弃“实现农业机械化”的口号,决定立足国情,遵循经济规律,面向农民需要,以市场为导向,制订并贯彻符合现代农业科技发展趋势的务实的农业技术路线。1983年1月,中央强调中国“农业的技术改造应有自己的特色”^{[4]262},一方面要发扬农业精耕细作、节能低耗、维持生态平衡等传统,另一方面要注重吸收现代技术和先进管理方法。

2. 为满足农业政策改革后农民运用科学技术的需求,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提出对中国农业技术进行有自己特色的改造

中国农业政策改革后,农户变成了农业科技投入的主体和受益者,这一变化带来了农民对农业科技产品与服务需求的变化。作为相对独立的农业经营者,农民在市场取向的改革中,必然通过经济核算,以能否获取经济效益为标准来确定是否和怎样使用农业科学技术,根据人多地少的生产条件、不同的生产力水平和收入水平,权衡农业科技产品的物化劳动成本和活劳动成本,以自主选择农业科技产品。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随着乡镇企业等非农产业的发展和部分农民进城务工经商,农村商品经济迅速发展,农民从事农业劳动的成本增大,农民选择农业科技的积极性逐渐提高。针对农业科学技术需求和农民对待农业科学技术态度的新变化,邓小平曾指出,现在连山沟里

的农民都知道科学技术是生产力,他们从实践中逐渐“懂得了科学技术能够使生产发展起来,使生活富裕起来”^{[5]107}的道理,农民把科技人员看成是帮助自己摆脱贫困的亲兄弟,甚至称他们是“财神爷”。为满足农民运用农业科技的需求,尤其是他们对小型、实用、低廉农机的需求,1983年邓小平强调指出,中国农业的技术改造应有自己的特色,“当前应着重发展小型、多用、质优、价廉的农业机械,因地制宜地改善水利灌溉条件,增加化肥供应,改善氮磷钾比例结构,改良土壤,提高土地利用率和劳动生产率”^{[4]263},以满足农民对农业科技产品需求的新变化。为此,中央决定“小型农田基本建设和服务设施所需要的投资主要依靠农业本身的资金积累和劳动积累”^{[4]264},并鼓励农民个人或合股集资兴办如仓库、公路、小水电等农村基础设施,实行有偿使用制度;同时还允许农民个人或联户购置农副产品加工机具、小型拖拉机和小型机动船,从事生产和运输。

二、革新了中国农业科学技术的发展路径

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清楚地看到:1980年代初期,中国农业取得成效的首要原因虽是实行了农业政策改革,但政策的作用是有限的,且呈衰减趋势;想要增加财政投入又受到国家财力限制,所以就必须在农业科学技术方面寻求较大突破。因此,我国党和政府充分借鉴改革开放前中国农业科技发展的经验教训,面对农业经营政策改革后农业科技推广的新形势、新问题,结合当时中国农业科技发展的现状,推动了中国农业科技发展路径的革新。

首要的一个方面就是走传统农业技术与现代科技相结合的现代农业发展之路。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立足于我国国

情,根据中国人多地少的农业生产条件,尤其是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农民生产规模呈现原子化的现状,强调中国农业必须从实际出发,选择具有中国特色的、适应劳动密集型生产的传统农业技术与现代科技相结合的农业发展路径,依靠科技进步,走集约化经营的道路:把现代科学技术与中国传统农业精耕细作、土地利用率高的优良传统结合起来,使其共同发挥作用。也就是说,中国农业科学技术的发展要围绕提高农业产量这一中心目标,充分利用有限的耕地资源,缩短生产周期,拓展农业生产新空间,提高农产品产量,降低农业生产成本。邓小平针对计划经济时期依靠行政资源、拼人力拼投资轻科技的弊端,强调国家要从人力、财力、物力等方面提供各种条件,向农民提供实用、低廉的技术,以保证科技兴农战略的实施。^{[5]23}

1982年以后,邓小平重点思考了中国农业增产的方法。早在1975年,在谈到中国农业落后状况时邓小平就指出:“粮食产量按全国人口平均每人只有六百零九斤,储备粮也不多”^{[3]4},他对中国实行以机械化为标志的农业技术路线提出了批评,“农业现代化不单单是机械化,还包括应用和发展科学技术等”^{[3]28}。他强调指出,发展农业必须靠科学,“中国要把农业搞上去,就必须使用高效肥料”^{[1]216}。邓小平将肥料问题看得非常重要,提出要尽快解决肥料问题。他认为,种子和肥料特别是复合肥料如果搞得好的话,我国农业发展的潜力将是巨大的,农业增产的前景将会大好。邓小平因此要求国家农业规划要“从增加肥料上,从改良种子上,从搞好农田基本建设上,从防治病虫害上,从改进管理上,以及其他手段上,能够做些什么、增产多少都要有计算”^{[5]23}。1988年9月,根据世界农业科技发展趋势,结合中国农业增产的目标,邓小平高瞻远瞩地指出,农业的未来出路将落脚在生物工程等尖端技术方面,中

国必须要在农业高科技领域占据一席之地。^{[5]275}这一思想非常具有预见性和前瞻性,即便是在科技日新月异的今天,仍然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同期,中央要求各地不可放松对有利于提高粮食单产与总产量的技术措施的推广应用,强调我国的农业技术改造一定要符合自身的特点,发扬传统农业精耕细作、节能低耗、维持生态平衡等优点,“在农村生产和建设的各个方面吸收现代技术和先进管理方法”^{[4]262},“着重发展适用于我国农业的新品种、新技术、新机具和新材料”^{[4]872},提高劳动生产率,以“推广良种、改良施肥技术和发展节水农业、旱作农业为重点,搞好农业技术推广服务工作”^{[6]340},国家产业政策要重点支持“农业、林业中的适用科学技术和有利于良种培育、新技术推广的项目”^{[6]418}。

总之,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上述这些战略思想,既强调了科学技术对农业的重大贡献,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理念运用于农业生产领域,也继承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重视农业科学技术的思想,突破了农业机械化是中国农业现代化首选路径的传统观念,符合中国劳动密集型农业的生产实际。这些思想的提出及在实践中的运用,直接推动了中国农业科技体制的改革。

三、实现了农业科技体制改革与推进农业科技和农业生产发展的有机结合

改革开放前,我国高度重视农业科研与农业技术推广机构的建设,培养了一大批杰出的农业科学家及农业科技人员。但由于受发展基础薄弱、轻视科学、轻视人才、轻视农业职业教育的影响及国家财力的局限,农业科技人才存

在着绝对数量少、整体素质偏低、结构不尽合理、多集中于种植业等问题。另外,国家计划管理的农业科技推广体制,也存在投入主体单一、资金缺乏、科技人员积极性不高,长期存在科研与农民需求脱节、科技与经济脱节等问题。改革开放后,我国农业科学技术的需求对象由农业集体组织变为了单个的农民家庭,农民普遍产生了运用农业科技知识增加产量和收入的迫切需求。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既有的农业科技推广体制如何适应农业经营新体制的变化,成了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思考解决的重要问题。

邓小平深知科学技术在农业生产中的重大作用,强调要加强农业科研工作,促进农业科技与农业生产的有机结合,满足农民的科技需要;认为搞好农业科技的基础研究,加速科技成果的推广转化,需要充分调动现有农业科技人员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改善他们的工作和生活条件。从1977年到1978年,邓小平多次强调指出,科技工作者应该把大部分精力用在科研上,“至少必须保证六分之五的时间搞业务”^{[3]94},同时要求相关部门要做好后勤保障,为农业科技人员解决后顾之忧。1983年,他又提出要大力加强农业科学研究,重点攻关一些农业科学项目,培养和造就一大批德才兼备的农业科技人才。^{[5]123}1985年,他提出农业科技体制改革与经济体制改革的目的是一致的,都是为了最大限度地解放生产力,二者之间是相辅相成的关系,因此只有双管齐下才有可能比较好地解决科技与经济脱节的问题。另外要推动科技体制改革,就必须注重培养科技人才,“有了人才优势,再加上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我们的目标就有把握达到”^{[5]120}。1986年,他指出人类科学技术的进步一日千里,我们不能落后。^{[5]120}1988年,他又提醒党的干部,对科学技术的重要性要充分认识到,要注重科学技术方面、农业方面的投

入,发展农业高科技。^{[5]275}

同期,中央针对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出现的农业科技投入减少、科技推广机构涣散的情况,要求各地把农业科研、技术推广、教育培训等工作组织起来,形成分工合理、相互协调的工作体制,允许农业技术人员“同经济组织签订承包合同,在增产部分中按一定比例分红”^{[4]264},增加收入。中央强调指出:农业科技体制改革的目的是推进农村经济结构的调整,推动农村经济向专业化、商品化、现代化转变。为调动农业科研人员的积极性,中央决定重大的农业技术开发项目或区域开发项目实行公开招标、择优委托;引导省级以上农业科研机构 and 高等学校等各方面科技力量进行多种形式的合作,建立科技成果综合运用示范基地;鼓励和推动城市科技人员和机构“向农村提供各种技术成果、信息和技术服务”^{[4]668};动员和组织农业科技人员下乡,重点推广“花钱较少、增产显著、适用性强的良种技术、栽培技术、施肥技术和其他科学技术”^{[6]691},加强对农民的科技培训;建立和健全产前、产中、产后的生产、科技服务体系,完善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国务院明确要求各级政府建立的农业发展基金须重点用于农业科技研发,并要求相关部门不断增加农业科技投入。同时还要求各级政府要支持农业科技机构面向市场,逐步建立起多层次、多渠道、多元化的农业科技投入体系,强调“搞好农业科学技术的纵深安排,是增强科技兴农后劲的重要保证”^{[6]762},农业高技术研究计划要突出农业生物技术等重点领域,关注动植物新品种的开发研究。

总之,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主张改革中国农业科技体制,培养和造就农业科技人才,提高中国农业科研水平,促进农业科研与农业生产的有机结合。这些思想直接促进了1980年代以后中国农业科技成果的大

量产生和推广运用,极大推动了中国农业的发展。

四、推进农业科学技术的运用

农民科学文化素质的高低不仅直接影响着农业科技成果能否得到运用,而且影响着农业科技成果在农业生产中的产出与经营效果。我国农业政策改革后,农民成了农业科技的投资主体和农业科学技术的直接使用者。大多数农民使用农业先进技术的积极性很大,也很重视科技教育的投入,但也出现部分农民比较短视的现象。“有的地方出现了学生停课、退学现象,有的适龄儿童‘上田’不上学了,有的地方文盲增多了”^{[4]278}。加之历史的原因,中国农民的科学文化水平普遍偏低,对农业科技和教育的重视程度不够,吸收运用先进技术的能力不强,农业商品经济的意识严重不足,这些问题将导致中国农民无法适应农业现代化发展的要求,阻碍农业科技知识的应用及推广。在这种情形下,如何提高农民的科学文化素质,推进农业科技成果与农业生产的有机结合,就成了邓小平高度关注的又一个问题。针对这一问题,邓小平提出要通过大力发展教育来提高农民的科技文化素质,为农村培养留得住的农业技术应用与推广人才,调整农业科技推广政策,推进农业科学技术的运用。

首先,通过提高农民的科学文化素质来推动农业科学技术的运用。早在1978年3月,邓小平就指出,“劳动者只有具备较高的科学文化水平,丰富的生产经验,才能在现代化的生产中发挥更大的作用”^{[3]88}。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对此高度重视,主张农业科技人才不仅要通过高等学校来培养,还要通过中等教育结构的改革培养面向基层的农技推广人才,即注重为农村培养留得住的、在农技推广中作用巨大的“土专家”。对此,邓小平提出

要适当扩大各种中等专业学校的比例,“我们有大量的中学生,要把他们培养成土专家,让他们在农村中发挥作用”^{[1]275}。中央强调指出,农村中种花生、种棉花、种稻子的能手是农村科技队伍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与专业技术机构如科学院、农业院校相结合,发挥的作用将更大;要培养农村中学生成为农业科技的骨干力量;必须加强教育改革,每个县都要办农业学校,多数农村中学都要改成农业中学,按照农村经济发展的需要设置课程,毕业生至少掌握一项农业技术或经营管理知识。同时,中共号召农村青年要踏踏实实地去践行农业科技,努力学习、带头运用、积极推行先进生产技术;强调提高农民科学文化与思想道德素质是农村精神文明建设必不可少的基础,要消除封建遗毒和小生产狭隘眼界对农民的影响。总之,增强中国农业发展后劲的重要方法之一,就是要提升农民的智力和技能水平,不断增长农民的科学知识、信息知识和文化知识。正是在邓小平的大力倡导下,全国各地重视教育和人才、学习科学技术蔚然成风。农村在推行普及义务教育的基础上,农村职业中学迅速发展,提高了农民的科学文化素质,培养了一批懂科技、善经营的新型农民,为中国农业科技的运用奠定了基础。

其次,通过建立农业技术推广组织来推进农业科学技术的运用。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在农业经营体制改革后,把建立健全农技推广组织作为完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重要措施,希望以此建立农业双层经营体制。1983年以后,中央强调农业集体组织要统筹安排、统一管理,按照互利的原则,“分别承包,建立制度,为农户服务”^{[4]256},办好农民家庭不能解决的机耕、水利、植保、防疫、制种、配种等事情。中央明确要求各地要办好国家和集体的农技服务机构,通过技术承包制,“建立科技示范户、技术服务公司、生产科技联合体、科

技普及协会等等”^{[4]263},为农民提供科技服务。同时还提出要鼓励和允许农业技术人员同经济组织签订承包合同,在增产部分中按一定比例分红,增加收入;要把农村集、镇建设成为农村的政治文化中心和科技推广中心。中央还要求乡镇企业要经常性地向农民提供各种农业机械与配套服务;支持国家、集体、个人以合作形式兴办农村科技服务;农技推广机构应同研究机构、高等学校、乡镇企业、各种合作组织,以及专业户、技术示范户、能工巧匠相结合,积极做好各方面的技术服务和农业新技术的推广工作,推行按照经济效益计算报酬的技术责任制或收取技术服务费的办法,增加推广机构和科学技术人员的收入,推广机构可以兴办企业型的经营实体,“鼓励和支持有条件的单位逐步做到事业费自给”^{[4]668}。1988年,国家要求农业科技推广的运行机制向市场化转变,政府以往主导并开办的面向农民的基层技术推广服务机构要改革为独立实体,通过有偿技术服务、技术经济承包和经营与技术服务有关的农用生产资料等业务,“改变单纯依赖政府拨款的状况,逐步形成自我发展能力”^{[6]245}。国家还鼓励科技人员做好农民的技术培训和服务工作,以发挥民间科技组织和农民技术员在农业科技推广中的作用。这些规定使得我国农业科技推广的公共服务逐渐走向市场化,对中国农业的发展提供了较大的动力支撑。

针对农技推广机构经费匮乏、人才流失等问题,1989年,国家要求巩固和发展县(含县)以下农技推广机构,支持发展以农民为主体、以农民技术员、科技人员为骨干的各种专业科技协会和技术研究会,“以疏通科技流向千家万

户和各生产环节的渠道”^{[6]758},强调农业技术承包实行以物资供销为依托、综合配套的社会化服务。随着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把农技推广工作纳入市场化运作的改革,开展了多形式、多渠道、多层次的农民科技文化教育活动,中国农村出现了政府推动、市场拉动农业科技开发与运用的新局面。

综上所述,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提出的“科技兴农”的思想,直面中国农业经营制度变革后农业科技推广面临的新问题,有针对性地提出了建设中国特色的农业技术路径,并对农业科技推广体制进行了改革。这些变革及其方针和政策,既适应了中国农业的生产实际,又把握住了中国农业科技发展的未来趋势,即使在今天仍然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价值。

参考文献:

- [1]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邓小平思想年谱(1975—1997)[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
- [2] 邓小平. 邓小平文选:第1卷[C].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326.
- [3] 邓小平. 邓小平文选:第2卷[C].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 [4]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十二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
- [5] 邓小平. 邓小平文选:第3卷[C].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 [6]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十三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引用格式:张改娥,刘义. 嵇康“颀颀礼法”“放达自由”的生命形态探析[J]. 郑州轻工业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17(3):21-27.

中图分类号:B235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9/j.issn.1009-3729.2016.03.004

文章编号:1009-3729(2016)03-0021-07

嵇康“颀颀礼法”“放达自由”的生命形态探析

Study on life form of Ji Kang's antagonistic etiquette and unrestrained freedom

张改娥,刘义

ZHANG Gai-e, LIU Yi

郑州轻工业学院 思政部, 河南 郑州 450002

摘要:竹林名士嵇康生活的时代,名教沦丧、礼崩乐坏,政治、社会动荡。面对这一特殊的政治、社会情境,嵇康“默然从道,沉默无为”,将道家的“自然”和“无为”奉为主臬,力图远离政治。但这并不意味着嵇康消极避世,而是他对待不合理现实的一种无畏的抗拒和抵制:一方面,他“颀颀礼法”“越名任心”,以颓废懒散挑衅礼法俗情,以悍然不驯的态度拒绝来自政权的拉拢;另一方面,他“悠游适性”“放达自由”,与阮籍、向秀、山涛等人遁隐竹林,放弃出世济世的儒家思想。这种带有浓郁道家色彩的返璞归真、无所羁绊的做法,彰显了嵇康独特的生命样态,并由此开启了魏晋著名的“竹林之游”。

关键词:

嵇康;
无为;
名教;
自然;
生命形态

收稿日期:2016-02-27

基金项目:河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2013BZX010)

作者简介:张改娥(1968—),女,河南省安阳市人,郑州轻工业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中国哲学。

魏晋之际,朝中官员多为汉臣,对魏晋篡汉多有非议,政治、社会动荡,社会名士频遭杀害,正始玄音于是沉寂。一方面,司马氏所代表的在朝士大夫群体,遵奉礼法,严明伦理与道德教化,意图维护社会秩序,借以巩固统治政权;另一方面,司马氏也假借儒家礼教的名义,谋夺王位、诛除异己,致使名教发生异化,道德丧失其传统价值,礼教日益虚伪而与自然人性相背离。其时,受社会发展与个体生命内在涵养需求的推动,老庄思想为全社会所重视而日渐盛行。这时候的个人生命展现出独特、崭新的儒道融通风貌:自我意识代替了群体意识,士人不再汲汲于钻营名利事功,转而对个体生命高度关注,将个人的品评标准由重视道德和人格的完全,扩展并转向以个体为主的仪态之美、个人才能范围的艺能或识度,以充分绽放个人真情率性的生命风采。魏朝正始士人不仅承接了这种自觉意识之风,又身值名教异化愈烈的人文社会。于是,士人们对新道德典范真善的心灵需求和对政治社会的批判态度,自然反映于个人的行为与外显的生命风格,进而发展成为具有时代特色的生命情调。儒学的衰退,道家思想的兴盛,士人会通儒道,引发汉魏之际士风与学风的转变开新,形成了一个生命自我觉醒与解放的时代。这一特殊的政治和社会情境,蕴涵了魏晋时代的群体生命风貌,嵇康也以这个生命觉醒时代为契机,发展出他个人与群体生命新的相对关系。他抗礼自得的生命形态,与群体生命的内涵同中有异,自有其独特之处。他既不像仲长统结合法家、道家思想希望协助统治者维护政权,也不像何晏、王弼兼采儒、道之长提供有助于国家统治和社会建设的政策,而是力图实践道家的“自然”思想,反抗权势统治者的仁孝礼治。嵇康一方面沉默体道,悠游以养生,展现道家“全身贵生”的生命观念;另一方面又难掩其率真的傲性,彰显出多样且独特的生命

形态。

一、默然从道,沉默无为

嵇康心慕“老、庄之业,恬静无欲”而体认出“身贵名贱”(《兄秀才公穆入军赠诗》第十九首)不如“方外荣华,去滋味,游心于寂寞,以无为为贵”^{[1]125}。于是,嵇康就由“默静少文”转向“默然从道”。这一点充分体现于其日常行为中:以嵇康为核心的“竹林七贤”在饮酒欢聚时,他高谈阔论、谐谑嘲弄,但平时对外则沉默寡言、郁郁寡欢。嵇康等竹林名士这种共同的“沉默”现象,也许不仅只为学老庄体道好静而已,恐怕更有类似王戎“晦默于危乱之际,获免忧祸”(《世说新语·俭嗇》第三条注引戴逵言)的现实顾虑。这种“免祸”的心态与当时嵇康所推崇的“沉默自守”的隐者孙登之所言所行大致相当:“(阮)籍尝于苏门山遇孙登,与商略终古及栖神导气之术,登皆不应……籍因遂归着”;嵇康也曾“从之游三年,问其所图,终不答,康每叹息”(《晋书》卷九十四《孙登传》)。据史料记载,孙登隐居山岩洞窟,读《易》抚琴自足于怀,玄默无辞,无喜怒颜色,不与人争,探索其沉默的原因,“以魏晋去就,易生嫌疑,故或嘿者也”(《晋书》卷九十四《孙登传》)。由此可知,孙登体道的最大原因仍在于“免祸”。嵇康作为孙登的仰慕者且与其三年同游,其言行举止与处世方式受孙登的影响很大。对此,王戎曾经指出,“与康居二十年,未尝见其喜愠之色”(《世说新语·德行》第十六条)。这也间接地证明了嵇康平日十分注意自我节制,约束自身情感的外放。此外,在史传中也曾有记载:阮籍慎与人言,且喜怒不形于色,因其深沉晦智的“自我情感约束”表现,获得晋文王(司马昭)“至慎”的美称。嵇康的谨慎基于双重原因:首先,是他服膺老庄,宗奉其说,化刚直尚柔弱;其次,是他警觉自身“刚肠疾恶”的个性,极难见

容于当时险恶的政治和社会环境,深知“奉时恭默,咎悔不生”^{[1]31},在适应外在的政治环境的过程中不得不做调整。前者起于内在认知的自我节制,后者来自外在危机导致的自保意识,这种双重的自觉意识勾勒出嵇康“至慎”的面貌。针对嵇康谨言慎行的原因,王澍认为其是迫于外在严酷的政治、社会环境而非其本趣,真正有话要说时,仍是“轻肆直言,遇事便发”(《与山巨源绝交书》)。事实上,嵇康清高傲世、不染世俗的性格,暗含着强烈的自我期许,但此种人生理想和心态与他过于执着、刚直的性格相互纠葛。因此,嵇康平日十分注意自我节制,喜怒不形于色,这与他后来告诫儿子要谨慎言语有着内在的一致性:“夫言语,君子之机,机动物应,责是非之形着矣,故不可不慎。”^{[1]319}由此可知,对嵇康而言,最适宜的为人处世之道则为:“若行寡言,慎备自守,则怨责之路解矣。”^{[1]317}这与他有意要学习阮籍的“口与心誓,守死无二”“与物无伤”^{[1]315}的处世之道相呼应。而针对嵇康与人交往喜愠不形于色的原因,有学者指出:玄学的思想修养会促使人们在追求和平宁静的人生境界过程中对个体性情产生一种“自我制约”的结果,这并非嵇康的性格使然,他的性格依然是刚直峻急的。但不管是出于环境所迫,还是玄学修养对个人情性所造成的“自我制约”的结果,嵇康喜怒不形于色的“谨慎”态度并非他的真性本趣。他沉默以体玄也因慎世而沉默,那为人称道的谨言慎行,原是他调节刚直本性的自觉表现。嵇康的沉默,或许本是自身“默然从道”的修养要求,一旦发展到人际关系上,便表现为喜怒不形于色的谨言慎行。这虽然不是嵇康的真实性格,但我们仍可借此看到嵇康内在心理与实际行事之间的差异。

嵇康拒仕沉晦、标榜“无为”、不问世事的态度,到底是表面低调还是真心“无为”?对

此,我们可根据史料记载推敲出一些线索。竹林诸贤本多怀有济世志向,但由于所处的政治和社会环境动荡不安,名教沦丧,礼崩乐坏,因而他们又多有隐士之志。依据《晋书》记载,阮籍“有傲世情,不乐仕宦”;嵇康自表“荣进之心日颓,任实之情转笃”;王戎“韬晦逊退”;山涛“隐身自晦”。“竹林七贤”无一例外地都以低调、“沉晦无为”的姿态避开敏感的政局。但是以嵇康为首的这些士人在心慕道家思想的同时,并没有遗弃儒家思想,而是以另外一种方式会通儒道。儒家思想和道家思想于是以一种独特的进路平行地存在于士人们的思想当中。事实上,这也与嵇康和老庄之济世的思想遥相呼应。惟其如此,嵇康等名士携手“竹林之游”,却没有抛开对世事的关注,恰是对这种看似矛盾但实则合理的现象的最好诠释。比如,山涛与阮籍凭借着对时局的敏感,辞隐而避开高平陵政变,他们的那些预见远识,少不了对政治情势的注意和观察。嵇康更是如此,他闲居不仕,固然有隐遁避世的政治考量,但他并非全然不关心现实政治,否则他就不会想协助毋丘俭反抗司马氏的权势集团:“毋丘俭反,康有力,且欲起兵应之,以问山涛,涛曰:‘不可。’俭亦已败。”^{[2]555}钟会更以此事进谏嵇康,提醒司马昭不可忽视嵇康在政治上的影响力:“(钟会)言于文帝曰:‘嵇康,卧龙也,不可起。公无忧天下,顾以康为虑耳。’因谏‘康欲助毋丘俭,赖山涛不听’……。”^{[3]1373}

由此可知,嵇康等竹林名士虽“隐晦”其身,表态“无为”,但对现实政治仍存有关切与希望,他们实际上并没有完全与政治隔离,而是隐在政治真空地带以俟机而动。嵇康虽“自晦”以明哲保身,颓放毁行以示无用,但这只是“遗世”其表、“忧世”其里。因此,他的“不与世事”其实是不愿参与官场上的俗务,而非“遂放世事”,放弃心目中对社会的关怀。

二、颀颀礼法,越名任心

儒家圣人虽是缘情以制礼,把情作为礼的根本,但在个人自由与群体秩序交集的实践中,情与礼之间难免会有冲突。魏晋士人所处的特殊境遇,使他们追求自我独立的人格,肯定自我的存在价值,流露出自然性情,所以,魏晋士人在面对情性与礼法横决时,经常表现出颀颀礼法的态度。作为竹林名士的代表,嵇康更是如此。当面对世俗之人、官员、礼法之士时,嵇康一律不假以颜色。例如,对钟会的来访,“康扬榘不辍,旁若无人,移时不交一言”(《世说新语·简傲》)。嵇康这种“箕距而锻”而不加礼遇的行为展现出其沉默傲物的姿态。此外,“有人就锻者,康不受直,唯亲旧以鸡酒往与共饮噉,清言而已”(《世说新语·简傲》第三条注引《文士传》)。除了不假颜色的傲慢态度,嵇康在言谈、文字当中对礼法之士的鄙夷讽刺,更是强烈得近乎露骨。在《与山巨源绝交书》中,嵇康将自己比为“非梧桐不止,非练实不食,非醴泉不饮”(《庄子·秋水》)中的鸕雏,而将世人竞相追逐的名位视若腐臭的死鼠:“夫人之相知,贵识其天性,因而济之……各以得志为乐,唯达者为能通之,此足下度内耳。不可自见好章甫,强越人以文冕也;己嗜臭腐,养鸕雏以死鼠也,尚不顾足下所好者。”^{[1]117,123-125}由此可见,嵇康视名利为腐鼠,明显自标清高,鄙弃虚伪的礼法名教。即使不对外人,自身的懒散不修、颓废形骸,也是一种鄙俗任性的傲慢。在与山涛的绝交书中,嵇康再次展现了其简傲傲慢的一面,他自言:“头面常一月十五日不洗,不大闷痒,不能沐也。每常小便而忍不起,令胞中略转乃起耳。”^{[1]117}

嵇康不仅以颓废懒散挑衅礼法俗情,同时也以悍然不驯的意态拒绝现政权的拉拢。他列举“七不堪”和“二不可”,公然与“人伦有礼,朝

廷有法”^{[4]117}的礼法世教对抗。如此从情任性,“亦欲标不屈之节,以杜举者之口耳”(《世说新语·栖逸》第三条注引《嵇康别传》),大有不满现实而故意逾越世俗的反抗心态。他夸大的动作,宣告志趣与立场的意味大过自我检讨;书信明似指责山涛愧为知交,不识自己襟怀,实则透过“七不堪”的从情任性,揭露虚伪礼教对人性的箝制,暗讽朝仕官员驰骛荣名。嵇康是竹林名士当中公开反对儒家礼法的人,但除了个人形骸的颓放,并未发现其不拘礼法的记载。仔细看来,嵇康自述的“七不堪”都属于个性与习惯方面的问题,并无严重逾越至违反仁义道德的程度。这些恰恰是嵇康厌恶礼法虚伪繁琐的刚直性格的表现,并非意味着他完全否定儒家的仁义道德。因此,应该说,嵇康不是反对以儒家礼法为代表的名教本身,而是反对名教制度在人为操控下产生徒重形式而禁锢自然人性的虚伪效应,那些奉六经为太阳、丧性求荣的礼法之士(儒者),宜当批判之首冲。至于嵇康自言不容于世教的“非汤、武而薄周、孔”^{[1]122},实质上只是对当时礼法虚伪性的反抗表现,他的急峻刚直,也是其执着于儒家仁义准则的表现。事实上,嵇康“有所为”的从情抗礼,晋人戴逵早有明辨:“竹林之为放,有疾而颀者也”(《全晋文》卷一百三十七《放达为非道论》)。

嵇康这种对虚伪礼教的颀颀,使其“越名教而任自然”的主张愈发彰显。我们既可以从探知嵇康辨认公私、判别是非的根据,也多少可以看出他提出任自然而“无措”于心的用意。嵇康心目中的君子“心无措乎是非,而行不违乎道”^{[1]234},不像礼法之士假用仁义那样的虚伪卑鄙,而是自然而然地实践道德。嵇康以心之“有措”“无措”论公私,并以此区分君子与小人:“匿情矜吝,小人之至恶;虚心无措,君子之笃行也”^{[1]234};也企图以“无措”化解礼教之虚伪,使名教得以自然实行。“无措”不是衡量君

子与小人的准则,而是一种可以化去人的自然执着的工夫修养,与庄子的“坐忘”“浑化”含义相同^{[5]570}。对此,牟宗三先生指出,“无措”即“无所措意”,普通所谓“无心”也;“有措”则是有心,即王阳明所谓的“动于意”也。“动于意”则善恶皆坏,坏在有“矜尚”、有隐曲也;有隐曲,即有所匿,即是“私”,是故工夫之大者,惟在能忘。忘者,浑化也。“气静神虚”“体亮心达”“越名教而任自然”等,皆所谓浑化也^{[6]338}。

嵇康“越名教而任自然”的理念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作为凭借自身的道德阶梯引导人们进入崇高境界的名教,此时却异化成了司马氏统治集团诛杀异己、篡权夺位的工具,基于对这种虚伪名教的深恶痛绝,嵇康才提出了超越、不拘泥于名教的束缚,自由自在地张扬自己的意志,即“任自然”。但是,名教所包含的基本道德规范,本身并没有可指责的地方,所以嵇康认为,不能在传统道德领域中来解决是非,而必须通过“无措是非”“物情顺通”来达到更高的境界。由此可知,嵇康追求意志自由张扬的“任心”并不是对名教的简单排斥。究其实质,这是一个真正地关注名教的人基于道家立场对现行的名教之批判,所以“任心”表面上是对名教的叛逆和否定,本质上却是嵇康试图通过这种批判,即以“任自然”的途径来恢复名教本该在社会伦理生活中所起的真正作用^{[7]15-16}。

嵇康以简陋傲慢的形态反抗被虚伪蒙蔽的礼教,其任性是发源于虚静不矜的心和不被物欲牵系的情,绝不是自由放纵的妄为。事实上,在嵇康反抗礼教的激进意识背后,隐藏着更为积极的期许,他希望借由“任自然”的“无措”之心,谐和自然与名教之间的关系,进而成就真实的名教。正如鲁迅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中所评价的:“当时最富叛逆精神的文人,如嵇康、阮籍,其灵魂深处仍然怀恋着名教,他们非毁礼教,其实是不得已的事,他们服

膺真的儒教。”“表面上毁坏礼教者,实则倒是承认礼教,太相信礼教。”^{[4]428}对嵇康而言,在名教已经成为司马氏集团用来作为“诛夷名族,宠树同己”的一种工具的政治、社会环境下,他批判的矛头似乎是指向了道德本身,认为道德是在自然之道衰落之后产生的,而并非人性的自然要求。作为一种制度,被固定下来的道德自然就成了人们追求名利的手段和争权夺利的工具。在这种社会模式中,人心被扰乱,随之人的自然本性也遭受破坏;而与道德相伴而来的惩罚、教化制度,则使得社会上“智慧日用,渐私其亲”。由于对利益疯狂地追求,导致社会的良性秩序被破坏,国家面临覆亡的边缘,因此,嵇康对“名教”的苛责实际上是批判虚伪性的道德(建立在利益基础之上的所谓的道德仁义制度),以及由这种虚伪性所带来的后果,而并非批判道德本身。^{[7]15}

三、悠游适性,放达自由

当时,司马氏高举名教大旗倒行逆施,肆行集权篡位而大开杀戮。目睹众多正始名士因故或见诛或遭黜,“天下名故,名士少有全者”,嵇康遂与阮籍、向秀、山涛等人遁隐竹林,放弃出世济世的儒家思想,转而遵循返璞归真、无所羁绊的道家思想,并由此开启了魏晋著名的“竹林之游”。

与当时司马氏集团专横跋扈、钳制思想自由的世风相悖,嵇康自幼“不涉经学,性复疏懒”^{[1]117},养成了率性由己、放任不羁的性格,而且“恬静寡欲,含垢匿瑕,宽简有大量。学不师受,博览无不该通,长好《老》《庄》”(《晋书·嵇康传》)。老庄贵“游”,所游或“尘垢之外”,或“四海之外”,或“天地之一气”。心系老庄的哲学,嵇康与竹林之友起于志同道合,希冀自由无拘的理想世界。竹林名士各有其个体自觉的发展,各自表现出独特的生命形态,如山涛的稳

重、嵇康的刚烈、王戎的简傲、刘伶的昏放等,可谓人各有志。但他们之所以能够结伴作竹林之游,是因为他们共同具有超拔傲气、批判礼俗、不问世事、以放达回避政治的态度,以及自力更生、自足得意、崇尚老庄、标榜自我的逍遥人生态度,而且又都有崇尚自然的共识,向慕闲适自得的生活。

嵇康以老庄为师,生平“贱物贵生”,以“荣名秽人身,高位多灾患,未若捐外累,肆志养浩然”^{[1]66}。在这种崇尚自然思潮的影响下,其他竹林名士也都以老庄思想为精神支撑,重视自然的精神和个体的存在,以外在的放浪形骸遗忘外在世事,表现出老庄“达生任性”的人生理念。换句话说,求生活悠游自得而遗忘外物形骸,是嵇康等名士酣畅竹林的真意。他们重视个人的志趣,像阮籍、刘伶浪形醉酒,嵇康、向秀钟情山水,莫不耽溺于所好,充分彰显出追求自我精神上的满足痛快的独特个性。面对复杂的政治环境,竹林名士群聚饮酒清谈,采取隐避但观察的态度。嵇康遵循“绝智弃学,游心于玄默”^{[1]49}的老庄人生观,全然忽视自身所处残酷的政治、社会环境,“侍爱肆姐,不训不师”导致他的处世方式简单质朴。心慕于魏晋玄风普畅,世尚“雅远”,以“隐”为高,嵇康搜集自古以来“圣贤、隐逸、遗名、遁心”者百十九人,为之传赞,著成《圣贤高士传》,由此足见其内心对“雅远”的隐者充满推崇与向慕。嵇康个人对自然的向往与追求,是其早在年少时就有的愿望,成长后习染老庄学风,又经历蹇顿世路,遂使遁隐也难以得意欢心:“昔蒙父兄祚,少得离负荷。因疏遂成懒,寝迹北山阿。但愿养性命,终已靡有他。良辰不我期,当年值纷华。坎壈趣世教,常恐婴网罗。义农邈已远,拊膺独咨嗟。朔戒贵尚容,渔父好扬波,虽逸亦以难,非余心所嘉。”^{[1]62-63}

嵇康于诗中道出了“保养天命”的终生志

愿,也透露出面临险恶世道内心常存有恐惧之阴影。他深叹伏羲、神农的淳朴世代因遥远而渺茫,想要遁隐避害,但容身浊世之中,即便遁世隐居顺时推移,也是违反性情的难事。既爱自然又尚雅远,“隐居”对嵇康自是一件遂志乐事,嵇康何以反以为这是难事呢?原因就在于嵇康无法做到像东方朔、渔父那样顺势应变、随波逐流。这就彰显出嵇康在崇尚逍遥游世的道家思想的同时所兼有的济世的儒家思想。汉朝东方朔在《戒子》中勉子“以仕代农”,既可“饱食安步”,又可免去劳苦;而且当官也不可认真,怀抱玩世的心态“依违朝隐”,既可享乐又可全身,所谓“依隐玩世,诡时不逢”(《戒子》)。这种观念成为两汉到隋代仕宦家庭诫子的核心思想,也是当时仕宦者自身的心态写照。竹林名士中出仕的成员如山涛,即遭孙绰鄙斥“吏非吏,隐非隐”(《晋书》卷五十六《孙绰传》);王戎也“与时舒卷,无蹇谔之节”,“但与时浮沉”(《晋书》卷四十三《王戎传》)。这些都是求容于世、隐身于朝的明哲保身法。另外,渔父也曾以“世人皆浊,何不泥其泥而扬其波”劝屈原“不凝滞于物,而能与世推移”(《楚辞·渔父》)。嵇康诗举东方朔和渔父二人为例,确有赞赏之意:“东方朔至清,外似贪污内贞,秽身滑稽隐名,不为世累所撓,所欲不足无营。”^{[1]43}这样的避世全身方法,嵇康虽诗中称赏,但他不愿违反本性而为。对嵇康而言,“柳下惠、东方朔,达人也,安乎卑位,吾岂敢短之哉!又仲尼兼爱,不羞执鞭;子文无欲卿相,而三登令尹。是乃君子思济物之意也”^{[1]114-115}。遵循纯粹的儒家思想,既是嵇康的本性所为,亦是其入世、济世的立足所在。在《家诫》中,嵇康明确指出:“人无志,非人也。但君子用心,有所准行,自当量其善者,必拟议而后动。若志之所之,则口与心誓,守死无二,耻躬不逮,期于必济。”^{[1]315}由是观之,东方朔容身朝隐、渔父混同

顺世,二人之“能隐”正反衬出嵇康高蹈出世之“隐难”,既是志所不为也是性所不能为。正是如此,清代陈祚明谓嵇康,“慨世甚深,故决意高蹈,不能随世浮沉,虽逸亦已难,盖欲矫拂本性,此事诚甚难也”^{[1]64},只有自求放达一途了。可见,虽在嵇康悠游肆意的行为背后难以卸脱现实的牵制,但他任性放达寻求慰藉,仍是出于其自我意愿的选择。

综上所述,嵇康表面沉默寡言,内心并非真正无言;他简慢傲人、违俗抗礼,实则有过度甚或故意的倾向;他或与竹林知交酣饮肆意,或采药服养欣然自得,表面看来悠游得意、肆志自然,其实是疾世遁隐、放达自然,非单纯的欣快常志而是变调的逃避现实。这既反映了当时士人群体普遍共有的生命无奈与苦闷,又有其时代的因素和根据。需要说明的是,嵇康并不因此而与污同流,他洁身自爱而高达亮志,不甘与当世诈伪鄙俗的社会共浮沉;他内心自觉纵放,追求肆意自由,不愿受拘于礼法名教的束缚。立足于此,嵇康在“以文人的畅游方式回应了时代的紧张与冲突,以智者的处世原则推动了

历史的运作与发展”^[8]的过程中亦道亦儒,游心方外而又任性宇内。这使得嵇康独特的生命形态犹如一缩影,我们既可从中透视魏晋士人普遍的生存心态,也能借此对照出其中异处,从而凸显嵇康如奇葩独秀、与世殊异的生命特质。

参考文献:

- [1] 戴明扬. 嵇康集校注[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
- [2] 陈寿. 三国志[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 [3] 房玄龄等. 晋书[M]. 北京:中华书局,1974.
- [4] 鲁迅. 魏晋风度及其他[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
- [5] 杨祖汉. 论嵇康的越名教而任自然[A]. // 魏晋南北朝文学与思想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第三辑)[C]. 台北:交津出版社,1997.
- [6] 牟宗三. 才性与玄理[M]. 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89.
- [7] 杨晓. 嵇康越名任心的儒家情[J]. 学术论坛,2010(9):14.
- [8] 康中乾. 魏晋玄学[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



引用格式:黄艾婷,蓝江.阿尔都塞对毛泽东《矛盾论》的诠释及其局限[J].郑州轻工业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17(3):28-33.

中图分类号:A81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9/j.issn.1009-3729.2016.03.005

文章编号:1009-3729(2016)03-0028-06

阿尔都塞对毛泽东《矛盾论》的诠释及其局限

Althusser's interpretation of Mao Zedong's *On Contradictions*
and its limitations

黄艾婷,蓝江

HUANG Ai-ting, LAN Jiang

南京大学 哲学系, 江苏 南京 210093

摘要:为了反驳当时教条主义地解读马克思主义的倾向,澄清黑格尔辩证法与马克思辩证法之间的差异,阿尔都塞对毛泽东的《矛盾论》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和诠释。在《矛盾与多元决定(研究笔记)》中,阿尔都塞首次借鉴了毛泽东《矛盾论》中的辩证法思想,初步确立起带有浓郁结构主义色彩的“多元决定”范畴;在几乎同期的《关于唯物辩证法(论起源的不平衡)》中,阿尔都塞更为直接地立足于毛泽东辩证法思想资源,对多元决定与事物矛盾发展的关系展开深入分析。由此,阿尔都塞自身思想的发展与毛泽东的《矛盾论》内在地交织在一起,形成一个带有构镜论色彩的思想格局。其一,立足于毛泽东关于矛盾的对抗性和非对抗性的思想,阿尔都塞对多元决定的确切内涵作了深刻阐发;其二,通过吸收和借鉴毛泽东关于矛盾特殊性的相关思想,阿尔都塞论证了矛盾结构的复杂性和既与性;其三,通过对毛泽东主次矛盾、矛盾的主次方面思想的深度重构,阿尔都塞确立了自身结构主义的多元决定论思想。公允地说,阿尔都塞对毛泽东《矛盾论》的研究和诠释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他以别样的、带有先验色彩的结构主义方法凸显了毛泽东辩证法的丰富内涵。然而,这一解读也有其局限性:脱离本真的历史实践,对毛泽东思想作了过于抽象的纯粹理论化处理;“症候式阅读”方法单纯注重文本自身的问题,而忽视了文本与思想和社会现实更深的逻辑关联。

关键词:

阿尔都塞;
矛盾论;
辩证法;
多元决定

收稿日期:2016-01-10

作者简介:黄艾婷(1993—),女,江苏省苏州市人,南京大学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哲学。

通讯作者:蓝江(1977—),男,湖北省荆州市人,南京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国外马克思主义。

法国著名哲学家路易·阿尔都塞在其所著的《保卫马克思》这部重要论著中,极力反对1960年代盛行的两种倾向:一是以萨特为代表的人道主义思潮;二是苏联的“经济决定论”。在阿尔都塞看来,二者的共同症结在于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了形而上学的教条化理解。支撑阿尔都塞进行批判并建构他自身思想的重要方法论资源正是毛泽东的《矛盾论》。长期以来,我国学界较多偏重于对阿尔都塞本人辩证法思想的研究,对阿尔都塞与毛泽东的《矛盾论》及其辩证法思想的关系鲜有研究。本文拟以阿尔都塞的《矛盾与多元决定(研究笔记)》和《关于唯物辩证法(论起源的不平衡)》这两个文本为依据,力图还原阿尔都塞对毛泽东《矛盾论》的解析,以凸显阿尔都塞特殊的诠释逻辑,并揭示这一特定诠释方式的局限性。

一、批判“颠倒说”与毛泽东思想的出场

由《矛盾与多元决定(研究笔记)》可以看出,早在1962年,阿尔都塞在对“多元决定”概念进行阐述的时候,就已经间接地借用了毛泽东的思想资源。而在另外一部论著《关于唯物辩证法(论起源的不平衡)》中,阿尔都塞进一步对矛盾的多元决定问题展开了分析。在这里,毛泽东思想更是多次以直接论据的形式出现。那么,毛泽东思想是在什么样的一种理论景观中出场的呢?

从开始从事马克思主义研究时起,阿尔都塞就力图剔除马克思主义辩证法中的黑格尔因素。这样做的直接原因是论战的需要。他强烈反对两种倾向,即“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和苏联“斯大林化”的经济决定论。前者的直接理论基点是青年马克思,而青年马克思是站在黑格尔哲学基础上的;后者的本质是一元决定论,阿尔都塞认为这也同样带有黑格尔的思辨

主义和还原论色彩。唯其如此,阿尔都塞认为,要清除这两种错误倾向,就必须对黑格尔的思辨辩证法进行祛魅,即必须对已经在人们头脑中根深蒂固了的辩证法的“颠倒说”进行彻底批判。阿尔都塞认为,过去对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理解,即“颠倒说”,其含义暧昧不清。所谓保留黑格尔辩证法的方法这个内核,仅仅对其体系进行外部的颠倒的做法是不正确的。这种“颠倒说”的理论前提是把体系和方法看成两种分离的、不同的东西,简单地认为,去除唯心主义的体系,将方法的对象从精神变成物质,就完成了对黑格尔辩证法的合理改造。事实上,这样的做法是不合理的。因为体系与方法是一个整体,是统一的、不可分离的。所以仅仅进行简单的形式上的颠倒无济于事,而必须对黑格尔的辩证法进行彻底的结构主义改造。“这就意味着,黑格尔辩证法的一些基本结构,如否定、否定之否定、对立面的同一、‘扬弃’、质转化为量、矛盾等等,到了马克思那里(假定马克思接受了这些结构,事实上他并没有全部接受!)就具有一种不同于原来在黑格尔那里的结构。”^{[1]81}这是阿尔都塞首次明确地提出要对毛泽东《矛盾论》思想进行借鉴,相应地,毛泽东的思想也就首次在阿尔都塞的文本中出场。

阿尔都塞之所以会受到毛泽东思想的影响,有着一定的时代因素。美国耶鲁大学教授弗雷德里克·杰姆逊曾称毛泽东的《矛盾论》是“结构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之一”^{[2]89}。的确如此。毛泽东的《矛盾论》对于法国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确实产生了重大影响,也深刻影响到了阿尔都塞。不过,这种影响是通过特定的方式发生的,它是在结构主义意义上对法国马克思主义产生影响的。也就是说,在阿尔都塞的文本中,毛泽东思想的出场从来都不是以原本的面貌单纯地出场的,而是为了他自己

的理论目的而让其结构主义化之后出场的。

二、多元决定论的创立与毛泽东思想的借用

在《矛盾与多元决定(研究笔记)》和《关于唯物辩证法(论起源的不平衡)》这两个文本中,阿尔都塞集中论证了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特殊性。借此,阿尔都塞提出了别具特色的多元决定论思想。在阿尔都塞整体的思想发展过程中,始终在场的是毛泽东的《矛盾论》及其辩证法思想。概括而言,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分析。

1. 新“矛盾”一般规定的建立

为了将马克思的辩证法与黑格尔的辩证法区分开来,就必须对二者的“矛盾”概念进行相应的区分。于是阿尔都塞从一开始就使用了不同于“矛盾”概念的“多元决定”,至于多元决定的涵义,阿尔都塞认为,必须从促使矛盾爆发的矛盾统一体的性质及其过程这个角度进行阐明。对此,阿尔都塞说:“它们在构成统一体的同时,重新组成和实现自身的根本统一性,并表现出它们的性质:‘矛盾’是同整个社会机体的结构不可分割的,是同该结构的存在条件和制约领域不可分割的;‘矛盾’在其内部受到各种不同矛盾的影响,它在同一项运动中既规定着社会形态的各个方面和各领域,同时又被它们规定。我们可以说,这个‘矛盾’本质上是多元决定的。”^[3]由此可以看出,支撑阿尔都塞观点的基本理论正是毛泽东的《矛盾论》。毛泽东关于矛盾的对抗性和非对抗性的论述,给予阿尔都塞以直接的理论支持。阿尔都塞以此将黑格尔与马克思对矛盾的不同理解区别开来。

在《矛盾论》中,毛泽东阐述对抗性矛盾和非对抗性矛盾是为了探讨社会中的阶级矛盾状况,是为了具体研究各种矛盾斗争的情况。对此,毛泽东指出,“我们必须具体地研究各种矛

盾斗争情况,不应当将上面所说的公式不适合地套在一切事物的身上。矛盾和斗争是普遍的、绝对的,但是解决矛盾的方法,即斗争的形式,则因矛盾的性质不同而不相同。有些矛盾具有公开的对抗性,有些矛盾则不是这样。根据事物的具体发展,有些矛盾是由原来还非对抗性的,而发展成为对抗性的;也有些矛盾则由原来是对抗性的,而发展成为非对抗性的”^{[3]355}。毛泽东是为了具体说明矛盾的特殊性,才区分矛盾对抗的不同情形。毛泽东明显强调的是矛盾本身的特殊性对矛盾的限制。而阿尔都塞在论述多元决定的一般规定性时,其强调更多的是诸多矛盾构成的统一体这个结构对矛盾的限制。另外,毛泽东在论述矛盾的特殊性的时候,大部分观点是带有主体性的,而阿尔都塞对矛盾的论述则是反主体性的。故阿尔都塞视域下的毛泽东思想显然是被结构主义化了的,即阿尔都塞对毛泽东的诠释带有自己结构主义的理论前见。

2. 复杂结构既与性的建构

在《关于唯物辩证法(论起源的不平衡)》一文中,阿尔都塞明确地指出,“关于什么是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特殊性这个问题,我们在列宁和毛泽东的这些著作中可以找到问题的理论解答”^{[1]175}。到这个时刻,毛泽东著作已经以显性的形象被阿尔都塞做为逻辑论证的工具。

阿尔都塞重点提到了毛泽东对矛盾的特殊性定义的三个新概念,其目的是为了论证他个人的观点:矛盾具有的结构复杂性和既与性。毛泽东所提出的矛盾的三个概念分别是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的区别、矛盾的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的区别和矛盾的不平衡性。毛泽东的这些思想均为阿尔都塞所关注。在论证矛盾的复杂性和既与性的时候,阿尔都塞较多关注的是主要矛盾和非主要矛盾、矛盾的主要方面和非主要方面这两点。不过,阿尔都塞对毛泽东矛盾

思想的解读是建立在结构主义基础之上的,由此来证明矛盾的结构复杂性和既与性,从而将事物建构成一个有着自身特定结构的矛盾体。

毛泽东对于矛盾的主次关系是这样论述的:“在复杂的事物的发展过程中,有许多的矛盾存在,其中必有一种是主要的矛盾,由于它的存在和发展规定或影响着其他矛盾的存在和发展。”^{[3]320}毛泽东如此着眼于主次关系来研究矛盾的特殊性具有独创性,这是对马克思和列宁的辩证法思想的进一步推进,是结合中国革命实际情况的理论发展。也就是说,毛泽东对主次矛盾和矛盾的主次方面的研究,是为了解决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其理论阐发是为现实的政治实践服务的。而毛泽东关于主次矛盾和矛盾的主次方面的区分则是为了具体阐明矛盾的特殊性。通过对社会矛盾及其复杂运动过程的分析,毛泽东明确指出不能将所有的矛盾平等对待,在一定的情况下,矛盾会发生转化,矛盾双方的地位也会发生转化。

在阿尔都塞看来,毛泽东关于矛盾的思想正是反对黑格尔思辩辩证法的利器,蕴含着对黑格尔辩证法的总体性和还原论的驳斥,即排斥了黑格尔试图回归原始的简单统一体的理论前提。阿尔都塞认为,毛泽东对矛盾的主次关系和各种矛盾的特殊性的强调,突出的是不同矛盾固有的差异性,即不可通约性。在此基础上,阿尔都塞认为,毛泽东与黑格尔有着本质差异,前者将事物看作一个由多种矛盾构成的复杂过程,而且这种复杂过程是“既与的”和原生的,而不是黑格尔视野下的从一个原始的本质矛盾发展出来的。显然,阿尔都塞对毛泽东的矛盾观做出如此发挥,乃是基于其自身的结构因果观。这种对毛泽东《矛盾论》及其辩证法思想的诠释,浸透着阿尔都塞自身的结构主义思想特质。

所以,与其说毛泽东的矛盾观是阿尔都塞

论证矛盾的结构复杂性和既与性的理论根据,不如说阿尔都塞在其独特的理论视角下重新诠释了毛泽东的矛盾观。毛泽东只是明确了各种矛盾的不同地位,阿尔都塞却站在反本质主义和反还原主义的立场上确立了各种矛盾在结构中的原始存在状态。由此可见,毛泽东思想的出场,始终只是论证阿尔都塞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工具。

3. 多元决定论的形成

阿尔都塞在论述多元决定论的过程中再次提到了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以及矛盾的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与之前论证矛盾的结构复杂性和既与性时强调各种矛盾存在状态的复杂性和原始性不同,阿尔都塞在论述多元决定论时,是通过毛泽东关于矛盾的不平衡发展的原则来论证的,此时阿尔都塞的理论目的是强调结构的主导性和结构对其要素的支配关系。

毛泽东是这样来阐述矛盾的不平衡性的,他认为,在研究矛盾特殊性问题中,如果“不研究这两种矛盾情况的差别性,那将陷入抽象的研究,不能具体地懂得矛盾的情况,因而也就不能找出解决矛盾的正确方法。这两种矛盾情况的差别性或特殊性,都是矛盾力量的不平衡性。世界上没有绝对地平衡发展的东西,我们必须反对平衡论,或均衡论”^{[3]326}。毛泽东强调矛盾的不平衡性是在强调矛盾的特殊性的基础上进一步强调矛盾的历史性,即矛盾的存在状态并不是永恒的,而是历史地发展着的,而且在发展过程中,矛盾与矛盾之间的力量也是不平衡的。

对于阿尔都塞来说,矛盾的不平衡性只是支撑其论证结构的论据,在这种意义上矛盾的不平衡性已经被转义了。那么,在阿尔都塞的视角中,一个复杂整体即一个矛盾对其他矛盾的支配关系的意义是什么呢?他认为,一个矛盾对其他矛盾的支配是与它们所构成的整体结

构相关的。复杂整体具有统一性,但不是黑格尔式的表面的差异性和本质的统一性,而是复杂结构自身固有的统一性。所以,在矛盾与矛盾、矛盾各方面之间的支配关系中,起决定性作用的不是主要矛盾,而是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共同组成的结构。阿尔都塞这种反主体的做法本质上是对本质主义和主体主义的一种理论反驳,但他过度注重结构的做法,实际上又是一种新的结构主体主义。

此外,阿尔都塞还将矛盾的不平衡性提升到普遍性的地位,认为矛盾的不平衡性适用于任何情况。这显然是对毛泽东关于矛盾的普遍性思想的进一步发挥。阿尔都塞认为,对于社会形态来说,社会中具有各种复杂矛盾且诸矛盾的力量是不平衡的,而不同的社会形态之间的具体矛盾的关系同样也是不尽相同的。所以,推而论之,任何社会形态所具有的矛盾都是不平衡的。

总而言之,无论从哪个方面来看,阿尔都塞都是以结构主义的理论前见来解读毛泽东的。阿尔都塞文本中的毛泽东思想被统摄在结构主义的思考框架之中,因此,阿尔都塞关于对象的解读,更多的是侧重于各对象之间的关系、诸对象之间形成的结构等,而不是侧重于对关系和结构中的个体对象的研究。

三、阿尔都塞解读毛泽东方法论的合理性和局限性

由上文可见,1960年代阿尔都塞在自身的理论建构过程中曾多次借助于毛泽东的思想资源,实现了他自身思想即多元决定论的创立。阿尔都塞借助于毛泽东的思想资源实现了带有结构主义色彩的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变革,在此基础上确立了结构主义的社会发展观。自阿尔都塞解读毛泽东思想开始,毛泽东思想就成为当代西方激进思想的一大理论资源。故我们

有必要厘清阿尔都塞解读毛泽东思想的方法,以达到对其的辩证认识。

1937年,毛泽东写作《矛盾论》的目的,是从哲学的高度肃清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和右倾错误思想路线,从辩证法的角度对错误思潮进行批判,而毛泽东同时期的《实践论》,是从认识论的角度对错误思潮进行批判。《矛盾论》深化了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赋予辩证法以新的具体内容,实现了马克思主义辩证法与中国革命实践的有机结合。

阿尔都塞在《保卫马克思》中重提毛泽东,有其特定的历史背景,并且也有特殊的理论和现实诉求。当时,斯大林僵化的经济决定论受到许多人的反对,人本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因此大行其道。当时的阿尔都塞敏锐地看到了这两种对立思想所具有的共同本质——意识形态,并致力于建立不同于这两种思潮的“科学的马克思主义”。

在重建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的过程中,阿尔都塞从结构主义角度采用“症候阅读法”重新诠释毛泽东,强调从问题式角度来提问,并将问题式和意识形态、历史背景结合在一起来思考问题,此种诠释虽有一定的合理性,但也造成了对毛泽东思想真实内涵的遮蔽。

一方面,阿尔都塞转变了毛泽东思想的真实语境,与文本的本真含义不符。马克思、恩格斯并没有专门的关于辩证法的著作,其辩证法只是一种实践形态即具体运用于研究自然和社会的科学方法。毛泽东的《矛盾论》实际上是对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思想的继承和发展。而阿尔都塞则不同,他在诠释毛泽东辩证法思想时建构了带有浓郁结构主义色彩的多元决定论思想。为了反对斯大林式的经济决定论和人本主义的马克思主义,阿尔都塞已经脱离了毛泽东思想产生的历史语境和本真意蕴。从本质上而言,阿尔都塞对于毛泽东思想的解读是在其症

候阅读、断裂说、意识形态等框架下进行。

另一方面,阿尔都塞无法凸显毛泽东《矛盾论》的实践品格,其单纯的理论建构无法改变现实。长期以来,解读毛泽东哲学的方法论视角大致有三种,即理论哲学视角、实践哲学视角和文化哲学视角。理论哲学的方法论视角,是对《矛盾论》等毛泽东的文本进行理论阐释和发挥;实践哲学的方法论视角,着重发挥毛泽东思想的实践品格,将其与社会现实相联系;文化哲学的方法论视角,是将毛泽东思想与现实中的文化建设结合起来,为文化建设提供指导。由此可见,阿尔都塞诠释毛泽东思想的理路是典型的理论哲学之路。^[4]

众所周知,毛泽东的《矛盾论》是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一大力作,其重要特征之一就是哲学的大众化。《矛盾论》中的思想资源是汇集了中国人民的革命经验的,是为解答中国的民族解放和社会解放这类问题的。^[5]而阿尔都塞重新诠释毛泽东思想完全是为了其理论创新的需要,无法很好地实现理论与实践的结合。虽然阿尔都塞也有很强的现实关怀,但是,为了保证其理论的自洽性,他在引证毛泽东思想的过程中忽视并抹杀了毛泽东哲学的实践品格。正因如此,阿尔都塞企图采用结构主义的方法重建科学的唯物辩证法,而且其所做的努力始终是在理论范围内的,群众甚至连大学生群体都难以理解其理论,故其对实践的实际推动作用较小。

阿尔都塞采用上述方法诠释毛泽东的思想资源,此种做法不仅没有能够回到本真的毛泽东思想,而且也没有回到本真的马克思主义。阿尔都塞以特定的理论前见来使用毛泽东的理论资源,并没有真正理解马克思的经济决定论和辩证法的本义,反而将自己的结构主义的经济决定论强加于毛泽东思想和马克思主义。

四、结语

综上所述,阿尔都塞对毛泽东哲学的结构主义诠释,开创了具有一定意义的文本解读方法,取得了一定的理论成果:其一,立足于毛泽东关于矛盾的对抗性和非对抗性的思想,阿尔都塞对多元决定的确切内涵作了深刻阐发;其二,通过吸收和借鉴毛泽东关于矛盾特殊性的相关思想,阿尔都塞论证了矛盾结构的复杂性和既与性;其三,通过对毛泽东主次矛盾、矛盾的主次方面思想的深度重构,阿尔都塞确立了自身结构主义的多元决定论思想。公允地说,阿尔都塞对毛泽东《矛盾论》的研究和诠释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他以别样的、带有先验色彩的结构主义方法凸显了毛泽东辩证法的丰富内涵。然而,这一解读也有其局限性:脱离本真的历史实践,对毛泽东思想作了过于抽象的纯粹理论化处理;“症候式阅读”方法单纯注重文本自身的问题,而忽视了文本与思想和社会现实更深的逻辑关联。对此,我们应采取辩证的态度来看待。

参考文献:

- [1] 路易·阿尔都塞. 保卫马克思[M]. 顾良,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
- [2] 弗雷德里克·杰姆逊. 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杰姆逊教授讲演录[M]. 唐小兵,译. 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55.
- [3] 毛泽东. 毛泽东选集:第1卷[C].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 [4] 陈世珍. 解读矛盾论实践论的三种视域[J]. 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4(4):80.
- [5] 松村一人. 论毛泽东哲学的意义(之一)——以《矛盾论》为中心[J]. 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1984(3):30.



引用格式:周良发. 余英时文化观释略[J]. 郑州轻工业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17(3):34-41.

中图分类号:G122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9/j.issn.1009-3729.2016.03.006

文章编号:1009-3729(2016)03-0034-08

余英时文化观释略

An interpretation on Yu Ying-shi's viewpoints of culture

周良发

ZHOU Liang-fa

安徽理工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安徽 淮南 232007

摘要:作为当代华人世界著名的历史学家、汉学家,余英时认为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生活方式,具有整体性特征,文化与文明之间存在一定差异。关于近代以来的民族文化危机,余英时认为:近现代中国知识分子救亡图存的路径选择是其产生的背景,仰慕西方文化和反传统是其产生的原因,妄自尊大是其产生的心理因素,并主张用社会学中的“美憎交织”理论弥补人们对文化危机认识的不足。在民族文化的重建上,余英时认为:正确处理中西文化关系是文化重建的理论前提,重拾“五四”文化精神是文化重建的逻辑起点,坚守学术独立是文化重建的基本原则,重构价值系统是文化重建的主要路径,知识分子是文化重建的主导力量。余英时的文化思想启示我们: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首先,应摆正中西文化,审慎处理传统与现代、本土与外来的关系;其次,应构建文化价值系统,将其视为建设文化强国的根本任务;再者,应让广大知识精英积极参与,知识分子与生俱来的理想主义和社会关怀,正是文化强国建设不可或缺的精神指引。

关键词:

余英时;
文化;
文明;
文化危机;
文化重建

收稿日期:2016-04-05

作者简介:周良发(1979—),男,安徽省六安市人,安徽理工大学讲师,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中国近现代哲学与中西文化。

余英时(1930—),安徽省潜山县人,香港新亚书院第一届毕业生,美国哈佛大学历史学博士,现为普林斯顿大学讲座教授,当代华人世界著名历史学家、汉学家。2006年荣获有“人文诺贝尔奖”之称的“克鲁格人文与社会科学终身成就奖”,2014年荣获唐奖首届汉学奖^[1]。余英时虽多年求学、执教于海外,然其学术旨趣仍深植于故国文史之中,其学术论著带有浓厚的中国情怀。作为当代史学巨擘,余英时治学不求杂而无统的“博雅”,也不由“专”而“通”,而是以西方文化为参照,期望为中国文化传承贡献一己之力。随着余英时学术著述的引进出版,学界对其政治制度史、学术思想史、中外关系史、新儒学思想、红学探佚学、知识分子观、学术人物论、历史哲学观立论甚多;而关于其文化层域的研究则相对薄弱,现有研究成果仅有侯宏堂^[1]的《余英时中国文化重建思想述略》、李梦云^[2]的《余英时文化危机与文化重建思想述略》、王新强^[3]的《论余英时文化史观的三维向度》,故仍有深挖探析之必要。鉴于此,本文拟对余英时关于文化方面的言说详加评析,以展现这位海外华人学者的中国文化情结及其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刻思考。

一、文化的内涵及其特征

何谓文化?其内涵如何界定?它又有什么特征?这些是探究余英时文化观必须首先明确的问题。经过多年的深度运思,余英时对文化的内涵、特征,以及文化与文明之关系进行了独具慧识的理论思考。

1. 文化的内涵

文化是一个含意极其广泛的概念,不同时代、不同族群、不同学科的学者对此有着不同的理解,我们可以毫不费力地列举一两百个关于文化的释义。比如,英国文化学家爱德华·泰勒认为,“文化是包括全部的知识、信仰、艺术、

道德、法律、习俗,以及作为社会成员的人所掌握和接受的任何其他的才能和习惯的复合体”^[5];现代新儒家梁漱溟认为,文化是一个民族生活的样法,包括精神生活、社会生活和物质生活^[4];《现代汉语词典》把文化定义为,“人类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7]。诸种观点可谓歧义纷呈,难以定论。而余英时在文化内涵的界定上显得特别清醒和理性,体现出一位史学大家的特有气质。文化是什么?余先生坦言这是很难回答的问题,故其不企望给文化下一个让人普遍接受的定义,而是于现有释义的基础上作出自己的理解。他说:“(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生活方式,主要是精神生活方面的事,如思想、学术、宗教、艺术之类,而关键尤其在‘方式’两个字上。”^{[8]493}他进而指出,文化的内涵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前者包括人类活动的一切成果;后者则专指社会的精神层面,包括学术思想、艺术成就等。按照这种理解,余先生认为社会上广泛流传的“‘五四’文化精神”“文化工作”“文化运动”便是狭义文化,而“文化接触”“中西文化”“文化融合”则是广义文化。在此基础之上,余英时继而强调,文化内涵的广义、狭义之分并非中文的独有现象,英文世界同样如此,可见文化的内涵具有歧义性是一个普遍现象,我们只有多加留心,才能够分辨其内涵之广义与狭义。

2. 文化的基本特征

由于文化是一个非常宽泛的概念,对其特征的界定同样是一件相当困难的事情,以至于不同的人有着不同的理解和认识。余英时秉持着理性的治学态度,先从国内外学者关于文化的诸种定义入手,由此条分缕析出文化的基本特征。美国哲学家约翰·杜威认为,“文化是各种风俗习惯的一个复杂体,它具有维护它自己的倾向”^[9];英国文化学家马林诺夫斯基认为,文化“显然是一个有机整体,包括工具和消

费品、各种社会群体的制度宪纲、人们的观念和技艺、信仰和习俗”^[10]；国学大师钱穆则强调，“文化指的是人类生活之总体，而人类生活则是多方面各类部门之配合”^[11]。在余英时看来，上述文化定义中的“复杂体”“有机整体”“人类生活之总体”等表述无疑表明文化具有整体性的特征。关于文化的特征，学界已有多种说法，余英时何以唯独偏爱“整体性”？深究其因，他认为近代以来众多学者只看到各类文化的个性特征（如斯宾格勒、汤因比、梁漱溟等人的文化类型学），却没有对文化的整体性特征予以应有的关注，那么“在观念上势必会发生是否有某一因素为整体文化的基础的混乱”^{[12]136}，进而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人们对文化体系的整体认识；而以整体观审视和解读文化，能够更清晰地呈现不同文化类型碰撞与交织、互文与融通时的情态和“足迹”。余英时进而指出：“由于文化是整体性的，所以一种文化接受另一种文化时便不能不采取使外来的文化因素与自己的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途径，如果撇开自己的文化传统不顾，一味地两眼向外面祈求，则结果一定是失败的。”^{[12]144}循着这种思路，我们可以解释佛教何以能够在中国存活乃至绵延不绝，并成为中国文化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能够说明近代以来国内的文化本位派与全盘西化派在对待中西文化态度上的偏颇之处。

3. 文化与文明之异

细致研读余英时的论著可以发现，他对文化的解读是与其对“文明”的解读联系在一起的。在《文明论衡》系列文章中，余英时不仅花费大量篇幅谈论“文明”“野蛮”“传统”与“自觉”，还对“文明”与“文化”之差异作了细致入微的学理辨析。随之而来的问题是，余英时以研治中国文史著称，何以对“文明”如此青睐？答案恰恰源于他对中西方历史学的深刻领悟。据其陈述，西方史学家如汤因比笔下的“文明”

比“文化”的意义广博，而中文语境中“文明”也远较“文化”的内涵丰富。基于这种认识，余英时对文化与文明之异作了较为精细的分析。在他看来，“文化”在古代中国具有鲜明的居高临下的意味，如《说苑·指武》所谓“文化不改，然后加诛”，即含有挟文以凌人之意，南朝文学家王融所谓“敷文化以柔远”亦含有侵略弱势民族的口吻；而“文明”之“明”具有光明、朗明、高明之意，颇能衬托出一种至上的人生境界。从词源学角度来看，“化”字单独地只能表示某种性质或状态，作为后缀，必须借助词根方有意义，其词义的褒贬完全依其词根而定；而“明”字与后儒所谓“虚灵明觉”之“明”相通，《大学》首章就说“大学之道，在明明德”，故含有“自觉”之义。依其之见，“自觉”又恰恰承载着文、明两重精神的含义。需要说明的是，余英时一再申明其抑扬“文化”与“文明”完全出于个人的偏好，没有什么特别的意义，但从字里行间仍可感知他在两者差异论定上的态度相当严谨慎重。

二、文化危机的深度剖析

鸦片战争以来，西方列强凭借坚船利炮和强势文化，使近代中国国势陵夷、文化传统难以赓续，引起国人普遍的行为失范和心理焦虑，中国陷入了民族危机与文化危机的双重危机之中。如何消解民族、文化危机进而建构现代国家，成为近代中国一代又一代知识分子深切忧思的时代课题。作为极具忧患意识的当代学者，余英时先生对近代以来中国的民族文化危机作了颇为细致的学理探讨，对文化危机产生的背景、形成的原因及其深层次的心理因素进行了深刻剖析。

1. 文化危机产生的背景

关于近代以来中国的文化危机，西方史学界长期盛行着“冲击—回应”说和“挑战—应战”说，认为西方经济文化的强势入侵导致了

近代中国民族与文化危机的产生。此论乍看起来确有充分理据,毕竟西方列强的侵略导致近代中国震荡与激变已是无可争议的事实,但它带有浓厚的西方文化中心主义的色彩,况且尚不足以完整而深刻地说明中国何以采用这样或那样方式“回应”西方的冲击。对于欧美史学界的理论假设,余英时表示不能完全接受,因为这个假设最多只能适用于军事及外交领域,却不能充分解释社会、思想方面的变动。缘于这种认识,他抛开近代中国文化危机的“外铄说”,着力探寻其产生的内在理路,即认为近代中国知识分子才是文化危机产生的主要推手。在他看来,百余年以来的文化危机实则与民族认同密切相关。“一个世纪以来,文化危机和文化认同在中国相伴而生,并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互相激荡。”^{[13]44}在近代中国的民族认同上,无论文化保守主义者还是全盘西化论者抑或民主革命领袖,无不以西方为认同模板:胡适的“西化”以美国为范本;国粹派认为现代西方的价值观念(中国)“古已有之”;孙中山早年主张“迎头赶上”西方,晚年则转向“以俄为师”(孙中山认为1917年后的俄国代表了新西方)。对于寻求中国现代认同的人而言,“西方”似乎永远是中国文化认同的核心内容。近代中国知识分子唯西方文化“马首是瞻”,直接决定了他们对传统文化现代价值的研判和论定所持的立场。基于这种情形,余英时痛心直言:“民族主义在中国已成为彻底否定自己文化传统的力量了”,“比较有影响力的中国知识分子似乎都不承认自己的文化传统还能在民族的认同中发挥什么积极的作用”^{[13]47}。言下之意,余英时认为,近现代中国知识分子救亡图存的路径选择,恰恰导致了民族文化危机的产生。

2. 文化危机形成的原因

民族文化危机是现代社会的一种普遍现象,多数文化学家认为它是后发现代国家在社

会转型中必然会出现的一种现象或结果。在社会转型中,传统文化及其价值系统受到现代力量的侵蚀而逐步解体,而新的文化价值系统又未能及时取得与传统文化同样的地位,文化危机由此泛起并绵延。然在余英时看来,中国近代以来的文化危机却远甚于其他国家,他心怀忧惧地说:“自19世纪中叶以来,中国的文化危机随着时序的迁流而不断加深,一直到今天还看不到脱出危机的迹象。”^{[13]32}究其原因,余英时分理出两大诱因:一是仰慕西方文化。在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浸染下,晚清以来稍明国际形势者无不主张仿效西方,他们“一心一意以‘西方’为范式,并借助西方的‘新思想’‘新方法’来重建中国”^{[13]48},中国传统文化非但无法获得应有的位置,反而被视为现代化的阻碍。二是反传统。仰慕西方文化的一个重要后果就是对传统文化的长期忽视,以至于20世纪以来中国历经两次大规模的反传统浪潮。新文化运动的勃兴以及1949年后极左思潮的泛滥,遂使传统文化失去生存的政治社会环境,许多传统道德,诸如仁义、慈孝、中庸、和谐、容忍等,不是遭到唾弃就是受到歪曲。旧的价值系统已残缺不全,新的价值系统尚未形成,于是出现了极其可怕的思想文化“真空”状态。鉴于此,余英时沉痛地说:“我们的文化遗产在现代反传统和慕西化的双重打击之下,已没有多少剩下来了。礼乐教化早已被现代中国知识分子所鄙弃不必去说,即使琴、棋、书、画这一类艺术修养也被看作‘旧式士大夫’的清闲活动而被嗤之以鼻。以戏剧而论,不但典雅的昆曲早已没落到难以挽救的地步,即使流行了一两百年而且是‘雅俗共赏’的京剧,现在也已少有问津者了。”^{[13]251}

3. 导致文化危机的心理因素

论及导致近代中国文化危机的心理因素,广为流传的观点是:中国一向以“天朝上国”自居,将外国人一律视为夷狄,但清代中叶以来屡

败于西方列强,可谓受尽屈辱,终在心理上为列强所征服,自此由妄自尊大变为极端自卑。余英时认为,这种说法固然没有什么破绽,但只能简单地说明近代以来国人长期以西学为范本,却无法诠释中国现代转型背后的深层次的迂回和曲折,而社会学中“羨憎交织”理论则可弥补人们对文化危机认识的不足。他说:“‘羨憎交织’的心理状态起于企羨和憎恶的情绪受到压制,而又不可能得到满足。”^{[13]51}这种心理状态的形成必须满足两个条件:一是民族(或国家)自认对于它所企羨的对象基本上是平等的;二是在现实上它同对方处于不平等的状态,以至于这一理论上的平等几乎没有可能实现。在他看来,“羨憎交织”心理因主观和客观条件相异虽有不同的表现,但它的存在和影响则相当普遍,如法国之于英国、德国之于英法、俄国之于西欧诸国。通过对法国、德国、俄国历史进程的比照,我们可以清晰地发现,近代中国完全具备“羨憎交织”生成的情境:其一,中国的文明足以与西方比肩,这是举世公认的事实;其二,中国在19世纪与西方强弱悬殊,处于绝对不平等的地位。这种情境给中国知识分子滋生“羨憎交织”的心理提供了温床,倘若遇到客观形势发生变化,它就会以种种不同的形式表现出来。比如,国粹派在正面维护中国传统文化的同时,也在侧面对西方文化流露出一种仰慕的意味;西化派在正面宣扬西方文化的同时,却在侧面仍未能忘情于中国传统文化。最后需要指出的是,余英时着力阐述的“羨憎交织”理论虽然不是解释近代中国文化危机的唯一根据,但它确实开辟出一条理解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的新路径,仅此一点,就足见他对于现代历史社会学的卓越贡献。

三、文化重建的基本主张

当代历史学者郑师渠认为,在近代中国,文

化危机是更为深刻的民族危机^[14]。倘要化解民族危机,根本着力点在于重建民族文化以增强民众的民族文化认同感。百余年来,有识之士无不致力于谋求民族认同和文化重建以消解文化危机,余英时亦然,其基本主张主要体现以下五个方面。

1. 正确处理中西文化关系是文化重建的理论前提

在现代科技和全球化浪潮的助推下,各国文化之间的碰撞与交流、互文与融合已是无可辩驳的事实。在此情形之下,中国文化的重建工作显然不能无视世界各国的文化精华,故余英时认为文化重建的理论前提是正确处理好中西文化之间的关系。在他看来,近代以降,列强欺凌、西学冲击,致使中国纲颓纪紊、传统文化式微,然中国文史传统的固有价值犹在。虽说传统文化纷繁博杂、良莠不齐,但我们决不能笼统地对待并作简单化处理。故在文化重建上,一方面要以中国传统文化和历史为重建主体,借助传统文史的诸种内在理路,对其进行深入系统的学理剖析,发掘其蕴含丰富且历久弥新的价值观念;另一方面,西方的优秀文化应在中国文化重建的过程中扮演不可或缺的角色,因为“今天中国所谓文化重建决不仅仅是旧传统的‘复兴’”,“如果我们所期待的文化重建无可避免地要包涵着新的内容,那么西方的价值与观念势将在其中扮演重要的角色”^{[7]435}。我们需要做的是秉持一种开放的文化心态,积极学习借鉴和采撷西方文化的精华。面对西学的挑战,余英时认为这不是威胁而是一种契机,中国文化应借机不断调整和更新。只是在吸收西方文化的同时,必须保持中国文化本位的立场,即中国文化因采撷西方文化得以重建,却不能因汲取外来的文化元素而丧失自身的文化主体性。只有经过现代文化洗礼仍能持守自己的文化特色,中国文化方可获得真正的新生,进而为

文化重建扫清理论上的障碍。

2. 重拾“五四”文化精神是文化重建的逻辑起点

民主与科学是“五四”新文化派高举的两面旗帜,余英时认为二者使新文化运动成为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具有明确方向的思想运动。虽然“五四”时代的人物在思想文化上存在这样或那样的不足,但民主与科学确实代表了现代文明的主要趋向,在国人思想解放上确曾发挥过重大作用。民主与科学虽是近代西方的文化观念,但它们与中国文化并不相悖。英国科学史家李约瑟多次强调,中国自有科学传统,民主也与儒家和道家的政治理念有相通之处。当然,我们重拾“五四”文化精神,将民主与科学作为文化重建的逻辑起点,并不意味着重蹈全盘西化的覆辙。需要说明的是,余英时所谓的“逻辑起点”有两重含意:一是离开民主与科学的现代化是不可想象的,这是现代中国文化重建的基本保证;二是现今毕竟与“五四”时代的情境存在差异,民主与科学显然不能穷尽文化重建的所有领域。例如,近代以来中国学界一直处于急迫的亚健康的心理压力之下,遂使“五四”人物的视野和胸襟不够开阔,故而不能对中西文化在道德、宗教等精神层面所遇到的现代危机产生深刻的同情和理解。所以我们在肯定“五四”启蒙思想的同时,需要超越“五四”的思想境界,重释“五四”的时代价值,“这就是中国文化重建在历史现阶段所面临的基本情势”^{[8]437}。

3. 坚守学术独立是文化重建的基本原则

儒家学说向来主张道统应建立在政统之上,即学术活动较之政治活动是更具基础性、根本性、独立性和决定性的人类活动。然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在中国文化体系中,政统一向居于中心位置,尤其是“汉代经学与利禄相结合”以后,学术思想旋即丧失了自身的独立性,传统士大夫(知识分子)治学一般不为繁荣学术,大

多是为了个人仕途,将其作为一种入世之梯。在此情形之下,知识分子往往视学术为“治国平天下”的工具,乃至成为一种牢不可破的价值观念绵延后世。囿于“学术是政治的工具”的观念,近现代以来的历次文化运动无不具有鲜明的政治意图。余英时认为,“学术政治化”是中国数千年积淀下来的一大传统,重建中国文化的先决条件之一就是要将知识分子的注意力从政治领域转移到学术领域上来^{[4]432}。应当说明的是,余英时此论并非将学术与政治相对立,亦非将“学术孤立”,而是谋求学术的自立,意在强调学术独立乃是文化重建的基本原则。但也要明白:学术独立并非朝夕即可实现的,它需要特定的情境和条件作为支撑,如1940年代胡适曾提出学术独立的十年计划,就很快被战争的阴霾所掩盖。或许正因为学术独立之不易,故余英时语重心长地说:“今后文化重建的过程中,我们必须彻底改变看法,牢牢地守住学术文化岗位。”^{[8]433-434}惟其如此,才能为民族文化重建营造良好的学术氛围。

4. 重构价值系统是文化重建的主要路径

文化重建是一项浩大的系统工程,涉及文化体系的各个领域和层面,牵一发而动全身,故文化重建的路径选择尤为关键。在文化重建的路径选择上,余英时始终保持理性和严谨的治学态度,认为重构文化价值系统是其主要路径。在余英时看来,中国文化重建的首要工作就是要重构新的价值系统,依托新的价值观念,分辨出中国文史传统中的精华与糟粕,找寻其中有益于文化重建的现代性因素。他指出:“只有建立了新文化价值系统之后,不合时宜的旧文化价值系统才会让位。传统是无所不包的,其内容也是随时在改变的。文化只能推陈出新,既不能无中生有,也无法完全从外面移植过来,有志于文化重建的中国知识分子首先便要认真地去了解中国的文化传统,并在传统中找寻有助于现代化

的精神资源。”^{[9]165-166}他着重强调,这是西方近代以来启蒙运动带给我们的一项重要启示。纵观其生平治学,余英时不仅是重构价值系统的理论倡导者,还多次著文挖掘明清学术思想中的现代性资源,力图“从价值系统的核心出发,疏解中国文化在现代的转化”^{[9]43}。

5. 知识分子是文化重建的主导力量

知识分子历来是思想文化的创造者和传播者,在文化价值系统的厘定、维护和传播上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余英时认为,近代以来中国的文化危机盖因清末民初士大夫即知识分子对西方文化羡慕交织所造成的,故文化重建亦有赖于现代知识分子。他说:“现代的民族认同必须先由每一社会中的文化精英阶层在思想上从事奠基的工作,这是各国历史所共同昭示的。民族观念的界定、厘清及传播,是知识分子的中心任务。”^{[13]49}在他看来,英、法、俄三国起主导作用的是贵族阶层中的知识精英,德国则是中产阶级知识分子,只有中国的情况稍有差别,大致可分前后两个时段:在清末寻求民族认同的是传统士大夫,而民国则代之以现代知识分子。虽然前后名称有异、重建方式有别,但他们在消解文化危机、重建民族认同上可谓殊途同归。

余英时重视知识分子之原因,大致说来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知识分子大多能够超越经济利害,一般不会因经济利益而丧失或违背其道德良知,更不会为了特殊的经济问题而与其他社会阶层发生冲突;其二,知识分子特有的理想主义气质,往往能够成为社会发展的精神引导,促使整个社会风清气正。正因为知识分子淡泊名利且秉持理想主义,余英时将文化重建的厚望寄托在他们身上。然而仅此两点似乎还不够完备,故其又对知识分子提出了两项更为高远的要求:一是文化上需有所建树,这是知识分子胜任文化重建工作的必备前提;二是

能够做到身体力行,不能如过去那般只会坐而论道。如若知识分子不能身体力行地做好文化工作,那么就难以获得社会民众的敬仰和尊重,更无法引领和担当文化重建的历史使命。

综上所述,余英时以对文化概念内涵的界定为立论起点,深刻剖析了我国近代以来文化危机产生的深层次原因,并援引西方社会学的“羡慕交织”理论透视了近现代知识分子的文化心态。对于中国文化重建问题,余英时提出了一系列富有建设性的建议,为我国当前的文化强国建设提供了有益启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首先,应摆正中西文化,审慎处理传统与现代、本土与外来的关系;其次,应构建文化价值系统,将其视为建设文化强国的根本任务;再者,应让广大知识精英积极参与,知识分子与生俱来的理想主义和社会关怀,正是文化强国建设不可或缺的精神指引。现今,我们再谈余英时的文化观,意在以其指引,认清我国文化发展的历史与现状,把握文化发展的规律和态势,以高度的文化自觉稳步推进文化强国建设。

参考文献:

- [1] 百度百科. 余英时[EB/OL]. (2015-03-21) [2016-02-28]. <http://baike.baidu.com/link?url=eVy9EN8adgVLssTiKWIUFihJe8is-EJdXJeyY-ccgNBUXyCNWodY4sFrz8DSrhEjg0U-dmnvsDwa-DshIE9VVNiHa>.
- [2] 侯宏堂. 余英时中国文化重建思想述略[J]. 学术探索, 2008(5):121.
- [3] 李梦云. 余英时文化危机与文化重建思想述略[J]. 吉首大学学报, 2011(6):55.
- [4] 王新强. 论余英时文化史观的三维向度[J]. 晋中学院学报, 2015(1):4.
- [5] 爱德华·泰勒. 原始文化[M]. 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 1992:1.
- [6] 刘梦溪. 中国现代学术经典·梁漱溟卷[M]. 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 1996:20.

- [7]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 现代汉语词典[K]. 5版.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1427.
- [8] 余英时. 文史传统与文化重建[M].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
- [9] 约翰·杜威. 自由与文化[M]. 北京:商务印书馆,1964:15.
- [10] 马林诺夫斯基. 科学的文化理论[M]. 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9:52.
- [11] 钱穆. 文化学大义[M]. 台北:经联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8:9.
- [12] 余英时. 文化评论与中国情怀(上)[M].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
- [13] 余英时. 现代危机与思想人物[M].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
- [14] 郑师渠. 近代的文化危机、文化重建与民族复兴[J]. 近代史研究,2014(4):26.

本刊暨《轻工学报》两微信公众号上线

为切实加强数字化建设,促进我校学报与广大作者、读者的沟通交流,扩大学报的传播和影响,更好地服务公众,本刊暨《轻工学报》两微信公众号于4月中旬正式上线,敬请关注。

[关注方式]个人注册微信账号后,可通过以下两种方式进行关注:

1. 登陆微信→选择“发现”→点击“扫一扫”→手机扫描《郑州轻工业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和《轻工学报》的微信二维码(见附图)→点击添加关注→成功。

2. 登陆微信→选择“通讯录”→点击上端的“公众号”→点击右上角“+”→在查找处分别输入“郑州轻工业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和“轻工学报”→搜索显示有腾讯金色认证标识的图标→点击添加关注→成功。

附图:“郑州轻工业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和“轻工学报”微信二维码





引用格式:胡海桃,曾凯.古代孝子娱亲浅析[J].郑州轻工业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17(3):42-47.

中图分类号:B823.1;D649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9/j.issn.1009-3729.2016.03.007

文章编号:1009-3729(2016)03-0042-06

古代孝子娱亲浅析

Brief analysis on ancient futiful son pleasuring parents

胡海桃¹, 曾凯²

HU Hai-tao,ZENG Kai

1. 军事交通学院 政治部, 天津 300161;

2. 贵州理工学院 宣传部, 贵州 贵阳 550003

摘要:娱亲指的是孝养父母要“致其乐”,应做到忠、察言观色与爱屋及乌。娱亲是孝的一种外在表现形式,其核心是诚敬之心。娱亲难在屈从,既不能为了让父母高兴而绝对服从,也不能在父母有过时不依不饶地劝谏不止,而是要懂得婉谏屈从之道,变通顺从,既顺父母之意,又成父母大义。娱亲背后的动机很复杂,里面包含了不同的现实诉求:或为感念父母养育之恩,或为赢得父母对自己的喜欢,或为自己争取更多的利益,或为赢得一定的社会名声,等等。但是,纯功利性的娱亲是一种伪孝,即使是借孝谋取私利,也应先孝后利,端正行孝初心。因此,我们要明辨真孝与伪孝,做到知行合一真孝。

关键词:

亲子关系;

孝;

娱亲

收稿日期:2016-03-10

基金项目:贵州省教育厅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项目(14QN047)

作者简介:胡海桃(1984—),女,湖南省桃江县人,军事交通学院讲师,博士后,主要研究方向:中国传统文化、社会性别。

从媒体报道的一些身边人、身边事中发现,现代的亲子关系有些颠倒,下对上的“孝”变成了父母一味顺从子女,而对自己的上一代关爱不足。究其原因,是因为有些人不知孝,有些人知孝而不行孝。孔子认为,大凡有孝心的子女孝敬父母,必须做到5个方面,即“居则致其敬,养则致其乐,病则致其忧,丧则致其哀,祭则致其严”^{[1]38}。在现代社会,“养则致其乐”提醒我们,孝养父母,不只是物质上的赡养,还有精神上的愉悦,要让父母放心、开心,也就是要娱亲。学术界对孝道多强调“致其乐”的重要性及其应然状态,较少论及如何“致其乐”。鉴于此,本文拟在深入分析娱亲内涵的基础上,探讨娱亲的具体方法,尤其是在遇到两难困境时如何正确对待,以明辨真孝与伪孝,为践行知行合一的真孝观提供参考。

一、娱亲的内涵

在继承孔子娱亲思想的基础上,曾子对“致其乐”做了进一步解释。《礼记·内则》写道:“孝子之养老也。乐其心,不违其志,乐其耳目,安其寝处,以其饮食忠养之。孝子之身终,终身也者,非终父母之身,终其身也。是故父母之所爱亦爱之,父母之所敬亦敬之。至于犬马尽然,而况于人乎!”^{[2]854}也就是说,孝顺的子女在奉养父母的时候,要使父母心情快乐,不违背父母的意志,使父母耳目愉悦,休息起居安逸无忧;说父母爱听的话,把好吃的、好看的先给父母享用;侍奉父母要忠心耿耿,始终如一,直到自己生命结束。从这段话中可以看出,所谓娱亲(“致其乐”)应从以下三个方面去做。

* 《庄子·外篇·至乐第十八》:“昔者海鸟止于鲁郊。鲁侯御而觞之于庙,奏《九韶》以为乐,具太牢以为膳。鸟乃眩视忧悲,不敢食一禽,不敢饮一杯,三日而死。此以己养养鸟也,非以鸟养养鸟也。”

** “老莱娱亲”的故事有多个版本,现广为人知的是编录于元代的《二十四孝》中“戏彩娱亲”的版本。该书成书较晚,故事经改编之后,省略了一些衔接的细节,有些地方读起来比较突兀。本文“老莱娱亲”的故事综合了以下3个版本:一是《艺术类聚·卷二十·人部四·孝》:“《列女传》曰:‘老莱子孝养二亲,行年七十,婴儿自娱,著五色采衣,尝取浆上堂,跌仆,因卧地为小儿啼,或弄鸟乌於亲侧。’”二是《太平御览·卷四百一十三·人事部五十四》:“师觉授《孝子传》曰:老莱子者,楚人。行年七十,父母俱存,至孝蒸蒸。常著斑斓之衣,为亲取饮。上堂脚跌,恐伤父母之心,因僵仆为婴儿啼。孔子曰:‘父母老,常言不称老,为其伤老也。’若老莱子,可谓不失孺子之心矣。”三是《二十四孝·戏彩娱亲》:“周老莱子,至孝。奉二亲,极其甘脆。行年七十,言不称老,常着五色斑斓之衣,为婴儿戏于亲侧。又尝取水,上堂,诈跌卧地,作婴儿啼,以娱亲意。”

一是忠。“忠养”即“中心养之”,以发自内心的诚敬之心奉养双亲。对父母之“忠”是没有时间期限的。子女长大成才不再依赖父母的时候,父母年老疾病缠身变成“拖累”的时候,甚至是父母离世之后,子女对父母之诚敬都不能松懈半分。

二是察言观色。“乐其心”“乐其耳目”是指要细心观察,从父母的需求出发,尽己所能地满足父母的需求,投其所好,所做之事要顺其心,所说之话要顺其耳,所见之物要顺其眼。遗憾的是,当下有些人侍奉领导,察言观色,溜须拍马,竭尽所能,而对双亲则用心较少,即使行孝也只是从其自身的角度出发,如同《庄子·外篇·至乐第十八》中鲁侯对待海鸟*,只是像对自己一样赡养父母,而不是从父母的需求出发赡养父母。

三是爱屋及乌。“爱父母之所爱,敬父母之所敬”,说起来简单,做起来很难。与此句相对的另一句是“恨父母之所恨,恶父母之所恶”。如果子女与父母所爱、所敬不同,或是子女之所爱、所敬正是父母之所恨、所恶,那么子女违逆自己的本心而顺应父母之志将是情感上的两难选择。

历史上较为有名的孝子娱亲故事是“老莱娱亲”**。春秋时期,楚国贤士老莱子为躲避世乱,与父母、妻子隐居,自耕自种,自给自足。老莱子非常孝顺父母,总是千方百计地讨父母的欢心。隐居生活清苦,他便寻找各种味美的食物给父母品尝;隐居生活寂寥,他便养些声音清

脆的乌鸟为父母解闷。老莱子家庭和睦,人长寿。他70多岁的时候,父母都还健在。人生七十古来稀,可是老莱子从不自称年老,甚至故意穿色彩斑斓的衣服,像顽皮的小孩子一样逗父母开心,希望他们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有一次,老莱子挑水经过堂屋的时候,不小心跌倒扭到了脚,恰巧父母在堂屋里见到了这一幕,老莱子担心父母知道脚跌了的实情后会伤心,就干脆忍痛将身体僵硬地倒地,夸张地像婴儿一般在地上啼哭,父母以为他是故意跌倒做秀的,也就不以为意,这样脚跌一事就被他巧妙地掩饰过去了。

这个故事的主旨是:为人子女,应该多替父母着想,为父母解忧,尽可能地让父母心情舒畅。但是,“老莱娱亲”的故事让鲁迅觉得不解和反感,他认为一个应该拄着拐杖的老头子竟然拿着“摇咕咚”在父母面前装可爱,太“装佯”了,而且后之君子将其改得“诈”起来,将其孝行极端化,有点过犹不及,让人心里不舒服^[3]。恢复故事可能的本来面目,老莱子并不是一个让人反感的人,似乎是一个人老心不老的“老顽童”,虽然没有成就一番事业以显父母,却竭尽所能忠养双亲,“致其乐”。

二、娱亲贵在诚敬

娱亲是孝的一种外在表现形式,其核心是诚敬之心。曾子曰:“孝有三:大孝尊亲,其次不辱,其下能养。”^{[2]1332}此说谓,孝顺父母有三种境界:首先是从内心深处尊敬父母,使父母从心底里感到高兴;其次是立身行道,扬名后世,为父母争光,不使父母蒙受耻辱;再次是让父母吃饱穿暖,为其养老送终。明代徐皇后的《内训·事父母章第十二》中说:“若夫以声音笑貌为乐者,不善事其亲者也,诚孝爱敬,无所违者,斯善事其亲者也。”清代王相的笺注补充到:“训言子女无诚敬之心,但以声音笑貌为娱亲

之饰,未足以为孝心也。孝出于至诚,敬生于至爱,无所违逆,斯云善矣。”意思是说,子女奉养父母,只有娱亲的外在表现而无内在的诚敬之心,并不能称为孝。老莱子之所以有穿彩服哄父母开心、诈跌让父母宽心、父母在而不言老等娱亲表现,都是出于他对父母的至诚至爱之心,所以看似滑稽的可爱之举而能流传千古、善以示后。

《礼记·祭义》曰:“孝子之有深爱者,必有和气。有和气者,必有愉色。有愉色者,必有婉容。”^{[2]1319}虽然相由心生,外表在一定程度上能反映人的内心世界,但大多数人难以明辨“相”与“心”之间的异同。有善于伪装者,有不善于表达者,眼见未必为实,“婉容”“愉色”“和气”有时未必为深爱,人心难辨,非日久难知马力。在现代社会,有些多子女家庭仍存在巧言令色、在父母面前争宠、争夺资源的现象,也有共得了患难却共不了富贵或共得了富贵却共不了患难的亲子关系,还有更为敏感的婆媳关系和养父母与养子女关系等。总之,有很多人只注重维持表面和谐而忽略了诚敬之心,因为娱亲的孝行是否内含诚敬之心并非一时三刻能察知,所以人们更为看重的是娱亲的外在之形而非内在之心,子女以声音笑貌“哄”父母开心,父母也图个一时的心情愉悦,彼此都降低了娱亲的基本要求。

三、娱亲难在屈从

奉养父母,既要诚敬又要顺意娱亲使其安乐无忧,那么,从父母之令而不争的绝对服从就是孝吗?

在《孝经·谏争章》中,曾子曾问孔子:“敢问子从父之令,可谓孝乎?”^{[1]47}孔子曰:“父有争子,则身不陷于不义。故当不义,则子不可以不争于父,臣不可以不争于君。故当不义则争之,从父之令,又焉得为孝乎?”^{[1]48}也就是说,

当父母有过失的时候,子女应当劝谏,“有非而从,成父不义”,不劝谏的话,反而会害了父母,陷父母于不义。

孔子反对将孝理解为唯父母之命是从,那么孝子应该怎样劝谏父母呢?曾子在《礼记·内则第十二》中曾说:“父母有过,下气怡色,柔声以谏。谏若不入,起敬起孝,说则复谏。不说,与其得罪于乡党州闾,宁孰谏;父母怒、不说,而挞之流血,不敢疾怨,起敬起孝。”^{[2]838}即就是说,父母有过错的时候,子女应当察言观色,选择一个恰当时机,和颜悦色、低声细语地加以劝谏;若是谏言不被采纳,应仍像往常一样孝敬父母,等父母高兴了再借机劝谏;如果犯颜劝谏让父母不高兴,与其得罪于乡党州闾陷父母于不义,不如硬着头皮再多加劝谏;如果父母因此发怒而打了自己,不能心存怨恨,应仍像往常一样孝敬父母。曾子认为,“父母有过,谏而不逆”^{[2]1334},也就是说,父母有过失时,应该顺而谏之,而不是忤逆;“父母恶之,惧而无怨”^{[2]1333},被父母所厌恶时,对父母应该心存畏惧而不是怨恨。

如果劝谏了但父母并不听取谏言的话,怎么办呢?曾子认为,事父母之道,“爱而敬。父母之行若中道,则从;若不中道,则谏。谏而不用,行之如由己。从而不谏,非孝也;谏而不从,亦非孝也。孝子之谏,达善而不敢争辩”(《大戴礼记·曾子事父母》)。此谓:父母行为如果合乎正道,就应听从之;如果不合乎正道,就应劝谏之。谏言若不被采用,父母不义行为的后果,就像是自己造成的一样。听从父母而不劝谏是不孝,劝谏父母无效却不再跟随父母也是不孝。孝子劝谏,是为了向父母讲明道理,而不是争辩好胜。

如果父母一直不采纳自己的谏言,子女是不是应该不依不饶地继续劝谏下去呢?《礼记·曲礼》曰:“子之事亲也,三谏而不听,则号泣

而随之。”^{[2]151} 亲子之礼与君臣之礼不同,君主若不义,臣下再三劝谏而君主不听取的话,臣下可以罢官离去。而亲子关系是不能改变的,谏言不被采纳也只能心怀悲切地留在父母身边,继续尽忠尽孝,希望有朝一日能感动父母,弃恶从善。孔子认为:“事父母几谏,见志不从,又敬不违,劳而不怨”(《论语·里仁》),“君子弛其亲之过,而敬其美”(《礼记·坊记》)。若是婉言劝告没有效果,子女应该多看父母的优点,少看他们的过错,应像之前一样尽心侍奉父母,不能私存忤逆之心。

事父母之道,虽然鼓励劝谏,但不主张力争,最终落脚点在“有隐而无犯”^{[2]169},不能忤逆,应当屈从。这里的“屈从”包含以下两层意思。

一是委屈顺从。子女有时候会迫于压力违背自己的本心而屈服顺从,其义近似于屈从,在古代颇为常见。《礼记·内则》曰:“子有二妾,父母爱一人焉,子爱一人焉,由衣服饮食,由执事,毋敢视父母所爱,虽父母没不衰。子甚宜其妻,父母不说;子不宜其妻,父母曰:‘是善事我。’子行夫妇之礼焉,没身不衰。”^{[2]838-839}这种屈从,尤其体现在父母之命的婚姻中,男子娶的多是父母喜欢的而非自己喜欢的女子,有时也会因父母不喜欢而被迫休妻,这是中国古代婚姻的悲剧。即使是在现代社会,有的仍是父母安排之下的相亲式婚恋,有的虽是自由恋爱,但一到谈婚论嫁,父母的意见仍非常重要,尤其是父母的反对意见,不得不屈从。

二是变通顺从。父母之令有时候是反复无常、相互矛盾的,子女并不需要句句遵旨照办,围绕其核心主旨从事即可。比如“舜孝感动天”的故事,舜的父亲、继母和弟弟想要杀害舜,几次合谋陷舜于险地,但舜每次都机智地化险为夷。舜知道父母兄弟的恶行之后,并没有因此埋怨他们,仍然一如既往地遵循孝悌之道,

仁厚待之。父母之命是让舜去死,若是屈从,舜应该一死了之,但舜并没有这么做。舜的避祸既可理解为是出于人求生的本能,也可认为是舜大孝的体现。舜若被谋害致死了,就会陷父母于不义,他们将会受到舆论、道德和良心的谴责(虽然其父母在策划谋害他的时候已经不在乎义或不义了,也无良心可言,但事后如若良心发现,而人死不能复生,难免会追悔莫及),舜是有所不从以成父母大义,以德报怨,让仇恨止于智者。现代社会,也有很多不像父母的父母,但即使父母对子女不仁不义,子女也不应该因此记恨报复父母,而应找到恰当的方式以保护自己,化解仇怨,尽己所能善待父母。屈从的最终目的,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顺父母之意,成父母大义,达到娱亲(“致其乐”)之实效。

四、娱亲的现实诉求

娱亲背后的动机有时很复杂,里面包含了不同的现实诉求:或为感念父母养育之恩,或为赢得父母对自己的喜欢,或为自己争取更多的利益,等等。我们并不排斥某些娱亲孝行有获利之动机,但是,纯功利性的娱亲是一种伪孝,即使是借孝谋取私利,也应先孝后利,故端正行孝初心是孝之根本。

其一,娱亲是一种求生本能。很多父母都偏爱“懂事”的孩子,子女中弱势一方往往更懂得察言观色,以求在夹缝中生存发展。比如,在古代帝王家,王子到一定岁数后几乎都能分封独立,而公主未来命运如何全看父王赐婚优劣,因此父爱成了稀缺资源。可帝王政务繁忙,且子女众多,女儿要得到父亲的认可是很不容易的。为争得父亲的宠爱,女儿们需机智聪明,了解父亲脾气性情,各显其能。唐代宗之女华阳公主,“韶悟过人,帝爱之。视帝所喜,必善遇;所恶,曲全之”^{[4]3663}。唐代宗即位之时,唐朝已呈现衰败之势,安史之乱、藩镇割据、吐蕃回纥

侵扰,内忧外患,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唐代宗可谓心力交瘁,其身边的人皆需小心谨慎,一言不慎就可能触怒龙颜。华阳公主主要讨好父亲,就必须细心观察父亲的喜恶,投其所好,避其所恶,曲意逢迎,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当然,若不懂得察言观色,有时候讨好之举也可能适得其反。

其二,娱亲能获得更多利益。古代没有实行计划生育,一般家庭子女人数较多,要在众多同辈中赢得更多关爱和重视,就必须让尊长关注和认可自己,娱亲之举是激烈竞争的需要。比如安乐公主,她是唐中宗李显与韦后所生,也是中宗最小的女儿,她“光艳动天下”“请为皇太女”。她受宠的原因有三:其一,她生于父亲帝位被废、贬谪房陵的途中,困顿苦闷交加之际迎来其生命,似乎预兆着李显恢复帝位的新希望,李显对她尤为疼爱,并脱下自己的衣服包裹住小婴儿,万般疼惜,取名为裹儿。^{[4]3654}其二,其生母韦氏与李显患难与共,她与父母在房陵一住就是14年(公元684—698),彼此建立了深厚的患难之情。其三,“姝秀辩敏,后尤爱之”^{[4]3654},她秀美聪慧,有“唐朝第一美人”之称,而且能言善辩,深受母亲喜爱。安乐公主也善于利用父母对自己的宠爱去哄父母高兴以达成自己的目的,“尝作诏,箝其前,请帝署可,帝笑从之”^{[4]3654},娇美嗲气的她模仿着朝臣刻板严肃的样子,双手奉上诏书请父亲签署通过,此时父亲并没有因为她干涉朝政而发怒斥责,反而因其举止反常可爱而笑着听从。受宠女儿要哄父母高兴是件较为容易的事情,安乐公主的娱亲手段反复奏效,父亲对其纵容一而再、再而三,以致她做事毫无忌惮、胡作非为,最后毒杀父亲,串谋夺权,被人诛杀,不得善终。娱亲,浅显地说,就是让父母高兴,但若无诚敬之心,娱亲这种孝行很容易偏离正道,最终惹祸上身。对于现代独生子女家庭来说,独子缺乏同辈竞

争,无需争夺就能获得父母之爱,在娱亲意识上难免有些欠缺,有时反而是父母费尽心思博独子欢心,使亲子关系本末倒置。

第三,娱亲能赢得社会名声。在古代中国国家国高度一体化的伦理政治中,娱亲这种孝行具有很大的社会价值。比如,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可以从两个角度来理解:对于为君为官者来说,“孝慈,则忠”(《论语·为政》),君孝慈,民才会忠,常言“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行”(《论语·子路》),为官者只有从修身出发做好自己,才能以上率下;对于普通人来说,孝亲才能忠君。儒家认为,忠是孝的发展和延续,若对父母不孝,其对君的忠诚度也将遭到质疑,也就是说,在一定程度上,孝名在加官晋爵中具有一票否决权,历史上有些官员在父母丧期不解官,结果被举报遭罢免,当然也有一些人故意在服丧期间哀毁过礼,以博孝名,有些人也确实因孝子美名被当局看中而受到提拔重用。在历代史书中,统治阶级常褒奖因为孝亲而放弃追求个人幸福权利的奉献精神,认为孝行具有极大的社会价值。

总之,娱亲是要父母乐,其核心是诚敬之心。娱亲的动机很复杂,但纯功利性的娱亲是一种伪孝,即使是借孝谋取私利,也应先孝后利,端正行孝初心。我们要明辨真孝与伪孝,做到知行合一真孝。孝是一种道德实践,从理论上讲清楚孝的内涵要求,是为了更好地践行孝道。现代人因面临很多选择常常因陷入道德困境而迷茫,需要优秀的道德精神来引导,我们探讨古代娱亲是为了弘扬孝道文化,以筑牢现代人的精神家园。

参考文献:

- [1] 《十三经注疏》整理委员会. 十三经注疏·孝经注疏[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 [2] 《十三经注疏》整理委员会. 十三经注疏·礼记正义[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 [3] 鲁迅. 鲁迅全集:第2卷[C].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262.
- [4] 欧阳修,宋祁. 新唐书[M]. 北京:中华书局,1975.



引用格式:秦婷婷. 虚无的抵抗,模糊的收编——从象征人类学视角反思亚文化研究[J]. 郑州轻工业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17(3):48-54.

中图分类号:C912.4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9/j.issn.1009-3729.2016.03.008

文章编号:1009-3729(2016)03-0048-07

虚无的抵抗,模糊的收编

——从象征人类学视角反思亚文化研究

Resistance to nothingness and faint incorporation

—Rethinking subculture studies from the view of symbolic anthropology

秦婷婷

QIN Ting-ting

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 北京 100011

摘要:以赫伯迪格的研究成果为代表的亚文化研究的两大核心概念是“收编”和“抵抗”,而他对“收编”的表述模糊不清且过分重视“抵抗”在亚文化中的作用,最终导致意义的虚无。可以从象征人类学视角对上述问题加以反思:其一,亚文化的抵抗意义来自于其代码的流动性和随意性,这正是象征符号多义性的体现;其二,亚文化研究采用了“亚文化抵抗主文化、主文化收编亚文化”这种二元对立视角,而在象征人类学看来,抵抗和收编的过程正是“社会戏剧”的演变过程,也是社会中有结构的部分对无结构的部分进行整理和归纳的过程。因此,亚文化研究要跳出“主文化—亚文化”“抵抗—收编”这类二元对立视角、避免将抵抗最终解读为虚无,应该拥有文化研究初起之时兼容并蓄的胸怀,从对具体象征符号的分析入手,通过深描,揭示出亚文化符号的不同意义及历史变迁。此外,也可在二手文献和理论阐释的基础上,加入访谈和田野调查元素,让现实生活中的而不是媒体中的亚文化成员开口说话。

关键词:
亚文化;
抵抗;
收编;
象征人类学;
社会戏剧

收稿日期:2016-02-09

作者简介:秦婷婷(1988—),女,安徽省金寨县人,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助理研究员,博士,主要研究方向:文化人类学和文化。

亚文化研究与象征人类学有相似的社会背景和深厚的学术渊源。由于所处时代接近,两者共同面对着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经济衰退的局面,包括失业率增长、移民带来的种族关系紧张和世界范围的学生运动。在思想领域,它们同样受到葛兰西的霸权理论、索绪尔的结构语言学和新马克思主义等思潮的洗礼。亚文化研究作为一门跨学科的研究,广泛吸收各学科的养分,包括人类学。例如,象征人类学代表人物之一的法国著名人类学家列维-斯特劳斯提出的“拼贴”“同构”等概念就为许多亚文化研究者所使用。此外,亚文化研究关于文化的概念也深受人类学的影响,不再将文化仅视为高雅文化、缪斯女神所掌管的经典美学模式,而是将其视为一种整体的生活方式。

本文拟从象征人类学视角反思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化研究中心(英文简称 CCCS)的亚文化研究,并以美国学者迪克·赫伯迪格所写的《亚文化:风格的意义》(后文简称为《亚文化》)一书作为代表。这项工作在国内亚文化研究领域尚未开展。赫伯迪格 1951 年出生于英国工人家庭,1974 年毕业于 CCCS 并获得硕士学位。《亚文化》一书是作者根据自己的博士论文改写而成的,是他的成名作与代表作,被喻为文化研究领域内里程碑式的作品,是亚文化领域中拥有读者最多、当下最为流行的一本专著。《亚文化》也是 CCCS 的集大成之作,在亚文化研究领域内影响广泛。书中的分析思路和理论并不是赫伯迪格一人之功,而是建基于整个学派的研究之上,例如,霍尔与保罗·威利斯等人在他之前已经用过“拼贴”“同构”两个概念,“收编”在霍尔的《通俗艺术》中也曾出现,对巴特“有意图的沟通”的借鉴也非赫伯迪格首创。Brian Torode^[1]指出,《亚文化》一书采用的文学批评理论、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论、美国亚文化社会学和法国结构主义等理论视角都是当代

文化研究中心成员所共享的。此外,从亚文化如何抵抗主文化,以及主文化如何收编亚文化的角度解读亚文化,也是 CCCS 成员共同的分析路径。与此同时,广大中国研究者对亚文化理论进行梳理和介绍时也多以这本书为起点。但是,因为时代原因,亚文化研究所借鉴的一些理论对于指导当代中国青年亚文化研究已显得过时。从象征人类学角度反思《亚文化》,不仅是从思想源头上对这本书进行再梳理,也对当代中国亚文化研究有借鉴意义。

“抵抗”与“收编”是研究亚文化的关键词,本文从这两个概念入手,引入象征人类学的分析视角。

一、“抵抗”与作为象征符号的亚文化

“亚文化”一词最早出现于 1940 年代,又译为“次文化”或“副文化”。狭义的亚文化概念强调其与主文化的差异、对立和偏离,即越轨亚文化;而广义的亚文化概念除了指明亚文化与主文化不相吻合之外,也指明亚文化作为分支与主文化拥有的共同之处。CCCS 的代表作《仪式抵抗》一书采用了广义的亚文化概念,认为“亚文化即一种亚系统——更大的文化网状系统中这个或那个部分内的更小、更为地方化、更具有差异性的结构”,亚文化和主文化都属于更大的文化系统或“父辈文化”的一部分,“亚文化,虽然在重要的方面——其核心关切、其特定的形式和行为等方面——不同于产生亚文化的父辈文化,但它也分享与父辈文化共有的一些东西”^[2]。高丙中认为,“亚文化是相对于主文化而言的,它们所包含的价值观和行为方式有别于主文化,在文化权力关系上处于从属的地位,在文化整体里占据次要的部分。不同社会群体的存在是多样化的亚文化存在的基础,现代社会中广泛存在的阶级和阶层、职业群

体、年龄群体、方言地域群体、宗教群体、民族群体,创造了丰富多彩的亚文化”^[3]。赫伯迪格认为,一旦代表“亚文化”最初的创新被转化为商品,变得唾手可得,“它们就变得‘僵化’”^{[4]118}。在他看来,亚文化正是在与主文化的差异、对照和区别之中才得以成立的。

首先,亚文化的反叛性在于戳破主文化的伪装,指出主文化之外的其他可能性。主文化的涵化作用是长期潜移默化的结果,是以一种人们不易察觉的方式进行的。因而他采用法国哲学家罗兰·巴特的观点,认为主文化有伪装自身为自然而然的倾向。为了抹去有意为之的意识形态痕迹,主文化将自身披上了“正常”的外衣,同时也忽略了文化发展过程中的历史属性。“通过改变商品原有的位置和语境,通过颠覆它的传统用法,创造了新的用途,亚文化的风格揭穿了阿尔都塞说的‘日常实践的明显虚假性’……一种具有重要意义的差异的传达是所有亚文化风格背后的要点。”^{[4]127}同时,“违反那些权威代码会产生相当强大的挑衅和扰乱的力量,因为社会各界正是通过这些代码组织起来并被人们体验到的”^{[4]112}。“权威代码”不仅仅包括主文化中“商品原有的位置和语境”,以《亚文化》中主要描述的朋克亚文化现象为例,朋克的越轨不仅出现在朋克商品如服装、音乐等方面,还存在于包括语言、行为等在内的整体生活方式中。

其次,亚文化代码具有随意性,相对于主文化内在一致性的“乐音”,亚文化则构成了一种“噪音”——“这些越轨行为暂时暴露出代码的随意性质”^{[4]112}。“代码的随意性”是与商品化的“僵化”对立的,在这个意义上,亚文化成为商品就意味着被主文化“收编”。主文化对亚文化的“收编”,即主文化用自己的价值观和立场来解读亚文化,抛弃其与主文化不协调的部分,而仅保留其对主文化无害的部分。经过主

文化转变后的亚文化代码,成为主文化内部的他者。赫伯迪格区分了两种方式的收编:第一种是商品化的方式,即把亚文化符号(服饰、音乐等)转化成大量生产的物品;第二种是意识形态的收编,指警察、媒介、司法系统等支配集团对异常行为贴“标签”并重新界定^{[4]117}。赫伯迪格认为,亚文化被收编之日,就是亚文化原生的抵抗性和生命力衰弱之时。

可见,赫伯迪格是从整体上对亚文化进行阐释的,对被标识为“亚文化”的现象总是从亚文化抵抗主文化、主文化收编亚文化的视角加以理解的,缺乏对具体的亚文化现象或要素的解读,也缺乏对亚文化内部差异性的关注。因而他的阐释无法回答:为什么这种亚文化对主文化符码进行了这种拼接或挪用,而那种亚文化却进行了那种拼接或挪用?也无法回答:为什么特定情境下的亚文化成员选择了这种符码而不选用那种符码?

纵观全书,赫伯迪格仅对一种朋克亚文化符号进行了具体解读,即对朋克佩戴纳粹党党徽意义的解读。他指出,这是朋克对英国传统上的敌人、纳粹德国的兴趣;自相矛盾的是,他又指出朋克本质上是支持反法西斯运动的。很遗憾,他的分析又一次指向了宏观的“反叛”——“朋克之所以会佩戴纳粹党党徽,是因为这样一定会令人震惊……朋克就喜欢招人憎恨”,而佩戴纳粹党党徽的意义“就来自它的无意义”,来自于它代表了一种价值模糊和主流价值观的缺席,最终代表着意义本身的消失。正是这种大而化之的分析,使朋克佩戴纳粹党党徽的意义指向了无意义,朋克的抵抗也最终指向了虚无。这样,赫伯迪格对亚文化意义的分析也最终指向了无意义和虚无,亚文化成员也不过是主文化和秩序的捣乱者。

笔者想要争论的是,纳粹党党徽在纳粹德国时期、在朋克挪用时期、在后朋克时期等语境下

都有各自独特的意义,这个象征符号所浓缩的意义不仅具有情境性,也具有历史性。Torode^[1]认为,赫伯迪格对于朋克的分析过于理想化,其分析中将英国二战后的光头仔和无赖青年等青年亚文化现象解读为具有乌托邦性质的亚文化,而将朋克视为反乌托邦的,并且将英国白人工人阶级朋克亚文化放在和黑人雷鬼乐亚文化相对应的地位。虽然赫伯迪格认为上述种种亚文化都表现出对英国国家象征的反叛,但当光头仔被解读为是对英国工人阶级生活文化的浪漫复归、无赖青年被解读为重返英国爱德华时代的纨绔主义、雷鬼乐被解读为对埃塞俄比亚乌托邦梦想的寄托时,布莱恩质疑道,为什么偏偏朋克的反抗就被赫伯迪格认为是“纯粹否定”呢?赫伯迪格这种对于乌托邦和反乌托邦的区分导致了对朋克分析的过分理想化^[1]。不能仅将朋克的反抗视为“噪音”,朋克并不仅仅在与主文化保持差异、揭示主文化其他可能性的维度上才有意义。

赫伯迪格指出,亚文化代码具有流动性和随意性。从象征符号的角度来看,代码的流动性即其是随时间、情境等而改变的,代码的随意性即象征符号与意义之间没有固定的连结,能指与所指之间的关系是漂移不定的。亚文化代码这种属性与象征符号的特点紧密相关。象征人类学家维克多·特纳认为,象征符号最简明的特点就是浓缩,即以一个简单的形式表示许多事物和行动,象征符号来自于他所研究的非洲恩登布人语言中“标刻踪迹”一词,指“用斧头在树上刻标记或刻下和弯折树枝,以此作为从陌生的灌木丛走向熟悉的道路的指引”^[5]。可见象征符号是一种用已知标识理解未知的符号。特纳借用了结构语言学的思维,将象征看作一个体系:同一个象征符号出现在不同的仪式中,可以代表相同甚至相反的含义;单一仪式中出现了众多象征符号,可以归纳出相同的目

的或者不同的目的。由象征符号构成的象征体系就是文化。

借用人类学的术语来说,亚文化符号的具体意义是值得“深描”的。“深描”与“浅描”相对,是一种“阐释性描写”,而阐释的实质则是“用‘我们的’语汇来攫住‘他们’的观念”^[6],即用我文化的观念来对异文化进行理解。重温美国人类学家格尔茨偏爱的小男孩眨眼睛的例子——观察者看到小男孩眨眼睛这个行为,而这个行为背后的含义却有多种可能,例如他的眼睛进沙子,他对着同伴眨眼睛,他看到同伴眨眼睛因而自己也“挤眉弄眼”——观察者同样看到的是眨眼睛的行为,但无法对眨眼睛的不同含义进行区分。而所谓“深描”即是揭示出行为、符号在异文化语境下的具体含义。再以格尔茨对巴厘岛斗鸡的经典深描为例。他首先对斗鸡游戏中的各种符号(包括雄鸡、男人、搏斗、金钱和游戏规则等)做了梳理,随后指出了斗鸡在巴厘岛人日常社会行动层次上的象征意义,并引用“雄鸡”在巴厘岛日常用语中的使用情况,指出“雄鸡”作为象征符号浓缩物的丰富意义,可以表示英雄、勇士、冠军、有才干的人、政治候选人、单身汉、花花公子、专门勾引女性的人等^[7]。最终他逐层深入地揭示了斗鸡在巴厘人话语中的意义,通过文化转译,用西方文化所熟悉的语言阐释了巴厘岛文化中的事物。

可见,亚文化作为主文化的他者,并不只是在抵抗主文化、指出主文化之外其他可能性的层面上才有意义,对具体亚文化符号的解读也并不是如赫伯迪格所认为的那样会导致意义的虚无。亚文化符号作为象征符号的一种,并不是浪漫化的“反乌托邦”和不可解读的,而是可以通过深描的方式加以阐释和理解的。

二、“收编”与作为社会过程的亚文化

赫伯迪格对“收编”的态度模棱两可,如胡

疆锋^[8]所指出的：“亚文化面临着这样一种悖论：如果拒绝收编，就难免失去安身立命的基础；如果接受收编，就意味着要顺从自己所抵抗的规则。这也许是通过风格和仪式进行抵抗的亚文化无法逃避的宿命。”

一方面，赫伯迪格哀叹亚文化被收编之日就是亚文化消亡之时——商品化的收编使得丰富的亚文化符号变得僵化，从而丧失了亚文化的活力和创造性；而意识形态的收编则用主文化的观念重新安置了亚文化：“媒体再现亚文化的方式，不仅让它们看起来比实际情况更稀奇古怪，而且也让它们看来更平淡无奇。他们被视为一群危险的外星人、喧闹的孩子、疯狂的野兽和任性的宠儿。”^{[4]120}另一方面，他又看到亚文化青年欢呼收编，他们将收编看作成名的机会。英国历史上许多著名朋克乐队正是借助媒体的大呼小叫，才能像“性手枪”乐队一样出名的。赫伯迪格悲观地发现，亚文化群体自动放弃了原生的抵抗性，他甚至悲观地认为对亚文化进行学术解读也是无意义的：“亚文化成员在看待我们对从属文化进行‘同情式’解读时，他们表现出来的冷漠和蔑视，类似于他们看待法庭与媒体把敌意的标签强加在他们身上时的表现。”^{[4]172}

赫伯迪格将文化的演变看作“亚文化抵抗主文化，主文化收编亚文化”这种此消彼长的过程；与此非常相似，英国象征人类学家维克多·特纳将社会看作从结构到反结构再到结构这种循环往复的过程。亚文化之与主文化的关系，与反结构之与结构的关系是一致的。可以说，亚文化即社会的反结构。

赫伯迪格指出亚文化与主文化之间具有“抵抗”和“收编”的紧张关系，在特纳看来，这种紧张和对峙实际上构成了“社会戏剧”，这正是社会生活中值得学界特别关注的时刻：“社区之间的紧张关系急剧增长在公众中展现为一

连串的事件，我将这种展现称作‘社会戏剧’……当群体以及个人的利益和观点出现明显分歧的时候，社会戏剧在我看来构成了社会进程中的这些孤立的然而又是可以进行细致描述的时刻。”^{[9]24}“社会戏剧”原本是特纳用以概括非洲恩登布人社会分裂与聚合关系的词，后来特纳抽离了其具体情境，使其成为用于研究社会或文化变迁的普遍概念。特纳认为社会戏剧的四个典型阶段是：“1. 对规则以及受到规范制约的社会关系的违犯。通常出现在同一种社会关系体系之内的人与人、群体与群体之间……这样的违犯是公开的，人们公开抗拒或者故意不执行那些调解团体之间的交往的根本准则。2. 在违犯规则以及受规则制约的社会关系之后，会出现日益严重的危机阶段。3. 接下来就是第三个阶段——矫正行为阶段。为了控制危机的蔓延，受到扰乱的社会体系的领袖人物或者代表秩序的成员会迅速采用特定的调整和矫正‘机制’。4. 这一阶段可能出现两种可能。其一，曾经被扰乱的社会群体重新组合为一个整体；其二，对相互对立群体间已经无可挽回的分裂给予社会承认，以确定其合法位置。”^{[9]29-34}

亚文化与主文化的关系可以用“社会戏剧”的“违犯—危机—矫正—整合或分裂”四个阶段来重新解读。以朋克亚文化为例，第一阶段是亚文化对主文化的违犯，赫伯迪格详细列举了朋克的种种违犯行为：把头发染得五颜六色，在学校制服上进行各种涂鸦，不仅洗手间和垃圾桶上的物品被用作装饰，皮鞭、手铐、铁链、面具、束胸等用品也被当成他们的“道具”；被认为是经典的、只在小圈子中才能看到的朋克机器舞，实际上是舞者“让自己好几个小时像机器人一样”静止不动；朋克乐手也甘于让自己成为业余歌手，“我们热衷的是混乱，而不是音乐”；朋克的表演更是对演唱会和夜总会娱乐传统的颠覆，乐队及其追随者们有时以吐唾

沫、相互辱骂的方式交流,要么就拆掉剧院的座椅朝舞台扔去^[10]。在第二个阶段,这种公开的越轨造成了社会危机,亚文化与主文化的冲突不断强化和升级,逐渐逼近临界点。在第三个阶段,主文化为了控制危机,则采用“收编”的方式来对亚文化的越轨行为进行矫正,警察、学校、媒体等都参与了对朋克行为的矫正。在第四个阶段,主文化对亚文化的收编或矫正行为构成两个结果,要么成功收编而将亚文化整合进主文化,要么放弃收编而承认亚文化本身的合法地位。

在“主文化—亚文化”这种二元对立关系的视角下,赫伯迪格是站在亚文化的立场上的,他将“抵抗”看作亚文化之魂,一旦主文化对亚文化进行收编,他便产生悲观之情。而以象征人类学的视角观之,这一过程不过是“社会戏剧”的演变过程:要么主文化整合亚文化,要么承认亚文化本身的合法地位,如果是后者,则亚文化成员将获得合法的地位,因此亚文化成员将其视为获得名声的机会。可见,亚文化并不是像赫伯迪格认为的那样,只是单一地抵抗主文化,与此同时,亚文化也利用主文化。

三、结论

本文从象征人类学视角重新审视了亚文化研究,主要包括两方面:其一,亚文化之所以展示出与主文化大相径庭的姿态,是因为亚文化的代码具有流动性和随意性。亚文化通过差异揭示了其他可能性,撕破了主文化假装为自然的面具,无声地指出了主文化潜在的意识形态霸权。但赫伯迪格缺乏对亚文化符号具体意义的分析,最终将抵抗的意义指向了空虚。而亚文化符号是值得深描的,当代的亚文化研究不能忽视对象征符号的多义性的阐释。其二,赫伯迪格采用了“主文化—亚文化”“抵抗—收

编”这类二元对立视角,对“收编”的认识模棱两可,对一些亚文化群体欢呼收编的态度表示不解甚至是不满。而在象征人类学看来,亚文化抵抗主文化、主文化收编亚文化的过程正是“社会戏剧”的演变过程,也是社会中有结构的部分对无结构的部分进行整理和归纳的过程。

从研究方法上来看,赫伯迪格主要采用的是文本分析法,根据当时已有的亚文化材料进行二手分析,并且广泛借鉴媒体的报道,田野调查资料极少。Judith Adler^[11]也指出,在《亚文化》中赫伯迪格不重视方法论,他对亚文化的解读仅来自于报纸杂志文章,特别是青年杂志,而缺乏田野调查,以及对传记、访谈材料的研究。由于缺乏对活生生的亚文化成员生活的探讨,他只能从广义上将亚文化的“风格”与亚文化成员的社会情境进行模糊的关联,而缺乏扎根生活的、实实在在的研究。安吉拉·麦克罗比^[12]认为,赫伯迪格利用现成亚文化材料进行拼凑,不可避免地带有“父权制”的思想,他几乎将青年亚文化与男性亚文化等同,回避了亚文化各种运动的变形对“性别身份的质疑”,从而忽视了女性在亚文化中应有的地位。

赫伯迪格对人类学的田野调查法抱有一定偏见:“参与式观察陆续贡献了一些关于亚文化最生动有趣的、最富启发性的记录,但这种方法的价值也因存在着某些严重缺陷而受到影响,特别是由于它缺乏任何分析性的或解释性的框架基础……使得阶级与权力关系的意义经常被忽视或者至少被低估……亚文化往往被描述成一种于社会、政治、经济等较为广阔语境之外独立发挥作用的有机体。”^{[4]96}非常不幸的是,赫伯迪格将“参与式观察”等同于没有理论介入的纯粹观察,没有认识到优秀的、成体系的观察是产生新理论的必要基础。由于缺乏田野调查材料,他文中的亚文化成员形象多来自媒体的报道,读者看不到活生生的、全面饱满的亚

文化个体,也从来没有听到朋克个体亲口述说,为什么朋克如此穿着打扮与行为?为什么听这样的音乐跳这样的舞?

在赫伯迪格的眼中,亚文化的意义就是抵抗,而抵抗的意义就是抵抗本身,抵抗的最终意义则是无意义、虚空。我国一些学者也注意到了他的抵抗带有“浪漫色彩”^[13]。赫伯迪格受到法国小说家热内的启发,“本书一直探讨的亚文化风格,如同监狱的涂鸦一样,仅仅是向它们得以生产的场域致敬”^{[4]168},他所言的抵抗是以所抵抗对象的存在为前提的,这种抵抗是一种姿势、一种“噪音”。正如他在分析中所引用的亚文化成员的话,“我们的象征是乌有,是真空,是空无”,“我们是如此的漂亮,哦,如此……空——虚”^{[4]133},在那一代朋克及其他受朋克影响的亚文化成员中,他们的抵抗是空虚,而对此解读的赫伯迪格虽然用了种种迷人的理论,但并没有从抵抗的空虚中创造出什么。当抵抗的意义仅仅停留在抵抗本身时,抵抗就被架空了,成了一个无意义的、无所指的能指。

笔者认为亚文化研究要跳出“主文化—亚文化”“抵抗—收编”这类二元对立视角、避免将抵抗最终解读为虚无,应该拥有文化研究初起之时兼容并蓄的胸怀,从对具体“象征符号”的分析入手,通过“深描”揭示出亚文化符号的不同意义及历史变迁。此外,也可在二手文献和理论阐释的基础上,加入访谈和田野调查元素,让现实生活中的而不是媒体中的亚文化成员开口说话。

参考文献:

- [1] TORODE Brian. Book reviews of subculture: the meaning of style by dick hebidge [J]. *Contemporary Sociology*, 1981(6):856.
- [2] 约翰·克拉克,斯图尔特·霍尔. 亚文化、文化和阶级[J]. 胡疆锋,译. *文化研究*, 2010(9):7.
- [3] 高丙中. 主文化、亚文化、反文化与中国文化的变迁[J]. *社会学研究*, 1997(1):114.
- [4] 迪克·赫伯迪格. 亚文化:风格的意义[M]. 陆道夫,胡疆锋,译.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
- [5] 维克多·特纳. 仪式过程:结构与反结构[M]. 黄剑波,柳博赞,译.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15.
- [6] 克利福德·格尔茨. 地方性知识[M]. 王海龙,张家瑄,译. 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11.
- [7] 克利福德·格尔茨. 文化的解释[M]. 纳日碧力戈,译.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477 - 478.
- [8] 胡疆锋. 意识形态、媒体、商品[J]. *现代传播*, 2009(1):159.
- [9] 维克多·特纳. 戏剧、场景及隐喻:人类社会的象征性行为[M]. 刘珩,石毅,译. 北京:民族出版社,2007.
- [10] 莱格斯·麦克尼尔,吉里安·麦凯恩. 请宰了我:一部叛逆文化的口述秘史[M]. 郝舫,译. 广州:花城出版社,2005.
- [11] ADLER Judith. Book review of subculture: the meaning of style by dick hebidge [J].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982(6):1458.
- [12] 安吉拉·麦克罗比. 女性主义与青年文化[M]. 张岩冰,彭薇,译. 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11:27.
- [13] 胡疆锋,陆道夫. 抵抗、风格、收编——英国伯明翰学派亚文化理论关键词解读[J]. *南京社会科学*, 2006(4):87.

[1] TORODE Brian. Book reviews of subculture: the mea-



引用格式:安士伟,杨洁.城市新区脆弱性的评估模型及风险调控研究[J].郑州轻工业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17(3):55-61.

中图分类号:F299.2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9/j.issn.1009-3729.2016.03.009

文章编号:1009-3729(2016)03-0055-07

城市新区脆弱性的评估模型及风险调控研究

Vulnerability assessment model and risk control research of urban new district

安士伟, 杨洁

AN Shi-wei, YANG Jie

郑州轻工业学院 经济与管理学院, 河南 郑州 450002

摘要:城市新区脆弱性是目前我国推进城市可持续发展与现代化建设过程中的热点问题,对城市新区脆弱性进行研究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城市新区脆弱性的影响因素可分为资源、生态环境、社会建设、经济、文化、制度6个方面。构建城市新区脆弱性测度指标体系,运用DEA模型进行评估,对新区总体脆弱性效率、规模报酬效率、投入冗余等进行分析,可实现对城市新区脆弱性现状的把握,从而及时有效地对城市新区脆弱性做好风险调控。

关键词:

城市新区;
脆弱性;
评估模型;
风险调控

收稿日期:2016-03-12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4BJY044);河南省科技厅软科学研究计划项目(142400410067);郑州轻工业学院研究生科技创新基金项目

作者简介:安士伟(1965—),男,河南省濮阳市人,郑州轻工业学院教授,博士,主要研究方向:区域经济发展。

城市内涵式增长(旧城更新)和外延式扩张(新城/新区开发)是当今城市空间拓展的两大主要途径^[1],城市新区开发建设是城镇化发展进程的必经阶段,城市新区开发对区域经济甚至国家经济的发展都影响很大。我国城市新区建设可追溯到1980年代的经济特区和开发区建设,1990年代各种功能类型的开发区得到蓬勃发展,进入21世纪后大规模的综合型城市新区得到持续开发。实践表明,城市新区的发展不仅给我国GDP带来了巨大增长,而且也缓解了老城区的人口负担与交通压力。城市新区的开发建设形成了新的地区经济增长点,优化了投资环境,塑造了城市新形象;转移了老城区剩余劳动力,拓宽了就业渠道,增加了就业机会;调整优化了老城区的产业结构,使城市功能有机结合,推动了老城区更新改造;使总体产业布局更加合理,实现了城市新区旅游、居住、工作、娱乐等功能与老城区的有机结合。总之,城市新区作为城市外延式空间扩张的重要载体,其建设发展对城市的有效运作至关重要。

相对于老城区而言,城市新区虽然有更大的发展空间,但同时也存在着大量的隐患。在城市新区建设发展初期,人们多秉持“先经济,后社会”的理念,对一定地域空间先实行单一功能的集聚,这虽然有助于相关功能环境氛围的渲染和形成,通过关联和集聚效应也提升了产业或其他功能模块,但这种模式也暴露出了诸多问题:(1)相对于老城区而言,城市新区基础设施薄弱、服务效率低下,生活品质不高;(2)城市新区建设过程中需要大量的资金,政府为了缓解自身的财政压力,吸引企业投资,就需要额外为企业多种优惠政策,从而造成对区域外投资的高度依赖;(3)新区建设面临着老城区与其他新区的竞争,同时还存在着资金、技术、人才匮乏等问题;(4)在新区建设过程中,投资前景不明朗、品牌价值和知名度低

下,都会造成其产业集聚效应难以充分发挥。

“世界经济论坛”创始人克劳斯·施瓦布曾说过,“脆弱性是世界面对的一个现实,要实现可持续发展,首先就要减少发展的脆弱性”。脆弱性问题现已成为一个国家推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和现代化建设进程中要化解的重要问题。脆弱性研究依靠自身独特的理论和价值解决了一系列人类活动中面临的相关问题,同时也成为诠释人地系统、生态环境效益互动机制的重要途径^[2]。国内外学者对脆弱性问题展开了多视角、多层面的探讨,并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相对来说,国外对于城市脆弱性研究多关注特定环境背景下特定地点的脆弱性,而国内对城市脆弱性研究则主要集中于生态环境脆弱性和灾害脆弱性领域,如水土保持功能脆弱性、地震重灾区脆弱性研究等。当然,国内也有对特殊类型社会经济系统脆弱性研究,如资源型城市、沿海城市、旅游城市等^[3-5]。然而,目前在城市新区这一特殊类型的城市系统脆弱性问题上的研究还较少。发展城市新区是我国城市发展进程中必然经历的一个阶段,其建设已成为中国城市发展最为浓墨重彩的一笔。鉴于此,本文拟以城市新区系统作为研究对象,在整合国内外现有城市脆弱性问题相关研究的基础上,构建城市新区脆弱性测度指标体系,并给出风险调控实施办法,以期在城市新区可持续发展提供决策参考。

一、城市新区脆弱性概念及内涵

“城市新区脆弱性”是在脆弱性概念和城市脆弱性概念的基础上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因此在研究城市新区脆弱性问题之前,我们有必要对脆弱性概念进行梳理。由于学科背景不同,研究视角存在一定差异,研究者对脆弱性的认识和理解不完全相同,从而对脆弱性概念的界定也有所不同,如HEWITT的人类生态学理

论、BLAIKIE 的压力释放模型、MORDUCH 的贫困和可持续生计中的脆弱性和 TURNER 的社会—生态系统脆弱性等。CUTTER 等对脆弱性进行了三种界定,分别将其理解为一种暴露状况、各种社会因素组成体对灾害的抵御能力(弹性)、暴露与社会弹性在特定的地区的结合体^[6-7]。另外,还有从社会—生态耦合机制出发将脆弱性理解为人类的反应力、应对能力和环境风险^[8]的。

通过对已有脆弱性内涵的梳理,可以对城市新区脆弱性作如下理解:(1)城市新区脆弱性作为一个系统整体,可以从多维角度考虑;(2)城市新区脆弱性客体具有多层次性,施加在客体上的扰动具有多尺度性;(3)敏感性、应对能力、暴露程度、恢复力、适应能力等是城市新区脆弱性的主要构成要素和主要评价指标^[2,8]。以此作为参考对城市及城市新区这些特殊系统的脆弱性进行评价,能为国家制定和完善城市新区风险调控措施提供科学依据,为其可持续发展提供基本保障。

二、城市新区脆弱性的影响因素

城市新区脆弱性的影响因素具体表现在以下 6 个方面。

1. 资源因素

一个地区能提供的自然资源是有限的,如何将有限的资源投入到无限的开发与索取中是一个令人类头疼的大问题。人类对自然资源进行开发与利用,一定会消耗自然资源,如果开发超过了恢复的速度,就会影响大自然新陈代谢与人类活动的可持续性。在自然资源与环境保护方面,人们正在试图寻找一种能在理想状态下使用与控制自然资源流量的途径和方法。

2. 生态环境因素

城市经济的发展必然以生态环境的开发和利用为代价,城市生态环境是以人为主体、服务

于人类活动的人工生态系统。改善生态系统除依靠城市大气、水与土壤环境的自净能力之外,更多地是需要建立污水处理厂、垃圾处理厂等,来分解城区废物。为实现可持续发展,一定要注意合理有效利用资源,同时保护好当地的水域和植被,合理利用这些水域和植被来构筑一个绿色生态网架。

3. 社会建设因素

城市社会系统是国家制度、社会环境、城市基础设施、人力资源等要素的综合体。城市新区应以更好的视角和更新的标准进行规划和建设,通过定位高起点的社会发展为内生变量来推动经济发展,促进政府职能转变,更加重视政府的公共服务职能,在尊重市场的同时,从民生高度对社会各项事业的发展重新定位,逐步推进基础保障设施建设,充分满足群众的公共服务需求,促进社会公平与和谐。

4. 经济因素

经济涉及经济结构、经济总量、经济效益和经济发展潜力等方面,这些方面都可以作为研究经济脆弱性的出发点。一方面,新区建设投资前景不明朗,品牌价值和知名度低,都会造成其产业集聚效应难以发挥的局面,伴随着资金、技术、人才匮乏等问题,新区的经济压力巨大;另一方面,“先经济,后社会”的理念可能导致新区政府将焦点过度集中于经济增长上,忽略其他功能模块的建设和维护。

5. 文化因素

由于新区建设的时间较短,缺乏深厚文化的支撑,在其快速发展的同时,必然会造成其文化脆弱性的出现。政府为了政绩,房地产开发商为了商机,会对新区内一些有着丰富文化内涵的文物古迹和旧址肆意破坏和强拆。文化,既是精神文明的保障和导向,同时又是一种历史现象,是社会历史的积淀物。在城市新区建设过程中,如何抢救、保护祖先遗留下来的这份

历史文化遗产,是我们面临的一个难题。

6. 制度因素

制度对于城市新区建设的重要作用不言而喻。硬件基础设施建设要得到国家和政府制度的支持,大型企业的引进要获得政府制度上的许可,一些违规行为要受到制度的制裁,等等。因此,要想使城市新区得到健康可持续发展,应全面促进和提升社会各方面制度的创新能力,推动新区建设的内涵式发展和外延式扩张,全面提高新区建设的质量和效益。

三、城市新区脆弱性分析框架模型与风险调控分析框架

1. 脆弱性分析框架模型

通过对国内外文献和资料的阅览,可以看出,国内外学者已经对脆弱性问题做了深入的研究与探索,针对脆弱性评价方法也做了多种尝试,如南太平洋应用地学委员会运用综合指数法反映了自然环境易受损害的程度, M. J. Metzger 等^[10]运用图层叠置法对全球变化背景下区域脆弱性的差异进行了评价,李鹤等^[11]通过构造 BP 人工神经网络模型对东北矿业城市地区就业脆弱性进行了评价,葛怡等^[12]尝试改进 Hoovering 评估模型对研究区域进行了脆弱性指数的评估。由于对影响因素及其发生机制的理解存在差异,关于脆弱性问题的评价模式到现在也没有一个统一的框架,而且已普遍运用的评价

方法也存在着这样那样的缺点。

通过对已有文献的梳理,可将目前的脆弱性分析框架模型概括为三类:一是压力和释放模型(PAR)^[13]和可持续生计框架^[14];二是地方-风险模型(HOP)^[15]和人-环境耦合系统分析框架^[16];三是 BBC 框架^[17]和 MOVE 框架^[18]。第一类属于政治经济学视角,第二类属于社会-生态视角,第三类属于综合视角。上述框架模型不仅为脆弱性分析提供了指导,同时也为全面实现脆弱性评价与实证分析等目标奠定了基础。

2. 城市新区风险调控分析框架

本文拟从综合视角分析城市新区脆弱性,并对其风险调控实施办法进行研究与探讨。

本文将脆弱性测度指标体系分为 6 个方面,分别是资源脆弱性、生态环境脆弱性、社会建设脆弱性、经济脆弱性、文化脆弱性和制度脆弱性(见图 1),运用 DEA 模型分别对该体系的 6 个指标进行测度。由于 DEA 中的经典模型 C^2R 模型与评价技术有效性的 BC^2 模型可有效避免主观因素,算法也简单,具有客观性强、误差低等优势,所以能有效地观察指标体系对脆弱性的影响情况。

由于测度模型各指标层的要素之间具有相关性,根据运筹学原理,当在 DEA 模型中输入和输出指标个数小于决策单元 DMU 的 1/2 时,得出的评价效果才比较好,所以在进行测度前首先需要对各指标进行筛选(见表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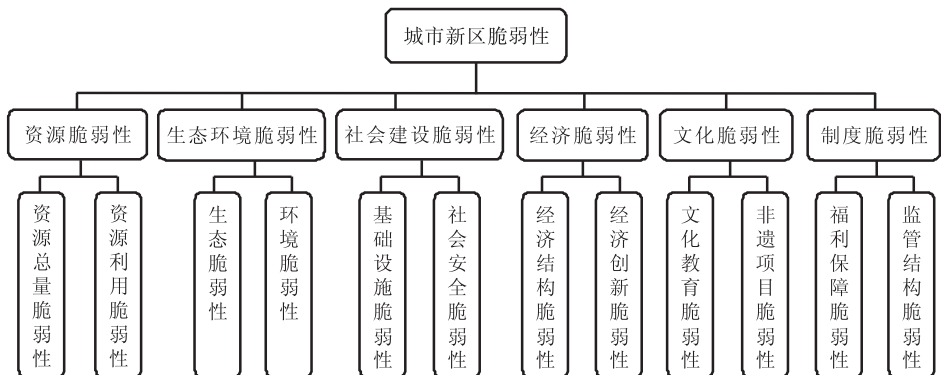


图 1 城市新区脆弱性测度指标体系

表1 基于 DEA 模型的城市新区脆弱性评价指标

目标层	要素层	指标层	单位
DEA 模型输入指标	资源层面	单位 GDP 城市新区建设用地占用	km ² /万元
		单位 GDP 电耗	千瓦时/万元
		人均水资源	m ³
	生态环境层面	建成区绿化覆盖率	%
		城市新区污水处理率	%
		城市新区环境优良天数占比率	%
		工业固体废弃物综合利用率	%
	社会建设层面	万人拥有医疗技术人员数	人
		人均城市道路面积	m ²
		建成区人均管道密度	km/km ²
	经济层面	地方预算财政收入/支出	%
		经济增长速度	%
		人均房产面积	m ²
		低收入人口比率	%
		R&D 投入占 GDP 的比重	%
	文化层面	万人拥有中小学专任教师数	人
		图书馆、博物馆数目	个
		非遗项目宣传活动数目	个
	制度层面	万人社会福利院床位数	个
		社会保险覆盖率	%
城乡福利差异指数		%	
金融监管机构数量		个	
DEA 模型输出指标	综合层面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负债率	%
		地区失业率	%
		碳排放量	t
		社会保障补助支出	万元
		环境空气质量指数(AQI) > 100 比重	%

通过对一些指标相关系数分析,剔除部分相关系数在 0.1 水平上显著的指标,得出了以上脆弱性指标体系。从中可以看出,DEA 输入模型的指标层是对其要素层的具体分类。通过对 MOVE 框架的引用,可从 6 个层面来分析城市新区脆弱性。在资源层面上,提取了单位 GDP 城市新区建设用地占用、单位 GDP 电耗、人均房产面积、人均水资源等因素。之所以提取这几个因素,是因为从城市新区可持续发展角度分析,要用有限的土地保障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就必须大力推进节约集约利用土地,坚定不移地将资源消耗水平降下来。在生态环境层面,我们提取了建成区绿化覆盖率、城市新区

污水处理率、城市新区环境优良天数占比率、工业固体废弃物综合利用率这几项指标,它们的选择也是从城市新区可持续发展的角度考量的,它们能较明显地反映新区生态环境的情况。接下来,分别从社会建设、经济、文化、制度层面进行具体指标的提炼,剔除部分相关系数在 0.1 水平上显著的指标,再参考常用的方法,得到了更具有适用性的指标体系。

首先,通过查阅历年国家和地方统计年鉴,再参考其他相关资料,将需要的数据带入 DEA 模型,通过模型评估结果,对新区总体脆弱性效率、规模报酬效率、投入冗余等进行分析,并结合实际情况做出相应的解释,从而实现城市

新区脆弱性现状的把握。在数据包络分析法模型中,规模效率 = 总效率/纯技术效率。因而,若规模效率 = 1,则意味着该决策单元 DMU 规模报酬有效;若规模效率 $\neq 1$,则表示规模报酬无效。此时的规模报酬可能处于递增或递减阶段,等比例增加投入时,规模效率的变动幅度大于投入增幅。DEA 模型输出的结论对新区的资源配置具有一定的导向作用。其次,再通过对非 DEA 有效单元即 DEA 无效单元进行投影分析,计算出 DEA 无效单元的投入冗余率和产出不足率,进一步整理出投入冗余率较高的指标,找出其出现频率高的指标。这些指标对降低区域脆弱性可起到参考作用和风险预警作用,可以通过增强这些指标的覆盖和作用率,使其能有效降低风险发生率,从而为研究新区脆弱性与风险调控提供理论和现实依据。

四、结语

脆弱性是目前社会可持续发展与现代化建设过程中的热点问题,但是这方面的研究罕见定位到城市新区领域。由于跨学科和交叉领域的差异,再加上脆弱性系统的复杂性,迄今为止,学术界也没有总结出一套能考虑到所有影响因素的关于脆弱性的评价方法。本文立足已有的研究成果,通过对城市新区脆弱性的现象及产生机理进行分析,找出影响城市新区脆弱性的因素,抓住其关键过程展开脆弱性评价,对城市新区脆弱性的风险调控预警机制及调控机制进行研究,从而为城市新区可持续发展提供决策参考。

“先经济,后社会”的理念面临着诸多挑战。城市要想获得长远发展,需要将优先发展经济理念更新为理性协调社会进步与经济发展关系的理念,同时,应根据城市新区的实际状况,在建设与管理过程中,明确其功能定位和行业重点,提高经济运行的层次和质量,积极务实

有序推进。目前,部分城市新区建设仍不同程度地存在着楼市库存量大、土地等资源节约集约利用程度不高、产业竞争力不强、体制机制创新不足等问题。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城市新区的设立尤其是国家级新区的规划对于区域协调发展具有战略性意义,我国东部新区主要承担产业结构调整升级的责任,而我国西部新区则主要承担创造新的增长极的责任,目的是通过新区的经济引擎作用来带动当地发展。城市新区的设立是对整个区域发展战略的宏观设计,由于新区可以享受众多优惠政策,如果盲目建设可能会造成资源浪费,影响经济的协调发展。

随着城市系统各功能模块关系的深化与复杂化,脆弱性的发生可能变得越来越隐秘,表层风平浪静,深层风起云涌,其风险后果有时难以避免,故如何对脆弱性进行有效预警是一个难题。因此,整合脆弱性分析框架与评价模型,探讨城市系统预防、应对、恢复能力建设路径,是城市新区脆弱性减缓与风险调控的关键。

参考文献:

- [1] 朱孟珏,周春山. 国内外城市新区发展理论研究进展[J]. 热带地理,2013(3):363.
- [2] 李鹤,张平宇. 全球变化背景下脆弱性研究进展与应用展望[J]. 地理科学进展,2011(7):920.
- [3] 李鹤,张平宇,程叶青. 脆弱性的概念及其评价方法[J]. 地理科学进展,2008(2):18.
- [4] 李博,韩增林. 沿海城市人地关系地域系统脆弱性研究:以大连市为例[J]. 经济地理,2010(10):1722.
- [5] 李博,韩增林. 基于三角图法的沿海城市系统脆弱性分类方法研究[J]. 海洋开发与管理,2011(11):99.
- [6] CUTTER S L. Vulnerability to environmental hazards [J]. Progress in Human Geography, 1996(20):529.

- [7] CUTTER S L, BORUFF B J, SHIRLEY W L. Social vulnerability to environmental hazards[J]. *Social Science Quarterly*, 2003(84):242.
- [8] ADGER W N. Vulnerability[J]. *Global Environmental Change*, 2006(3):268.
- [9] 王松华, 赵玲, 朱震旦. 城市脆弱性的内涵及评价体系[J]. *河北联合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4(3):18.
- [10] METZGER M J, LEMANS R, SCHROTER D. A multidisciplinary multiscale framework for assessing vulnerabilities to global change[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pplied Earth Observation and Geoinformation*, 2005(7):253.
- [11] 李鹤, 张平宇. 东北地区矿业城市社会就业脆弱性分析[J]. *地理研究*, 2009(3):751.
- [12] 葛怡, 史培军, 刘婧. 中国水灾社会脆弱性评估方法的改进与应用:以长沙地区为例[J]. *自然灾害学报*, 2006(6):54.
- [13] WISNER B, BLAIKIE P M, CANNON T, et al. *At risk: natural hazards, people's vulnerability and disasters*[M]. London:Routledge, 2004.
- [14] Department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Sustainable livelihoods guidance sheets [EB/OL]. (2008-06-15)[2014-11-06]. http://www.effs.ca/webresources/DFID_Sustainable_livelihoods_guidance_sheet.pdf.
- [15] CUTTER S L. The vulnerability of science and the science of vulnerability[J]. *Annals of the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Geographers*, 2003(1):1.
- [16] TYRNER II B L, KASPERSON R E, MATSON P A, et al. A framework for vulnerability analysis in sustainability science[J]. *PNAS*, 2003(14):8074.
- [17] BOGARDI J, BIRKMANN J. *Vulnerability assessment: the first step towards sustainable risk reduction*[M]. //MALZAHN D, PLAPP T. *Disaster and society from hazard assessment to risk reduction*. Berlin, Germany:Logos Verlag Berlin, 2004:75-82.
- [18] BIRKMANN J, CARDONA O D, CARRENO M L. Framing vulnerability, risk and societal responses: the MOVE framework[J]. *Natural Hazards*, 2013(2):193.



引用格式:黄真明.我国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问题研究[J].郑州轻工业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17(3):62-66.

中图分类号:F304.6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9/j.issn.1009-3729.2016.03.010

文章编号:1009-3729(2016)03-0062-05

我国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问题研究

Study of urbanization of agricultural population of China

黄真明

HUANG Zhen-ming

信阳师范学院 政法学院, 河南 信阳 464000

摘要: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我国农村出现大量农业转移人口,其市民化成为必然。宏观经济环境的变化、农业转移人口呈现的特点和意愿,以及农业转移人口在城市生活的适应性增强等,是我国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有利条件;农业转移人口自身因素、经济因素、制度因素等是制约我国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不利因素。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应严格按照城市发展空间合理控制人口规模,用城市群解决中心城市人口过度集聚和膨胀问题,同时改革户籍制度,加强教育培训和事关农业转移人口利益的民生建设。

关键词:

农业转移人口;

市民化;

户籍制度;

社会保障

收稿日期:2016-01-16

作者简介:黄真明(1975—),男,河南省潢川县人,信阳师范学院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人学。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和工业化进程明显加快,农业生产力的发展使大量农民从土地上解放出来,成为农业转移人口。他们虽在城市工作,但依然是农民身份,这种职业与身份的不一致,使这个庞大的社会群体成为新时期的“边缘人”,成为中国“亦工亦农”“非工非农”的特殊群体。他们在住房、医疗、教育培训、子女入学等方面的权益得不到应有的保障,这严重影响到社会的公平公正,成为构建和谐社会的过程中的不稳定因素。因此,如何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既是我国在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过程中必须妥善解决的一个大问题,也是党和政府应高度重视的一个重要问题。

中共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全会均强调,要认真做好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工作,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2014年政府工作报告把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纳入国家重点工作,强调着重解决好“3个1亿人”的问题,随后国家开启了新一轮户籍制度改革。这表明,无论是党的战略决策,还是政府的工作目标及制度改革,都为我国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指明了方向。^[1]解决这一问题,目前的关键是,找准工作的发力点,摆脱旧制度的羁绊,化解矛盾,消除阻力,循序渐进地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鉴于此,本文拟在分析我国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有利条件和不利因素的基础上,提出关于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途径的一些建议,以期为推进我国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提供参考。

一、我国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有利条件

当前,我国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具备以下3个方面的有利条件。

1. 宏观经济环境的优化

中国近40年的改革开放,促进了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使城乡关系发生了根本改变。中

国改革的春风最早吹向农村,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农村生产力得到迅速发展;与此同时,城市改革也相继推进,城乡发展相互伴随。进入21世纪后,中国城乡经济都得到了巨大发展,城乡之间的界限渐被打破,城镇化势在必行。随着农业现代化的不断推进,农村生产力空前发展,这就势必使大量的农民从土地中解放出来,涌向城市,这既保证了城市发展所需的劳动力,同时也使城乡发展一体化成为必然,从而打破了过去城乡发展的割裂状况。政府顺应时代发展潮流,及时制定方针政策,鼓励和支持农业转移人口进城务工,这就为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提供了政策支持。

2. 农业转移人口呈现出新的特点和意愿

当前,农业转移人口大部分出生于20世纪八九十年代,作为新生代进城务工人员,他们普遍接受了九年制义务教育,文化素质相对较高,视野开阔,思想观念和价值取向发生了较大改变,比较容易融入城市社会。大多数进城务工人员在城市里工作和生活了多年,接受了城市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适应了城市的生活,希望在城市永远生活下去,不希望再回到农村,愿意通过自己的辛勤劳动去实现自己的人生理想。另外,进城务工人员在城市生活和工作过程中,与城市居民有密切交往,形成了自己稳定的交际圈,产生了融入城市生活的意愿,在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进程中,他们不会面临交往上的心理障碍。

3. 农业转移人口在城市生活的适应性增强

农业转移人口在市民化过程中,积极参与城市社会政治文化生活,与城市居民的界限日趋模糊,彼此没有太大距离。调查表明,进城务工人员感觉与城市居民相处没有什么问题,认为城市人很热情也很有礼貌。他们大胆地与城市人进行交往,积极融入城市生活,关注和了解关乎自身利益的问题,如户籍制度改革、公租房

建设和农民工子女教育等。进城务工人员在城市务工和生活过程中,逐渐接受了城市居民的生活方式。调查显示,进城务工人员业余时间的娱乐休闲生活内容丰富,形式多样,如去阅览室看书,去公园锻炼身体,周末时间去电影院看电影,节假日里去外地旅游度假休闲等,城市居民的生活方式在他们身上得到充分体现。这些对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提供了有利条件。

二、我国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不利因素

当前,我国改革开放已进入深水区,各种社会矛盾凸显,我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生产力发展水平有了巨大提高。然而,我国仍然是发展中国家,人口多,人均GDP较低,国民整体素质偏低,国家的社会化程度依然有限,这些在客观上阻碍了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进程。

1. 农业转移人口自身因素

目前,我国农业转移人口在整体上受教育水平较低,工作能力普遍不高。他们较其前辈来说整体素质虽然较高,但相对于城市的同龄人还是普遍偏低的,不少人因文化水平较低只能从事简单工作或是靠出卖体力为生,同时他们中的许多人思想保守,内心封闭,这些都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他们的思想水平和创造能力,使他们在城市劳动市场中缺乏竞争力。再者,虽然农业转移人口的维权意识逐渐在加强,但他们大部分人法律意识淡薄,法制观念缺乏,自我保护能力不强,在工作生活中遇到纠纷等情况时,不知道该如何运用法律武器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2. 经济因素

近年来,我国城镇化进程明显加快,城镇化水平空前提高。然而,城镇的基础设施、生态承载能力等相对脆弱,城镇淡水资源相对短缺,大量农业转移人口的涌入,进一步加重了各方面

的负担。另外,部分城市产业结构不合理,第三产业所占比重较低,造成对农业转移人口就业吸纳能力不足;同时每年数百万的大学毕业生走上社会,也使农业转移人口在城镇就业受到影响。

“高房价”也使农业转移人口“望房兴叹”。进城务工人员的工资待遇较低,即使务工多年,积攒下来的钱也很有限,不可能在城市买房。目前不少城市都在探索将进城务工人员纳入住房保障之中,但由于问题涉及面大,推进步伐依然缓慢。现行的住房供给制度是在计划经济时代形成的,不涉及进城务工人员,致使进城务工人员在城市里“住”的问题很难解决。

3. 制度因素

户籍制度已成为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一道屏障。我国长期以来实行的城乡二元户籍制度,造成城乡彼此分割。这种极不合理的户籍制度,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农业转移人口的就业自由,他们表面上离开了农村和土地,而实际上仍被拒于城市户籍之外,即使进城务工多年,也改变不了自己的“农民”身份,享受不到城市人的福利和社会保障,这在客观上是对进城务工人员的歧视。由经济地位上的差距和社会制度不公而造成的心理隔阂,妨碍了进城务工人员与城市居民的正常交往及其人际网络的形成和整合。

进城务工人员子女因为没有城市户口,所以在城市入学时受到很多限制,进入教学质量较优的学区对于进城务工人员而言是非常困难的,多数地方对外来务工人员子女报考普通高中设置限制,也不允许进城务工人员子女在本市参加高考。于是,农民工子女要么留在农村接受教育,成为无人监管的“留守儿童”;要么进入城市里私人开办的、条件相对较差的学校就读。^[2]

同时,我国目前的社会保障制度还不健全,

仍是低水平、不全面的,进城务工人员无法正常享受城市居民所享有的社会保障。另外,进城务工人员流动性较大,社会保险关系难以异地转移和接续,无法保障他们的实际所需,导致进城务工人员即使交了保险费其权益也得不到应有的保障,从而影响到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进程。

三、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思路与对策

当前,中国城镇化发展的规模和速度是前所未有的,因而,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要统筹规划,合理布局,不能盲目追求数量而不顾质量。具体说来,可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1. 按照城市发展空间合理控制人口规模

当前,中国城镇化的发展速度很快,大批农业转移人口涌入城市,城市不分大小均容纳了与其消化能力不对称的人口数量,这种杂乱无序的涌入或移居影响城市发展,不利于中国的城镇化。^[3]同时,我国东、中、西部城市人口依次呈递减态势,政府应加强引导和调控。按城市常住人口分,1 000 万人以上的为特大城市,500 万人以下的为大中城市。对于常住人口在1 000 万人以上的特大城市要控制人口规模,对于常住人口在500 万人以上的城市要有条件地控制人口规模,相对放开人口准入制度。对于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特大城市,不能任凭人口自由迁徙,否则会导致更加严重的环境问题和社会问题。以北京为例,近10年间,北京共增加人口约600万,相比伦敦、纽约、东京,北京的人口增长速度是它们的5~10倍。据相关材料报道,如果北京市人口以目前的速度再增长10年,需要增加近500平方公里的土地,相当于再建一个四环以内的北京城;要建近500平方公里的住房,相当于238个天通苑;要增加交通出行550万人次,相当于整个伦敦现在的

全部出行量;每年要增加6亿立方水的消耗,相当于南水北调水量的一半;要增加中学167所、小学208所。所以,此类城市必须从源头上控制人口增长,控制产业发展规模,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2. 用城市群解决人口过度集聚和膨胀问题

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存在的问题可以用发展城市群的方式解决,因为在一定的时间和空间内,大城市无法快速提供高质量的公共服务,只有把大城市的一部分职能分解到中小城市,在促进中小城市发展的同时,快速缓解大城市压力,让人们就近城市化。

3. 改革户籍制度

常住人口在500万人以上的城市要有条件地控制人口规模,常住人口在500万以下的城市则要放开准入制度,改革现行的户籍制度,逐步取消现有的二元户籍制度,建立与此类型城市相对接的新户籍制度,统一这一区域的城乡户籍管理,有条件地放宽和完全放宽人口迁移政策,对于条件好的城市应实现人口自由准入,同时要结合本地实际情况,建立覆盖城乡的进城务工人员服务网络体系,逐步取消对进城务工人员的身份限制,最终形成进城务工人员在城乡间的合理流动机制。^[4]

4. 加强教育培训,提高和增强进城务工人员的专业技能和公民意识

我国进城务工人员的文化素质整体不高,无法适应工业化和现代化快速发展的要求,需要不断地对他们进行科学教育和技能培训,提高他们的知识、技能、道德水平,使其能更好地在城市工作和生活。同时,要增强进城务工人员的公民意识,培育公民精神,提升文明程度,使其有能力行使公共管理的权利,更好地参与城市管理,更好地融入城市社会环境。

5. 加强事关农业转移人口利益的民生建设

目前居高不下的房价让许多农业转移人口

面对城市生活望而却步,所以政府应当加大政策调控力度,切实解决农业转移人口的住房问题,让他们在城市里能安居乐业,成为真正的城市人。同时,政府应维护教育公平,通过降低门槛等方式使农业转移人口子女有机会接受城市良好的教育,切实维护农业转移人口子女依法平等接受教育的权利。

参考文献:

[1] 潘家华,魏后凯.中国城市发展报告: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3.

[2] 刘万云.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主要问题及对策[J].河南教育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3):97.

[3] 朱筱凯.城市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问题研究——基于对杭州及周边地区的调查[D].杭州:浙江大学,2008.

[4] 彭小文,兰东,胡仁群.城镇化进程中我国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问题研究[J].理论导报,2013(11):18.

本刊数字网络传播声明

本刊已许可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电子杂志社在中国知网及其系列数据库产品、万方数据资源系统、维普网等中以数字化方式复制、汇编、发行、信息网络传播本刊全文。其相关著作权使用费与本刊稿酬一并支付。作者向本刊提交文章发表的行为即视为同意我刊上述声明。



引用格式:何琰. 大数据技术在审计中的应用[J]. 郑州轻工业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6,17(3):67-71.

中图分类号:F239.1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9/j.issn.1009-3729.2016.03.011

文章编号:1009-3729(2016)03-0067-05

大数据技术在审计中的应用

Application of big data technology in the audits

何琰

HE Yan

河南省审计厅 计算机审计中心, 河南 郑州 450003

摘要:大数据技术的发展,对未来审计信息化进程将产生重要影响。大数据技术引发了审计目标、审计内容、分析技术和审计思维模式的转变。应用大数据分析技术,审计方法将从数据验证性分析向数据挖掘性分析转变;应用大数据分析模式,审计方式将从发现问题向风险预警转变;应用大数据审计作业平台,可实现单机审计向云审计的转变;构建专业的审计分析队伍,可实现传统纸质账本审计向大数据审计的转变。面对大数据时代的机遇和挑战,审计工作应创新大数据工作模式,探索部门预算执行审计全覆盖的方法;应用数据分析作业平台,开展跟踪审计;多领域数据融合,开展经济责任审计;深入挖掘数据,开展宏观经济形势预测,不断提升大数据技术在审计中的有效运用。

关键词:

大数据技术;

审计;

数据分析;

收稿日期:2016-05-01

作者简介:何琰(1985—),女,河南省邓州市人,河南省审计厅审计师,网络工程师,主要研究方向:计算机审计。

同人力资源、自然资源一样,大数据也是一种资源且是非常重要的战略资源^[1],它将世界的本质看成是数据的集合,用数据化思维和先进的处理技术去探索海量数据之间的关系。大数据的特征可以归纳为“4个V”:容量(volume)、多样性(variety)、生成速度(velocity)、价值(value)。目前,大数据已经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巨大引擎,其在提升产业竞争力、推动商业模式创新、国情分析和社会管理等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大数据技术,是指从各种类型的数据中快速获得有价值信息的一种技术,其水平反映了提取有用信息的能力。鉴于此,本文拟在分析大数据对传统审计带来的挑战的基础上,探索大数据审计的方式和途径,以应对大数据时代给审计工作带来的深刻变革。

一、大数据对审计工作带来的影响和挑战

大数据审计是对各类电子数据、账套、文件进行审计,是计算机审计的延伸和发展,是对多行业、多领域、多种形式海量数据的电子审计方式。大数据审计既要处理结构化数据,又要处理大量的非结构化数据,对审计目标、审计内容、分析技术和审计思维模式都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

1. 审计目标的转变

在信息化发展初期,计算机审计能够通过观察和分析发现疑点,为审计提供线索。随着大数据时代的到来,审计目标逐步转向发现线索、评估风险、关注效益等方面,审计不仅要发现违法违规问题,更多的是要揭示制度方面存在的问题,评估内控风险,通过对经济社会相关大数据的获取和分析,洞察行业整体走向,探索发展规律,对国家、行业、部门的制度出台与发展策略做出前瞻性的思考和战略性的分析。

2. 审计内容的转变

传统意义上的“数据”大多是指数字,如主营业务收入金额、营业费用等,由简单数字或用数字编码的简单文本组成,传统的数据分析工具基本上能够满足其需要。而大数据不再单纯指数字,其涵盖的内容更加宽泛;传统意义上的“数据”是关系型的、结构化的二维表数据,而大数据则是指在不同时间生成的复杂、异构、多样化的数据,包括xml、html、文本、音频、视频和“影子数据”(如访问日志和web搜索历史记录)等。

3. 分析技术的转变

顾名思义,大数据分析就是指对规模巨大的数据进行分析。大数据分析包括5个基本方面:一是可视化分析,利用图表完整展示数据分析的过程和数据链走向;二是数据挖掘算法,从海量的、随机的、不相关的数据中构建数据挖掘模型,提取有价值的、隐含在数据内部的信息;三是预测性分析能力,根据可视化分析和数据挖掘的结果,做出预测性的判断;四是语义引擎,借助一系列的工具去提取、解析和分析数据,从“文档”数据中自动提取信息;五是数据质量和数据管理,通过标准化的流程和工具对数据进行处理,保证数据分析结果的质量。

4. 审计思维模式的转变

大数据时代带来审计思维模式三大转变:一是实现审计全覆盖而非抽样审计,对公共资金、国有资产、国有资源和领导干部履行经济责任情况实行审计全覆盖^[2]。二是审计数据的混杂性而非精准性。传统审计以财务数据为审计重点,其核心是结构化的报表和凭证信息,而大数据具有高度的数据混杂性,数据类型涵盖了结构化、非结构化和半结构化的数据,保留了最宝贵、最有价值的信息,其内涵具备更深、更广的洞察力。三是大数据主要反映事物的相关关系而非因果关系。大数据没有改变审计事务间

的因果关系,而是注重对相关关系的开发和利用,使得数据分析对因果逻辑关系的依赖性降低了,甚至更多地倾向于基于相关关系的数据分析。

二、大数据审计的方式和途径

面对大数据时代对审计工作带来的挑战,审计方式和途径将实现以下4个方面的转变。

1. 应用大数据分析技术,实现审计方法从数据验证性分析向数据挖掘性分析转变

传统的计算机审计,是通过电子数据采集转换对数据进行验证,通过构建查询分析、多维分析等方法模型进行数据分析,而应用大数据分析技术,则能够使审计数据分析逐步由传统的验证性分析向挖掘性分析转变。挖掘性分析是指采用大数据处理技术,利用数据仓库、数据挖掘和模型预测工具进行审计分析^[3],从大量数据中发现蕴涵的数据模式和规律,包括分类分析、聚类分析、关联分析和序列分析等。其中,分类分析按照数据属性,将数据分派到不同的组中;聚类分析根据数据的相似性原则,将数据划分为若干类别,使同类数据差别极小,不同类别数据差异尽可能大;关联分析可发现隐藏在数据间的相互关系,通过挖掘发现不同数据间的密切度或关系;序列分析可发现数据出现时间、出现序列的规律,分析数据间的关联性。

例如,在金融审计中,运用数据挖掘中决策树的关联规则和挖掘方法,可对不良贷款与正常贷款之间相互错分的规律进行研究,创建对不良贷款和正常贷款具有较强分类能力的条件属性指标,从而增加分类预测模型的可理解性,并在一定程度上揭示商业银行信贷资产风险等级分类的相关规律^[4];在税收征管审计中,利用聚类方法,根据聚簇规则,可将纳税户进行分组,使组内纳税户具有最大的相似性,组间纳税户具有尽可能大的相异性,从而产生聚类标准,

并按照标准对纳税户进行分行业、分税种聚类分析,确定纳税群体的总体情况和特征,为审计目标和审计重点的建立提供依据。

2. 应用大数据分析模式,实现审计方式从发现问题向风险预警转变

传统审计工作以发现问题为主,对经济形势进行预测分析,因而须等到相关事件发生并且形成一定规模后,再根据搜集到的足够数据进行分析研究,具有滞后性^[7]。而大数据技术可通过对跨领域的大规模经济、社会行为数据进行分析,对经济社会相关异常动态实现早期关注,利用其对异常数据的敏感性实现早期预警。当前,审计可以运用大数据相关技术,对宏观经济社会风险问题展开初步分析。例如,可以综合利用政府债务审计数据、社保审计数据、宏观经济运行数据、金融市场数据等多种数据库构建大数据集合,运用数据挖掘等数据分析工具,结合多个数据库信息交叉分析与宏观经济运行相关的事件,通过基于个别领域、结构化的数据分析,不断将半结构化、非结构化的跨领域数据加入分析框架中,逐步提高大数据审计的分析能力。

3. 应用大数据审计作业平台,实现单机审计向云审计转变

以审计大数据为中心建设“云审计”平台,实现远程存储和移动计算,使审计机关能够通过网络接入“云”实施审计,利用大数据分析、人工智能等信息技术,解决数据采集分析和管理中存在的问题,实现审计成果共享。其次,应完善联网审计系统,逐步建立预算、执行、财政、地税、社会保障、医疗机构、公积金等重要行业和部门的审计实时监督系统。再次,应建设审计数据综合分析平台,运用大数据技术,加大业务数据与财务数据、单位数据与行业数据,以及跨行业、跨领域数据的综合比对和关联分析,提高运用信息化技术查核问题、评价判断、宏观分

析的能力。最后,应推广“总体分析、发现疑点、分散核实、系统研究”的审计模式。

4. 构建专业的审计分析队伍,实现传统纸质账本审计向大数据审计转变

审计工作应实现“六大转变”,即由单点离散审计向多点联动审计转变、由局部审计向全覆盖审计转变、由静态审计向静态与动态审计相结合转变、由事后审计向事后与事中审计相结合转变、由现场审计向现场审计与非现场审计相结合转变、由微观审计向微观与宏观审计相结合转变。为此,需要在组织方式、人员结构、思维方式等方面与之相适应。在组织方式上,应尝试开展无项目审计,依托审计数据中心积累的数据资源,横向关联比对分析,纵向深入挖掘分析,从数据中发现审计疑点和线索。在人员结构上,应不断提升“四种能力”,即大数据分析能力、综合研究能力、创新能力和跨领域知识运用能力,不断加强对大数据先进理念和前沿技术的学习,掌握大数据分析方法,提升审计人员综合素质。在思维方式上,应培养“数据先行”意识,以数据为核心,使数据分析在审计工作开展前先行实施,根据数据分析结果,有重点、有步骤、有深度地在审计实施过程中进行核查验证、追踪线索、发现问题,全面深化大数据技术在审计工作中的应用。

三、大数据技术在审计中的应用

大数据技术在审计中的应用广泛,具体说来,主要表现在以下4个方面。

1. 创新大数据工作模式,探索部门预算执行审计全覆盖

传统的以处(科)室为单位的孤立审计,已不适应大数据审计的要求,需要打破部门界限,以审计项目为管理主线成立大审计组,进行扁平化管理。大审计组分领导小组、数据分析组和问题核查组三个层面:领导小组负责审计方

案的制定、领导决策等,由牵头机构组建;数据分析组由审计能手和计算机操作骨干组成,具体负责审计实施,筛查审计疑点和线索;问题核查组由审计一线人员组成,进行实地延伸核查。例如,在“同级审”项目中,采集各部门预算执行审计数据,通过对数据进行集中分析,发现是否存在部分预算项目缺乏科学论证、影响预算执行的问题;结合各预算部门的财务数据,发现是否存在预算项目因连年结转的情况下仍然安排新增预算、造成资金闲置的问题;通过对数据进行宏观整体分析,发现是否存在预算执行效率不高、分配下达预算不及时、拨付转移支付资金超期等情况。

2. 应用数据分析作业平台,开展跟踪审计

通过建设审计数据综合分析平台,搭建关系国计民生的重点行业联网审计系统,用 Hadoop 等专业工具处理半结构化、非结构化数据,规范高效地汇集和处理大规模数据信息。例如,在地税审计中,可利用地税联网审计系统,集中进行全省地税数据整理分析,探索“数据集中采集、集中统一分析、疑点分布落实、资源充分共享”的大数据审计模式,实现全省联动审计;通过构建查询分析模型、多维分析模型,固化审计思路,对地税数据进行全面分析,重点选择税款征收、税款缴纳和税款管理等信息,在财政审计中,运用部门预算执行分析平台,将独立运行、分散存储的各部门预算编制、预算指标、部门决算、部门财务核算等业务数据,进行标准化清洗和整理,同时与组织预算执行数据进行整合,实现各类资金的横向关联,对资金分配结构、资金使用流向、资金管理情况进行总体分析,全面反映预算执行整体情况,实现对预算单位的审计监督全覆盖。

3. 多领域数据融合,开展经济责任审计

运用关联分析,找出数据间的相互联系,分析关联规则,发现异常联系和异常数据,寻找审

计疑点。在经济责任审计中,可利用财政、税务、社保、公安、工商、养老、房管、教育、培训等数据,进行纵向比对、横向关联分析。例如,可将城镇居民医保、城镇职工医保、新农合等信息进行综合分析,检查是否存在同时参保、重复报销、虚假报销、套取资金等情况;将小额担保贷款与人社部门行政事业单位人员信息进行关联分析,检查是否存在违规向行政事业单位人员发放担保贷款和进行财政贴息的问题;将职业技能培训补贴、创业培训补贴与企业法人和行政事业单位人员进行关联分析,检查是否存在向不符合条件人员发放就业补贴的问题;将人社、农业、扶贫、教育、民政管理的各项培训资金进行关联分析,检查是否存在虚报冒领财政资金的问题;将义务教育、中职中专、中学学籍数据与中职助学金发放、免学费补贴等信息进行关联分析,检查是否存在虚报冒领或者套取中职助学金、免学费补贴等专项资金的问题。

4. 深入挖掘数据,开展宏观经济形势预测

利用数据仓库、数据挖掘和模型预测工具进行审计分析,运用回归分析等统计方法,分析趋势变动或数据关系,发现总体情况和规律,进而揭示体制机制性问题。例如,在“三公经费”专项审计中,可通过各预算单位财务核算数据提取“三公经费”预算编制和实际支出情况,结合单位人员花名册,构建统计分析模型,进行结构分析和时间序列分析,横向比对所有预算单位“三公经费”的支出规模、各项支出占比、人均支出金额与年度支出趋势等,分析其压缩控

制比例是否符合要求,各项支出比例和人均支出金额是否存在异常和明显偏离,进而挖掘行业性、趋势性问题,并对离群点进行延伸,发现违规违纪问题线索等。再如,利用城镇或农村居民家庭人均收入指数和各地制定的最低收入保障标准进行分析,查找人均收入指数与最低收入标准间的差异,分析各地低收入标准制定是否科学,为政府制定宏观经济政策提供参考。

综上所述,大数据技术的发展对审计工作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也为审计提供了新的工具。大数据审计应从数据、人才和技术等方面逐步积累基础资源,创新工作思路,研究技术方法,培养高素质人才,不断提升大数据技术在审计中的有效运用。

参考文献:

- [1] 怀进鹏. 大数据是国家战略资源[J]. 中国经济和信息化,2013(8):49.
- [2] 秦荣生.《关于完善审计制度若干重大问题的框架意见》学习笔谈摘要[J]. 审计研究,2016(1):3.
- [3] 李玲,刘汝焯. 计算机数据审计[M]. 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2:4-36.
- [4] 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署. 基于数据挖掘的贷款风险等级分类真实性审计研究[J]. 审计研究报告,2012(11):2.
- [5] 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署. 大数据在公共管理中的运用与审计启示[R]. 审计研究报告,2013(7):1.



引用格式:张胜利. 转型期高校就业质量评价体系构建问题探析[J]. 郑州轻工业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17(3):72-77.

中图分类号:G64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9/j.issn.1009-3729.2016.03.012

文章编号:1009-3729(2016)03-0072-06

转型期高校就业质量评价体系构建问题探析

Exploring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system of university employment quality evaluation in the transition period

张胜利

ZHANG Sheng-li

郑州轻工业学院, 河南 郑州 450002

摘要:高校就业质量评价具有理论性与现实性、主观性与客观性、主体性与客体性等多重属性。面对国家整体就业结构的升级完善和高校人才培养模式的转型调整,就业质量评价受到国家、经济、高校及个体等因素的影响。遵循科学性与整体性、可操作性与独立性、静态评价与动态评价、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等相结合的原则,构建“量”和“质”并重的高校就业质量评价体系:一是构建科学的指标体系,优化就业质量评价标准;二是构建开放式评价机制,提升就业质量评价信度;三是构建循环式评价模式,增强就业质量评价效度。

关键词:

高校毕业生;
就业质量评价体系;
转型期

收稿日期:2016-05-12

基金项目:河南省科技厅软科学研究计划项目(132400410060);河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2013BDJ009)

作者简介:张胜利(1956—),女,江苏省丹阳市人,郑州轻工业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高等教育管理。

高校就业质量评价具有理论性与现实性、主观性与客观性、主体性与客体性等多重属性。客观公正的就业质量评价可以作为衡量一所大学办学质量和办学水平的重要参照标准,它在一定层面上反映了大学人才培养质量高低、专业设置的科学与否、市场供需的平衡程度等。不可否认,目前在不少地区、不少高校还存在着把就业质量简单化、片面化、绝对化,甚至把就业率等同于就业质量等问题。从客观上讲,就业质量评价是一个系统性较强的衡量体系,因此,面对同质化日益严重的大学发展和国家就业结构整体升级转型的现状,系统研究高校就业质量评价存在的问题,剖析问题存在的根源,构建高校就业质量评价体系,是当前高校就业工作和人才培养工作理论研究的核心意旨之一。鉴于此,本文拟在对就业质量的内涵、高校就业质量评价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的基础上,提出高校就业质量评价体系构建的原则和思路,以期对提高高校就业质量有所裨益。

一、就业质量的内涵

自20世纪末国际劳工组织提出“就业质量”^[1]一词以来,在国外某些研究中,就业质量一直与工作质量、生活质量、体面劳动等联系在一起,多数学者认为就业质量包含多方面的内容,如终身学习、工作技能、职业发展、健康与安全、工作稳定性、工作与生活的双平衡、社会对话、劳动者的社会参与度、工作多样性与非歧视性等。就我国而言,1990年代后,国内研究人员开始集中研究就业质量问题,在2004年劳动和社会保障部与国际劳工组织共同举办的“中国就业论坛”上,“提高就业质量”第一次作为一项政府工作目标被提了出来。之后,就业质量问题开始引起人们的极大重视,越来越多的学者也开始研究就业质量问题。综合当前研究成果,就业质量具有三个层面的内涵:其一,从

毕业生个体角度来看,就业质量包含寻找工作、获得工作、确定职位、获得报酬、职业培训、发展空间、职业生涯等。在这个层面上,就业质量是毕业生从择业到就业、再到职业发展过程每一个环节中被公平对待的程度,其衡量的标准主要包括工资收入、工作地点、职位环境、晋升空间、社会保险等几个方面。其二,从高校角度来看,就业质量既有就业率“量”的体现,更有毕业生成才率等“质”的要求。具体而言,这里的就业质量包括毕业生的签约率、违约率、灵活就业率、待就业率、自主择业率、国家和地方基层就业项目比例等指标。如果毕业生的签约率较高、违约率和其他指标在合理范围内,同时毕业生与用人单位双方满意度较高,职业发展状况良好,就业质量就高。其三,从社会或国家角度来看,就业质量与经济社会发展状况和水平密切相关,包含就业率、失业率、平均收入水平、劳资状况、社会保险状况、安全保障等一系列问题。如果劳动者的安全、人身尊严和权利都能得到保障,能够平等地参与社会对话和组织管理,就业质量就高^[2]。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就业质量是一个相对的、包含主观和客观因素的综合性概念,是不同的个体或组织对自我或他人的就业全过程中在一段时间内进行的综合价值判断。

二、高校就业质量评价的影响因素

从商品学角度看,质量是指事物满足人们需求的程度^[3]。照此理解,商品满足人们的需求程度越高,其质量就越好,反之,其质量就越差。从理论上讲,当毕业生作为就业主体进入劳动力市场后,其自身就具有商品属性,就成了商品。因此,毕业生就业质量的高低从根本上讲取决于毕业生满足需求主体——雇主的程度。但我们应看到,高校就业质量不能简单地从需求主体一个层面来评价,其影响因素是多

方面的。具体说来,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 政府因素

当前,随着国家产业转型升级进程的不断加快,人才市场的供需关系正由以高校为主导的供给驱动变为以用人单位为主导的需求驱动^[4]。大学生就业政策由过去的“统招统分”转变为“市场导向、政府调控、学校推荐、学生与用人单位双向选择”,这势必要求政府、市场、高校、用人单位及学生个人对其角色进行新的定位。

政府政策的调整直接影响到高校毕业生的就业情况,如近年来毕业生人数逐年增加,就业竞争日趋激烈,这就要求政府通过相应政策引导高校树立起市场竞争的意识和优胜劣汰的危机感,在对接行业产业需求、优化人才培养结构、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和就业质量上主动作为、有所作为;引导毕业生迅速调整定位,主动寻求自身职业的发展。如当前,国家通过实施基层就业政策、自主创业政策等,为大学生择业提供更多发展机会,促进毕业生高质量就业等均体现了政府对高校就业质量的影响。

2. 经济因素

当前我国经济发展步入新常态,经济增速正从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长,发展方式正从规模速度型粗放增长转向质量效率型集约增长,发展动力正从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经济环境的变化使毕业生高质量就业面临新的机遇和挑战,要求高校更加注重内涵发展、特色发展、体制创新、需求导向。同时,由于我国区域经济文化发展的不平衡,部分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低,无法给毕业生提供更大的发展平台,制约着毕业生就业质量的提高。

3. 高校因素

我国高校主要包括重点高校(985或211高校)、一般高校、高职类高校等几类。研究显示,不同类别高校的毕业生在就业状态、薪酬水

平、就业单位性质上存在显著差异。其中,重点高校毕业生的薪酬水平、签约单位水平等要优于一般高校毕业生。重点高校凭借其高质量的教育为毕业生提供了天然的竞争优势,使毕业生在求职市场中保持较明显的优势地位;另外,实证研究显示,高校所在区域对毕业生的就业质量也有影响,这不利于毕业生的合理流动和竞争^[5]。同时,部分高校办学定位模糊,单纯追求发展规模与速度,偏重于追求学校升格和学科专业设置的“大而全”,少数高校对自身的学科专业特色、办学优势和整体实力缺乏客观的分析与评价,定位不够准确,这都间接影响着毕业生的就业质量。

4. 个体因素

毕业生就业质量高低最直接的影响因素是个体的能力素质,学生的学习成绩、实践经验、创新能力等直接影响毕业生的就业质量,尤其在目前就业竞争日趋严峻的形势下,用人单位越来越注重毕业生的综合素质和能力。因此,学生在校期间在注重文化课学习的同时,更应注重参与实践实习,改变重理论轻实践、重知识轻能力、重专业轻素养的倾向,更加注重科学知识、思想品德、人文素养和实践能力的融合,着力培养自己的岗位适应能力,缩短自己的职业适应期,为自身获得更好的职业发展奠定基础。此外,学生的就业观念和职业认知也影响着就业质量,学生若在求职过程中不考虑职业发展的空间,不考虑自身的能力及兴趣爱好,必然会导致日后工作满意度较低,工作稳定性较差,影响自身的职业发展。

由此可见,政府因素、经济因素、高校及个体因素都会对高校毕业生就业质量产生影响。

三、高校就业质量评价体系构建的原则

就业质量评价需要确定评价指标和评价要

素,而科学确定评价指标要根据一定的原则进行^[6]。由于评价主体的多元性、评价客体的抽象性、评价内容的复杂性等影响因素,同时,评价还涉及计算方法设置的科学性、评价信息收集分析的风险性等,因此,就业质量评价体系建构必须遵循科学的原则。

1. 科学性与整体性相结合的原则

就业质量评价是一项科学性很强的工作,因此,就业质量评价一定要遵循科学性的要求,合理地组织和实施。就业质量评价标准的确立、评价指标体系的建构、评价程序与方法的实施、评价结果的分析与解释等,都应该具有科学的评价信度与效度。就业质量评价的区分度应该是明确的,就业质量评价要能比较真实地反映评价客体的全貌,能较好地诊断、鉴别出差异。就业质量评价是大学人才培养质量评价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在具体的就业质量评价工作中,必须正确认识和把握就业质量评价在整个人才培养工作中的地位和作用,片面夸大或缩小就业质量评价的作用,必然违背就业质量评价的整体性原则。

2. 可操作性与独立性相结合的原则

就业质量评价方案及其程序方法是否可行,是做好就业质量评价工作的前提。开展就业质量评价虽经周密筹划和精心设计,但如果评价十分复杂,需要投入很大的人力和物力,或者方法繁琐,难以为一般人所掌握,那么这种评价即便方案设计得科学、方法选用得合理、方向把握得正确,也很难达到预期成效。因此,在就业质量评价实际工作中,应注意:第一,评价指标体系应在保证达到评价目的的前提下,尽量简化;第二,整个评价工作应力求简单易行,不仅指标体系的制定是这样,而且评价的组织实施也是如此,应采用合理得当的方式、方法搜集和处理信息。

3. 静态评价与动态评价相结合的原则

就业质量评价应包括对就业工作过程和结

果两方面的评价。在就业质量评价中,对评价客体已经达到的状态即结果进行判断,称为静态评价。静态评价不考虑评价客体过去的情况和今后的发展趋势,只考察评价客体在特定的时间和空间中的现实状态。这种评价的优点在于方便横向比较,可以看清评价客体是否达到某种标准,但不利于进行纵向比较,不容易看到评价客体过去和今后的发展潜力。对评价客体的发展状态进行评价即对就业的过程进行评价,称为动态评价。只有将静态评价与动态评价结合起来,才能更好地发挥就业质量评价功能。

4. 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的原则

就业质量评价一般会包括就业率、毕业生供需比、薪金水平、就业结构、社会认可度等多项考核评价指标,各指标间又有不同的权重分布,这种定量分析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评价数据量化,能较快得出统计结论,但其缺点也是明显的。在现实就业质量评价中有很多因素无法用数据来衡量,只有采用主观定性的方法,因此主观定性分析的合理性和趋人性化就明显强于定量分析。所以,就业质量评价必须坚持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的原则,以客观系统地反映毕业生就业质量评价的效度。

四、转型期高校就业质量评价体系的构建

目前,我国尚缺乏较为科学完善的高校毕业生就业质量评价体系,尤其是作为人才培养主体的高校,在毕业生就业质量评价过程中占据重要的地位,但目前,绝大多数高校对毕业生就业质量的评价,仅停留在对就业率的统计和上报这个层面,缺乏科学有效的就业质量评价体系。就业率仅反映毕业生在某时间段内的就业数量,无法客观真实地反映毕业生就业质量,也不能准确评价不同高校毕业生之间就业的质

量差异。因此,应破除单一使用就业率来评定就业质量的评价模式,构建一个科学的毕业生就业质量评价体系。

1. 构建科学的指标体系,优化就业质量评价标准

毕业生就业质量评价指标体系应由反映毕业生就业质量内涵的评价指标、观测点及评价标准构成^[7]。评价指标应包括就业率、需求情况、就业结构、满意率及违约率等,每个评价指标应包含若干二级观测点,每个观测点应有相应的评价标准。

其中,就业率的统计应严格按照国家和教育行政主管部门的要求进行。用人单位需求情况涵盖很多方面,就就业质量评价而言,应从可操作性出发,选取包括高层次单位就业比例、新兴领域就业比例、重要岗位比例及需求与专业相关性等作为观测点。高层次单位就业主要指到国家重点行业、重点地区、重大工程、重大项目和战略性新兴产业等领域就业,包含需求单位性质为机关、科研设计单位、高等教育单位、医疗卫生单位、国有企业以及全球500强企业、国内500强企业等^[8];新兴领域就业主要指涉及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的就业,包含金融保险、节能环保、电子商务、现代物流等生产性服务业和旅游休闲、健康养老、社会工作、文化体育等生活性服务业就业;重要岗位是指企业骨干、高层次人才队伍以及高级管理人员等岗位;需求与专业相关性是指需求岗位与学生专业的相关度。就业结构应包含高层次单位就业比例、考研(包括出国、境读研)比例、创业比例、基层就业比例及就业单位与专业相关性等观测点。满意率和违约率作为就业质量评价指标,在评价方式上主要应采取跟踪测评、问卷测评、走访调研、座谈、网络评价等方式进行。也有学者提出,就业地域、就业城市也可作为就业结构中评价就业质量的重要观测点,但从可操作性上讲,到

发达地区(城市)就业与到欠发达地区(城市)就业是无法确定客观标准来判断就业质量优劣的。

需要说明的是,任何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只是提供就业质量评价的一种参考模式,在评价的时间节点、观测点的建立,各评价指标的权重,以及评价标准的确立上,都可根据不同高校的实际情况,进行适当调整。

2. 构建开放式评价机制,提升就业质量评价信度

目前,高校就业质量评价的主体主要是教育行政管理部门,而教育行政管理部门对就业质量评价缺乏统一的依据,既不能较好体现评价主体——学校的主动性,也不能较好体现评价客体——学生的参与性,更难真实体现社会团体、用人单位、学生家庭等社会单位的意志。可以说,这是一种较为狭隘的评价,它只能反映教育行政管理部门对高校就业和人才培养工作的看法,而不能全面地反映与高校就业和人才培养工作紧密相关的单位与个人的意志。因此,应将高校就业质量评价设定为一种开放式评价,其基本特点是:

一是评价主体多元化。评价主体由原来的教育行政管理部门、相关高校二元制,拓展为教育行政管理部门、相关高校、社会专门评价机构或社会自助团体、社会用人单位、学生、学生家庭6个层面。

二是评价主体的参与范围进一步扩大。目前,高校就业质量评价主体的参与范围仅涵盖某一时期高校就业和人才培养工作的绩效,而不能作为一个动态过程看到高校就业和人才培养工作的全貌。评价体系中加入上述4个层面的新主体,将会对高校就业和人才培养工作进行动态的追踪和评判,大大提高高校就业质量评价结果的信度。

三是专业评价主体的引入使评价做到制度

化、经常化。专业评价机构并不是什么新事物,但真正从事学校就业质量评价的专业机构几乎没有。应尝试由政府 and 高校共同组建一个经常性的专业评价机构,取消当前的随机性、临时性的评价团体,政府和高校只需给予指导,并给予一定的经济补贴即可。这样做一方面能保证高校评价的经常化,另一方面又可节约评价成本,同时也能通过该机构对评价数据进行科学化、规范化的收集和整理,为政府和高校就业指导 and 人才培养工作提供较为专业的依据。

3. 构建循环式评价模式,增强就业质量评价效度

就业质量评价应是一个兼具开放和循环特性的实践评价模式。循环式评价模式的过程性、动态性能很好地解决为评价而评价的被动局面,能把高校就业质量评价的数据信息较好地反馈给国家及各级教育行政主管部门,以便科学决策、有效管理。针对循环式评价模式中的数据传递或数据反馈问题,可以从以下方面做出优化设计:第一,基于教育主干网,搭建就业质量评价数据传输专用平台。当前,我国的教育主干网络已经相当成熟,国家可以协同各级教育行政主管部门及各高校建立相应网上数据库申报系统或者专线传输系统,把常态化的由各高校自行申报的就业质量评价数据发展为国家或地区性主干数据库,通过数据库的比对分析,把雷同的数据筛选出去,把独有的数据保留下来。这样做可以时刻保持主干数据库里数据的最新性和前沿性。第二,基于社会专业评价机构,建立数据的收集、分析、报送渠道。国家或各级教育行政主管部门可以首先成立由政府牵头的社会就业质量评价机构,随后,再逐步过渡到具有独立行为的社会专业评价机构。这样做可以保证就业质量评价和信息传送的专业性、科学性、持久性。第三,基于各就业质量评

价管理主体的常设机构,建立数据收集、整合、报送的常态化机制。当前,国家及各级教育行政主管部门并没有专门的就业质量评价管理常设机构,需要就业质量评价时便临时设立,评价已过便即时离散。这种非常态的管理模式已经不能适应当前高校就业和人才培养工作的发展要求。国家及各级教育行政主管部门可以根据实际情况,设立相应的就业质量评价管理机构,其主要工作是组织常态化的高校就业质量评价,收集就业质量评价资料,管理就业质量评价档案,分析就业质量评价数据,汇集就业质量评价成果,真正使就业质量评价的成果能得以推广,使就业质量评价的数据能得到科学利用。

参考文献:

- [1] 曹兆文. 国际劳工组织体面劳动衡量指标探要[J]. 人口与经济, 2011(6): 57.
- [2] 王霆, 曾湘泉, 杨玉梅. 提升就业能力解决大学生结构性失业问题研究[J]. 人口与经济, 2011(3): 49.
- [3] 柯羽. 高校毕业生就业质量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J]. 中国高教研究, 2007(7): 82.
- [4] 杜玉波. 坚持立德树人提高高校人才培养质量[J]. 成才之路, 2014(1): 5.
- [5] 赖德胜, 苏丽锋, 孟大虎, 等. 中国各地区就业质量测算与评价[J]. 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 2011(11): 88.
- [6] 卫铁林. 基于 AHP 的高校毕业生就业质量评价模型构建[J]. 教育与经济, 2013(2): 82.
- [7] 范钦栋, 王凯. 关于高校毕业生就业质量的数学评价——以河南省高校为例[J]. 教育与经济, 2014(2): 48.
- [8] 王霆, 张婷. 扩大就业战略背景下我国大学生就业质量问题研究[J]. 中国高教研究, 2014(2): 26.



引用格式:尹悦.“一带一路”背景下河南区域多元外语教育政策研究[J]. 郑州轻工业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17(3):78-82.

中图分类号:H319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9/j.issn.1009-3729.2016.03.013

文章编号:1009-3729(2016)03-0078-05

“一带一路”背景下河南区域多元外语教育政策研究

Research on He'nan regional diversified policies of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in the background of one belt and one road

尹悦

YIN Yue

郑州轻工业学院 外国语学院, 河南 郑州 450002

摘要:“一带一路”建设,对河南省既是机遇又是挑战。因为,任何基础设施建设、经贸往来都离不开语言沟通和外语人才。而目前,河南省在外语教育规划方面,存在着许多问题,如规划不科学、语种设置集中、专业布局不合理等。这些问题导致河南省内英语人才过剩、非通用语人才稀缺,无法满足社会对外语人才的需求。在经济全球化和“一带一路”深入发展的背景下,河南省应结合本省发展需要,培养地方急需的外语人才,实行区域多元外语教育政策:制定关键外语语种计划,优化外语语种结构,培养复合型外语人才,加强区域国别研究。

关键词:
一带一路;
河南省;
区域多元外语教育;
复合型人才

收稿日期:2016-03-20

基金项目:2015年度河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2015G003);2016年度河南省教育厅人文社科项目(2016-ZC-077)

作者简介:尹悦(1987—),女,郑州轻工业学院讲师,上海外国语大学在读博士生,主要研究方向:语言政策和外语教育。

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一国拥有的外语教育资源,不仅关系着该国的全球化水平和国际竞争力,还直接影响着该国的政治安全、经济安全和外交安全。因此,许多国家都十分重视本国的外语教育政策,纷纷结合本国实际需要,制定出相应的外语教育政策,如凸显国家安全的美国外语教育政策、凸显经济发展的荷兰外语教育政策,以及凸显多元文化的澳大利亚外语教育政策等。

经过改革开放近40年的发展,我国的外语教育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是,我国外语教育在政策的制定、语种的设置等方面还存在着缺乏规划、语种单一等问题。我国的外语教育费时低效,以英语为主要语种的同质专业盲目扩张,我们的外语教育在政策和规划上存在重大缺失。^[1]这种缺失除主要表现在外语教育政策制定缺乏中长期的全盘规划、缺乏权威的管理及指导机构、语种设置过于单一和集中,以及发展不协调外,更为突出的是,我国外语教育政策的制定往往还是自上而下的模式,很少结合各地区区域经济与社会发展对人才不同需求的实际,地方在外语教育政策规划的制定和实施中很少有自主权。^[2]在“一带一路”为重要代表的经济全球化、区域经济一体化深入发展的背景下,各地应该结合本地的实际发展需要,制定本区域多元外语教育政策。鉴于此,本文拟以河南省为例,通过对河南省外语人才需求的分析,结合“一带一路”的国家战略需求,提出实施区域多元外语教育的必要性和具体措施,以为“一带一路”提供智力支持和人才保障,弥补国内关于区域外语教育研究领域的不足。

一、“一带一路”给河南外语教育提出的挑战

“一带一路”是“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简称。2013年9月,习

近平主席在访问中亚四国和出席上合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时,提出了“一带一路”的战略构想。这条经济带,发端于中国,贯通中亚、东南亚、南亚、西亚至欧洲,东牵亚太经济圈,西系欧洲经济圈,涵盖40多个国家30亿人口,经济总量约21万亿美元,是世界跨度最长、最具发展潜力的经济走廊。^[3]

河南,作为丝绸之路的重要枢纽,地处丝绸之路陆上交通的战略腹地位置,是连接“一带一路”东西双向的一条重要战略通道。在历史上,河南就是丝绸之路经济走廊的重要区域,如今,郑州、洛阳已被国家成功列入了丝绸之路经济带的重要节点城市,其作为“一带一路”建设的战略支撑点和桥头堡,具有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和区域优势。郑州作为“全国铁路心脏”,向东与海上丝绸之路连接,向西与陆上丝绸之路经济带融合,成为辐射东中西的重要物流枢纽。特别是郑-欧班列的开通,开辟了我国中部地区直达欧洲的物流通道。目前,郑-欧班列已成为国内载货最满、出境口岸最多、货源覆盖最广的赴欧班列。此外,郑州航空港的建设,使郑州成为国际航空货运和国内航空货运的综合枢纽,以郑州为中心的一个半小时航程可覆盖全国2/3的主要城市和3/5的人口,新郑机场的国际航线也在日益增多、不断完善。河南省内四通八达的高速公路通车里程,多年来长居全国首位。河南航空、铁路、公路等交通设施的日益完善与发展,将进一步提升河南省在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中的中枢地位。

可以说,“一带一路”的建设,对河南省来说,是一个重要的发展机遇。河南省可发挥自身的区域优势,加快“东引西进”和“走出去”的战略步伐。“一带一路”经济带建设启动后,必将吸引大量外国企业到河南境内投资,河南省内企业也可以抓住这个机遇,走向世界,参与更广泛、更高层次的合作与竞争。但是,若想抓住

这一发展机遇,首先就要解决语言沟通问题,因为,有限的外语人才资源,已成为制约河南省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因素。这是“一带一路”经济带的建设对河南的外语教育提出的要求和挑战,应对这些挑战,不仅要提高本地区的外语教学质量,改进教学方法,更要从教育政策层面进行调整和完善。

二、河南实行区域多元外语教育政策的必要性

河南实行区域多元外语教育,是基于多种现实需要。

1. 改变外语语种单一教育现状的需要

长期以来,我国一直实行全国统一的外语教育政策。但是,我国疆域辽阔,各地区的情况差异很大,东北、西北、中部、东南和西南等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和外语语种需求都有很大的不同,而我国的外语教育过分突出和强调英语教学的地位和作用,没有兼顾各地的外语教育资源不均衡等实际,也没有实地考察各省份的外语教育资源优势和实际语种需求。^[4]这就导致目前我国的外语教育语种单一、英语人才供过于求、其他非通用语种发展不平衡等问题。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我国外语教育语种明显相对较少,过度集中,应围绕语言的使用范围和用途促使外语语种多样化,各地区的外语教育可以充分发挥地域优势,发展不同语种教育,实现外语教育的多样化、差异化、个性化和生态化,保证外语教育的可持续发展”^[5]。

2. 加强区域间的交流与合作的需要

在“一带一路”的战略背景下,为加强区域内部各成员国和地区的合作交流,推动区域经济发展,各地区必须结合本地区经济、社会、文化、教育环境,制定适合自身发展的外语教育政策。也就是说,要在外语教育实践中发挥地方的主体作用。此外,“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众

多,涉及的语言近200种。虽然说,英语作为全球通用语在世界范围内有着重要的影响力,但是,在“一带一路”沿线地区,其他非通用语种同样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比如,俄语广泛适用于前苏联地区和东欧地区;西班牙语在欧洲、美洲地区的许多国家被作为官方语言使用;阿拉伯语在中东和整个阿拉伯世界都影响甚广。我国长期以来实行的以英语为主甚至是唯一语种的外语教育政策,已不适应经济社会发展对外语人才需求的实际。因此,各地区应根据实际情况,实施多元外语教育政策,培养多语种人才,以加强与周边国家、地区的合作与交流。

3. 促进多元文化认同的需要

多元外语教育,不仅包括多元化的外语语言教育,也包括多元文化教育。通过实施多元外语教育,能够促使更多的学生学习并了解世界的多元文化,增强跨国间公民的相互了解和认同,建立更和谐的国家关系和区域关系,甚至还可以在在一定程度上消除周边国家关于“中国威胁论”的担心,促进国家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因此,各地应根据经济社会发展状况和人才需求实际,实施多元外语教育政策。这符合服务“一带一路”的国家战略的需要,有助于促进公民的多元文化认同,是对我国长期以来执行的外语教育政策的重大改革和突破。

三、“一带一路”背景下的河南外语人才需求

当今社会对外语人才的需求体现出多样性,未来的外语教育必须适应这一需求,既要培养大量的非通用语人才,也要培养复合型、应用型的通用外语人才,同时也要培养精通外语的区域研究人才。

1. 非通用语人才

郑州,作为中-欧班列最大的中转站,是连通境内外、辐射东中西的物流交通枢纽。如今

郑-欧班列的揽货范围已覆盖日韩等亚太国家,下货分拨站点也由原来的波兰、德国扩展到现在的捷克、意大利和法国。而且,随着“一带一路”的深入发展,郑-欧班列的揽货范围还将覆盖东南亚和南亚等地。^[6]据调查,郑-欧班列沿线涉及的重要语言有俄语、德语、波兰语、法语、韩语、日语等,以后还将有泰语、越南语、柬埔寨语等。在此形势下,河南省要加快发展,必须抓住“一带一路”的机遇,在更大范围、更宽领域和更高层次上参与区域经济合作。而在这一过程中,需要大量通晓欧洲、中亚国家语言文化的复合型人才及翻译人才。

然而,目前河南省内高校的语种设置多集中于英语,开设非通用语专业的院校较少,如开设俄语、德语和法语的院校不到5所,开设朝鲜语的院校只有1所,作为联合国常用工作语言的西班牙语和阿拉伯语尚未见有高校开设。虽然英语在全世界很多地区都可以充当交流语言,但是,如果能够用一国的官方语言或民族语言与该国进行交流的话,更能拉近彼此之间的距离,促进彼此的深度交流。因此,河南省应根据“一带一路”和郑-欧班列建设的需要,合理规划语种设置,为高校学生提供足够的语种选择空间,实施真正意义上的多元外语教育。

2. 复合型外语人才

在当今社会,外语已由单纯的专业知识转变为不可或缺的知识工具,学习外语可以用来提高专业知识水平^[7]。社会对纯语言性的外语人才的需求已越来越少,“外语+专业”的复合型外语人才,是经济社会发展对外语人才提出的新的要求。“一带一路”经济带的建设,涉及交通运输、基建、能源等多个行业。这不仅需要精通沿线国家的主体语言、熟悉相关产业业务知识的外语人才,更需要精通行业知识又熟练外语的复合型人才。但是,目前河南省内的大多数院校的外语教育仍是以培养学生的语言技

能为主,许多外语专业的毕业生对于其他行业的知识几乎一窍不通。显然,这已不能满足当今社会的发展需要。

3. 高层次区域国别研究外语人才

“一带一路”经济带的建设,也离不开从事区域国别研究的高层次外语人才。因为,“一带一路”的沿线国家较多,这些国家的文化、制度、风土人情都不同,只有熟悉当地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才能做到真正的“语言相通、民心相通”。因此,河南省的高校在加强外语语言教育的同时,还应当开展沿线相关国家的区域国别研究,以促进“一带一路”的建设。

四、河南实行区域多元外语教育政策的建议对策

“一带一路”覆盖的沿线国家的官方语言数量超过40种,与这些国家和地区的语言交流问题,已成为制约河南省加入“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障碍。基于对区域多元外语教育的战略思考,结合河南省外语教育现状及“一带一路”对河南省外语语种的需求,笔者在此提出河南实行区域多元外语教育政策的以下对策建议。

1. 制定关键外语语种计划

由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较多,我们不可能开设沿线所有国家的语种,但是,河南省政府和教育部门应发挥引导作用,做好语种需求、人才数量的预测,做好外语教育的规划,制定关键语种政策,优先发展河南省目前急需的外语语种,如俄语、德语、法语和意大利语等。

2. 优化外语语种结构

目前,河南省内的外语人才市场,出现英语人才过剩、非通用语人才稀缺的现象。因此,河南省内高校应根据本地的投资、贸易、交通、旅游等实际需求,合理调整外语专业布局,通过逐步减少英语专业、增设非通用语专业等措施来优化外语语种结构,有计划、有针对性地培养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有关语种的外语人才。其具体措施:一是控制英语专业的数量和招生规模。目前,英语人才已经供过于求,已出现英语专业毕业生就业难的问题,因此应合理规划英语专业的数量。二是增设非通用语专业。郑-欧班列沿线国家语言有几十种,而目前,河南省内高校开设的非通用语仅有5种,远远不能满足“一带一路”建设的语言需求。因此,河南省内高校应根据实际情况增设非通用语专业,培养非通用语人才。三是开设非通用语课程。目前,河南省内的英语专业学生的第二外语90%以上都为日语,第二外语语种单一。因此,河南省内高校应增设非通用语课程,为英语专业和其他非英语专业的学生提供更多的第二外语语言选择。

3. 培养复合型外语人才

当前社会对于人才的知识结构和综合能力要求很高,对单一工具性的外语人才需求越来越少,对具备交叉学科知识体系的复合型外语人才需求量越来越大。因此,未来的外语人才不但要掌握熟练的外语技能,而且要精通相关学科的知识,具备学科间的知识交叉和融合能力,只有这样,才能满足社会的需求。^[8]外语院系应当合理优化课程设置,将复合型外语人才的语言基础和技能课程与专业知识课交叉融合起来,利用外语知识来提高专业技能,在学习专业知识中强化外语能力,改变外语人才知识结构单一的现状。

4. 加强区域国别研究

多元外语教育不仅包括语种教育的多元化,也包括文化教育的多元化。“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较多,这些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等都有很大的不同。应全面了解沿线国家的民俗、礼仪、宗教、禁忌等,任何的疏忽都会导致国家之间不必要的矛盾甚至冲突。“一带一路”建设,需要不仅精通外语而且熟悉沿线国家的政治、地理、风土人情等外语人才,这也是外语人

才跨文化交际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河南省高校的外语院系不能只重视学生外语技能的培养,更要加强区域国别研究,培养真正具有国际视野、熟悉国际规则、精通外语、熟悉外国文化的复合型外语人才。

五、结语

“一带一路”经济带的建设,在给河南省带来发展机遇的同时,也带来了巨大的挑战。河南省若想抓住这一发展机遇,首先,政府尤其是教育主管部门,应从我国的国情出发,结合本地区实际,赋予地方教育管理机构 and 高校更大的自主权,改变绝大多数高校以英语为唯一外语语种的局面,实行区域多元外语教育政策。其次,河南省作为国家“一带一路”的中心地区,教育部门及高校应抓住机遇,合理调整外语专业布局,优化语种结构,开展多元外语教育,培养更多的高层次外语人才,以适应“一带一路”发展的需要。

参考文献:

- [1] 胡文仲.我国外语教育规划的得与失[J].外语教学与研究,2001(4):245.
- [2] 李丽生.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实施区域性多元外语教育政策的必要性[J].中国外语,2011(4):55.
- [3] 杨帆.河南全面融入国家“一带一路”战略研究[J].经济研究导刊,2015(16):271.
- [4] 蔡志全.“一带一路”背景下试行多元外语教育政策的思考——以新疆地区为例[J].兵团教育学院学报,2015(1):10.
- [5] 张蔚磊.美国21世纪初外语教育政策述评[J].外语界,2014(2):90.
- [6] 李庚香.新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战略特点与河南的积极融入[J].区域经济评论,2014(6):44.
- [7] 李杨.“一带一路”背景下复合型外语人才的需求分析[J].高教学刊,2015(11):22.
- [8] 张绍杰.践行开放性、融合型、多元观的外语人才培养理念[J].现代汉语,2015(1):131.



引用格式:张福平. 报刊编校中常见语法错误例说(一)[J]. 郑州轻工业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6, 17(3): 83-89.

中图分类号: H0-0 文献标识码: A

DOI: 10.3969/j.issn.1009-3729.2016.03.014

文章编号: 1009-3729(2016)03-0083-07

报刊编校中常见语法错误例说(一)

Common grammatical errors in editing and proofreading of newspaper and periodical(1)

张福平

ZHANG Fu-ping

郑州轻工业学院 学报编辑部, 河南 郑州 450002

摘要:语法,是用词造句的方式、语言的结构规则。所谓语法错误,是指由于语句不符合汉语表达规则或违反思维规律,从而导致语言结构或语义出现偏差。报刊编校中常见的句子的语法错误主要表现为句子成分残缺、搭配不当、语序错位、重复累赘、句式杂糅、表述不清等。编校工作中出现语法错误,许多是由作者或编者对语法认识不到位、经验不足和敏感性不够所致。多了解一些常见语法错误,有助于我们正确判断、及时化解文稿中的语法差错,提高出版质量。

关键词:

编辑;

校对;

语法错误

收稿日期: 2016-03-10

作者简介: 张福平(1967—),女,河南省商丘市人,郑州轻工业学院学报编辑部主任,编审,主要研究方向:文化与传播。

语言是人类思维的工具,也是彼此沟通和进行交际的工具。语言是由文字、词语、概念构成的,但不是简单的堆积,而是按人类约定俗成的规则来排列的,久而久之,便形成了规律,这便是语法、修辞和逻辑。因此,使用语言要遵循约定俗成的语言规律来进行,要讲究语法、注意修辞、符合逻辑,否则便会导致思维混乱,遭遇交际困难。所谓“文理不通”,说的就是由于不懂语言规律而造成的颠三倒四、语无伦次、言不尽意等乱象,以致听者、读者一头雾水,不知所云。惟其如此,驾驭语言文字的能力便被社会公认为“人类的第一能力”。

语法,是遣词造句的方式、语言的结构规则,包括词的构成和变化、词组和句子的组织。本文主要关注的是句法问题。句法着眼于句子的各个组成部分及其排列顺序。造句的基本要求是:结构完整,搭配得当,词序合理,关系明确。所谓语法错误,是指由于语句不符合汉语表达规则或违反思维规律,从而导致语言结构或语义出现偏差。编校中常见的句子的语法错误主要表现为句子成分残缺、搭配不当、语序错位、重复累赘、句式杂糅、表述不清等。

报刊出版旨在传播信息、传承文化,编校工作的任务则是要在传者的编码与受者的解码之间架起沟通的桥梁,使二者运行在一条轨道上。这就要求我们使用通用范式和语言对文稿进行梳理、修饰,使之“信、达、雅”——表述正确、精准雅致,从而切实为读者阅读扫清障碍,使我们所要传达的信息更为迅捷有效地为其理解和接受。基于自己近30年的期刊编辑出版工作经历,以及1995年以来作为河南省报纸、期刊、图书编校质量检测委员的观察,笔者认为,编校工作中出现语法错误,许多是由作者或编者对语法认识不到位、经验不足和敏感性不够所致。多了解一些常见语法错误,有助于我们正确判断、及时化解文稿中的语法差错,提高出版质

量。鉴于此,本文对历年来河南省报刊编校质量检测中评委们所指出的常见语法错误予以归类,示例评说,以例说法,以期抛砖引玉,提醒编辑同人注意编校中容易出现的错误,进而举一反三,以便更好地驾驭编校工作。文中所进行的分类列举只是为了便于评说,并不能囊括报刊编校中所有的语法问题,且有些问题因分析角度不同或可归入不同类别。由于考察对象所限,尤其是本人水平有限,难免有不当之处,敬请读者批评、专家指教。

一、成分残缺

句子是由词或词组遵循一定语法规则构成、表达一个完整意思的独立语法单位。按照词和词组在句子中的作用及相互关系,句子可分成不同组成部分,通称句子成分。一般情况下,一个句子具备主语和谓语就能把意思说清楚,但有时还要带宾语,在主语、谓语、宾语这些基本成分的前后有时视情况还需要附加一些成分——定语、状语或补语。^[1-2]造句时,如果不符合省略的条件而缺少应有的成分,就会出现结构不完整、意思表达不清楚的成分残缺类病句。

1. 主语残缺

主语是句子的言说者,是谓语的主体,旨在回答行为主体是“谁”或“什么”等问题。主语多由名词、代词来担任,除副词外,其他实词和各种词组也可以作主语;数量词在表示数量判断的句子里,或是用来指称前面已经出现的事物时,也可以作主语;动词、形容词作主语,则要求谓语是形容词,或者“是”“进行”“停止”“开始”“加强”“给予”“标志”“象征”“表示”之类的动词。主语之前不能加介词,后面不能加“的”字。编校中常见的主语残缺多表现为叙述中遗漏、其他成分淹没、不当省略等。

[**错例**]对新旧微信作功能上的对比后显

示,5.0用户对微信的变化还是乐于接受的。

[评说]这是“状语+谓语”类主语残缺。其动词谓语“显示”前面的“对新旧微信作功能上的对比后”是状语,缺主语。可改为“对新旧微信作功能上的对比,结果显示,5.0用户对微信的变化还是乐于接受的”。

类似的,“伴随人均劳动报酬和平均工资报酬的提高,将带来边际产值和平均产值的提高”。这是“状语+动宾结构”的主语残缺。可将“伴随”删去使其后面的成分作主语,改为“人均劳动报酬和平均工资报酬的提高,将带来边际产值和平均产值的提高”;或将“带来”删去并改后面的偏正词组,变成“伴随人均劳动报酬和平均工资报酬的提高,边际产值和平均产值也将相应提高”。

再如,“为了跟踪产品来源、质量、售后等环节出现的问题,会涉及标签所有权转移事宜”,也是“状语+动宾结构”的主语残缺。可将“为了”删去使其后面的成分作主语。

[错例]对于正常经营的子公司和处在建设期间无收入的子公司,都要考虑如何把握好集权和分权的程度。

[评说]这是滥用介词而淹没主语的病句。该句本来有主语(根据文意,不是母公司之于子公司的集权与分权,而是母公司要求子公司把握好集权与分权),由于多用了介词“对于”,把主语变成了状语(也将谓语的主体引入歧途),使得整个句子缺少主语。修改这类病句,将多用的介词“对于”删除即可。

类似的,“参观后,对我们的认识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这是“状语+介词结构+谓语”的主语残缺。可改为“参观后,我们的认识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

[错例]由于他们带领大家同心协力……使中小桥及涵洞的施工走在路面铺筑的前头。

[评说]这是“介词开头句+动词开头句”

的主语残缺。“由于”与“使”同时出现在一个单句中,造成主语被淹没在介语短语中。可只保留其中之一,改为“他们带领大家同心协力……使中小桥及涵洞的施工走在了路面铺筑的前头”,或“由于他们带领大家同心协力……中小桥及涵洞的施工走在了路面铺筑的前头”。

类似的主语残缺,还有“经过……才使……”“通过……使……”“在……下,使……”“从……中,使……”“因为……,使……”等句式。这类病句的纠正方法有二:一是将介词及介词连带的方位词删去,使其中心语作主语;二是保留介词短语作状语,后边加上适当的词作主语。

[错例]土地局党员干部……累计捐款12万多元、各类书籍1000余册;举办健康有益的活动,活跃职工文化生活。

[评说]这是在由部分转整体的叙述中主语被不当承前省略所造成的病句。其分号前主语是“土地局党员干部”,分号后主语是“土地局”,此处主语不能承前省略。可改为“土地局党员干部……累计捐款12万多元、各类书籍1000余册;该局还经常举办健康有益的活动,活跃职工文化生活”。

[错例]就在梁山的眼圈比熊猫眼圈还黑的那一天,老妈回来了,而且身后还跟着梁山的女朋友安然。看着风尘仆仆出现在门口的两个女人,呆呆发愣说不出话来。

[评说]这是前句居于状位的主体是后句的主语被不当省略所造成的主语残缺。其句号前的主语是“老妈”,而句号后的主语是前句状语中的主体“梁山”,主语应当变换,不能省略。可改为“就在梁山的眼圈比熊猫眼圈还黑的那一天,老妈回来了,而且身后还跟着梁山的女朋友安然。看着风尘仆仆出现在门口的两个女人,梁山呆呆发愣说不出话来”。

[错例]风儿掠过麦田时,恰似黄河的滚滚

波涛上下起伏。

[评说]这是前句居于宾位的主体是后句的主语被不当省略所造成的主语残缺。其后半句的主语“麦田”在前半句是宾语,不能承前省略。可改为“风儿掠过时,麦田恰似黄河的滚滚波涛上下起伏”。

[错例]有种种的限制,导致草根创业十分艰难。

[评说]这是“动词开头句+动词开头句”的主语残缺。可将前半句的动宾结构改成主语部分,变为“种种限制导致草根创业十分艰难”;也可将前半部分改为条件状语、让后半部分出现主语,变为“因为有种种的限制,草根创业十分艰难”。

但是,不能简单类推,比如“入世后,面对强大的竞争对手,通过强强联合的方式来实现文化产业的集团化,无疑是一个重要举措”,是个无主句。“通过强强联合的方式来实现文化产业的集团化”表意重点在于强调用什么方式实现目标,而不在于说“谁”来做,该句的句子结构是完整的,不是病句。

[主语残缺句与无主句、主语省略句辨析]

主语残缺句、无主句、主语省略句这三种句子,从形式上看都没有主语,但是无主句、主语省略句都是汉语中正常的句型,而主语残缺句是病句。所谓“无主句”,实际上是指非主谓句中由动词短语或兼语短语加上语调构成的句子,它根本没有主语,并且一般不能加上主语。其作用在于描述动作、变化等情况,而不在于叙述“谁”或“什么”进行这一动作或发生这个变化,多为说明自然形象的句子,泛论事理的句子,表存在、出现或消失的句子。例如:

下雨了。

小心烟火!

所谓“省略句”,是指人们在说话或写文章时,为了表述简洁,常常省去一些不说自明的成

分,有省略主语的,也有省略谓语、宾语等成分的。省略常出现在对话、自述,以及可以承上或借下的文中,离开所在语境,必须添补一定的词语其表意才清楚。例如:

问:他上哪儿了?

答:上公园了。

无主句根本没有主语,没有主谓关系的存在,所表达的意思完整明确,人们不会误解;正常的主语省略句,常出现在对话、自述或上下文中,意思也是完整明确的;而主语残缺则会导致表意不明、句子不通,如上述错例。

2. 谓语成分残缺

谓语是用来表述主语的,以回答“干什么”“怎么样”“是不是”“有没有”等问题,与主语发生主谓关系。作谓语的主要是动词、形容词或表动作、性状的代词,以及以这些词为中心的词组;名词和以名词为中心的词组不能作谓语。编校中常见的谓语成分残缺,多为主宾之间无关联、用介词短语代谓语、主语后加“的”变句子为短语而成半语等。^[1]

[错例]安阳县辛丫乡首届中小学田径运动会,全乡12所小学、3所中学。

[评说]这是“名词性短语+名词性短语”类谓语残缺。两个名词性短语缺少动词谓语关联,不能形成语义连贯的句子。可补充谓语成分,改为“安阳县辛丫乡首届中小学田径运动会,全乡12所小学、3所中学参加”,或“参与安阳县辛丫乡首届中小学田径运动会的,有全乡12所小学、3所中学”。

类似的,“在培育的过程中,计划制定是一个很关键的因素,组织管理部门必须有一个长远的合理发展规划。计划怎么制定、规定怎么遵守、标准怎么统一、规范怎么执行、法规怎么约束等”。其中间的句号之后是一个联合词组,不能独立成句,可补加谓语使之与前句关联,改为“在培育的过程中,计划制定是一个很

关键的因素,组织管理部门必须有一个长远的合理发展规划,包括计划怎么制定、规定怎么遵守、标准怎么统一、规范怎么执行、法规怎么约束等”;或在最后加谓语等成分使之独立成句,改为“在培育的过程中,计划制定是一个很关键的因素,组织管理部门必须有一个长远的合理发展规划。计划怎么制定、规定怎么遵守、标准怎么统一、规范怎么执行、法规怎么约束等问题均应认真考虑”。

[错例]县乡换届选举也正在紧锣密鼓。

[评说]这是以状语表状态、误以介词短语作谓语的谓语残缺句类型。介词短语是有介词等附着在名词等词语前面组成的语言单位,可用来修饰、限制或补充说明动词、形容词,即作状语或补语;少数介词短语可以作定语,但不能作谓语。修改此类以介词短语作谓语的病句,可直接在介词短语后补加谓语动词。该句可改为“县乡换届选举也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或变换介词,化状语为表语,改为“县乡换届选举同样是紧锣密鼓”。

[错例]正是这种精神,中华民族才得以生存和发展。

[评说]这是“名词性短语+复句正句”、前后句子不整类谓语残缺。其后半部分“中华民族才得以生存和发展”成分完整,但前半部分因“正是”为插入语、“这种精神”是名词性短语,不能独立成句。可将前后统筹考虑,同时补加关联谓语动词,改为“正是这种精神,支撑着中华民族生存和发展”;或将单句改为复句,完善前半部分,改为“正是有这种精神,中华民族才得以生存和发展”。

类似的,“由于保护技术,两三天,彩绘就全部脱落”。其前半部分“由于保护技术”缺谓语动词,不单不能独立成句,而且完全走向反意——将“彩绘脱落”嫁祸于“保护技术”。可改为“由于缺乏保护技术,两三天,彩绘就全部

脱落”,或“由于保护技术跟不上,两三天,彩绘就全部脱落”。

[错例]日寇飞机的滥炸和内战炮火的轰击,七朝古都满目疮痍。

[评说]这是“‘的’字结构+单句”、前述对象缺谓语而后续内容另起炉灶又有新主语的病句。其前半部分可作为谓语的动词,因前面加了“的”字而成为偏正词组的中心语,造成本来有承继关系的前后句因语言结构不搭配而形成谓语残缺的病句。修改此类病句,可在前后句之间添加“使”“叫”“让”等使令性词语,使之成为主谓宾完整的单句——“日寇飞机的滥炸和内战炮火的轰击,使七朝古都满目疮痍”;也可将前半部分“的”字结构改为短句,使之成为多重重复句——“日寇飞机滥炸,内战炮火轰击,七朝古都满目疮痍”。

类似的,“机器制品的流行,更多的人喜用洋布制衣”。可改为“机器制品的流行,使更多的人喜用洋布制衣”,或“机器制品流行,更多的人喜用洋布制衣”。

但是,并非所有的句子都必须有谓语,也有对话省、承上省、习惯省的谓语省略,以及在一定语境中具有表述性的无谓句,如:

半月春风,草绿了。(谢璞《二月兰》)

这么黑的天,又这么大的雨,到哪儿抓去呀?(克扬、戈基《连心锁》)

3. 宾语成分残缺

宾语是动词谓语的连带成分,表谓语所涉及的对象、结果、处所等,回答“谁”“什么”“何处”之类的问题,谓语动词与宾语之间是支配与被支配关系。诸如“解决”“发展”“开展”“采用”“扩大”“提高”“抓紧”“进行”等及物动词必须带宾语。宾语多由名词、代词担任,除副词外,其他实词和各种词组也能作宾语;数量词在说明数量本身的句子里,或是用来指称前面已经出现的事物时也可作宾语;如果谓语表示

心理活动,或是使令意义的动词及表学习、过程、处理的动词,那么动词、形容词在指称一种行为、性状或者表示一种抽象事物时也可作宾语。在对话和承上的条件下,宾语跟主语、谓语一样也可以省略;如果不符合省略条件而无宾语,动作就没有了对象,行为就没有了结果,意思也就表达不清楚了。编校中常见的宾语残缺句,多为省略不当、宾语部分不完整等类型。

[错例]要通过广泛宣传,提高……遵守《会计法》。

[评说]这是宾语部分只有定语而无中心语、叙述不完整的宾语残缺句类型,说话人说了个动词后紧接着说宾语部分,由于宾语的定语太长而忘了说中心语,或者直接把定语当成中心语,从而造成宾语残缺。修改此类病句,在定语后补加中心语即可。该句可改为“要通过广泛宣传,提高……遵守《会计法》的自觉性”。

类似的,“……整理撰写提交了《发挥林业特殊功能,绿化美化河南城镇》的社情民意”。可改为“……整理撰写提交了《发挥林业特殊功能,绿化美化河南城镇》的社情民意报告”。

再如,“该乡被省科协授予‘科普示范乡’”。可在其定语后补加中心语,改为“该乡被省科协授予‘科普示范乡’称号”;或变换动词,改为“该乡被省科协评为‘科普示范乡’”。

[错例]……发挥表率,自觉地把理论学习作为政治责任。

[评说]这是对词性误解而造成宾语部分不完整的宾语残缺。“发挥”是及物动词,必须带宾语,尽管“表率”有时可以直接作宾语,比如“作出表率”,但跟在“发挥”之后,只能当修饰语,所以要在后面补加宾语。可改为“……发挥表率作用,自觉地把理论学习作为政治责任”。

类似的,“……发挥优势资源”。可补加其宾语部分的中心语,改为“……发挥优势资源

的作用”;也可调整语序,改为“……发挥资源优势”。

4. 附加成分不完整

句子的附加成分包括定语、状语、补语。定语是限定、修饰名词性中心语的,可以回答“谁的”“多少”“什么样的”等问题,跟中心语发生偏正关系;定语多由名词、代词、形容词、动词、数量词来充当,少数副词、各种词组甚至复句形式也可以作定语。状语是摹状、修饰动词或形容词性中心语的,可以回答“怎么样”“何时”“何地”“为什么”等问题,跟中心语发生偏正关系;状语多由副词、形容词、代词来充当,介词介绍的名词和各种词组也可以作状语。补语是补充、说明动词或形容词性中心语的,可以回答“怎么样”“多少次”“何时”“何处”“什么结果”等问题,跟中心语发生附加与被附加的偏正关系,多由形容词、数量词、时地名词、趋向动词来充当,“极”“透”“很”等单音节副词和各种词组也可以作补语。许多句子仅有主语、谓语、宾语这些基本成分还不能尽意,必须带上附加成分才能将意思说清楚。附加成分不完整是指定语、状语或补语残缺,致使句子结构不完整,不能周密、明确地表达思想。

[错例]表演一结束,家长们就过去拥抱庆贺。

[评说]这是表对象的状语残缺的病句。“拥抱谁”没说,表意不完整。可改为“表演一结束,家长们就过去同孩子们拥抱庆贺”。

5. 词组/短语构成残缺造成相关成分不完整

所谓词组,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意义相关的实词按照一定规则组合,成为句子内部构成的语法单位。词组是造句的材料,有一定的结构方式。联合词组是两个没有主从正副之分的词平等地联合在一起;偏正词组由两个以上的词构成,其中一个或一组为中心、另一个或一组

附加在前面限定修饰它,或者在后面补充说明它;动宾词组由两个以上的词构成,其中一个或一组表动作、存现或判断,另一个或一组是它涉及的对象;主谓(主宾)词组是由两个以上的词构成,其中一个或一组表对象,另一个或一组表述者;复句词组是两个以上主谓词组连在一起用。短语是指由词或超词形式借助一定语法手段构成的、比词大又不成句的语法单位^[3]。鉴于对“词组”与“短语”两术语学界认为等价、不等价的都有,莫衷一是,所以这里一并使用。词组/短语构成残缺,主要是指句子所用词组/短语由于结构不完整而造成相关内容表述不清的问题。

[错例]我盼望下次上英语课早日到来。

[评说]这是以属性代主体、词组而导致中心语缺失、相关成分不完整的病句。“盼望到来”的应是“时间”,“下次上英语课”只是中心语“时间”的属性,不能取而代之。可补充完善该偏正词组,改为“我盼望下次上英语课的时间早日到来”。

类似的,“他们利用延河流域上马的机会……”。其谓词“上马”的主体不是“延河流域”,而是其治理工程。可补充完善该主谓词组,改为“他们利用延河流域治理工程上马的机会……”。

再如,“朱载堉精深和贡献无与伦比”。这是由“精深”所说明的主体缺失而造成的联合词组“精深和贡献”成分残缺。可根据文章内容予以完善,改为“朱载堉学识的精深和所作的贡献无与伦比”。

[错例]只有敢于把人民群众议论纷纷的

各个领域的突出问题提出来,才能让党委、政府及时地“以群众的呼声”作出落实改革的应对决策。

[评说]这是由介词短语不完整而造成的宾语残缺。通常情况下,介词必须有自己的宾语(它可以是名词、名词短语或代词,甚至宾语从句),否则语义不完整。该句介词短语“以群众的呼声”缺介词宾语。可改为“只有敢于把人民群众议论纷纷的各个领域的突出问题提出来,才能让党委、政府及时地‘以群众的呼声为依据’作出落实改革的应对决策”。

类似的,“焦作市从场地……赛程安排、电视转播,都进行了精心准备”。这是介词短语“从……到……”不完整。可改为“焦作市从场地……赛程安排到电视转播,都进行了精心准备”。

再如,“她首次出场便和婆婆进行了激烈的争吵,结果被丈夫毒打一顿而告终”。这是介词短语“以……而告终”因缺少介词而不完整。可改为“她首次出场便和婆婆进行了激烈的争吵,结果以被丈夫毒打一顿而告终”。

(未完待续)

参考文献:

- [1] 张静. 新编现代汉语[M]. 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80.
- [2] 吕叔湘,朱德熙. 语法修辞讲话[M].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
- [3] 程书秋. 说说“词组”和“短语”[J]. 玉林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6):63.



引用格式:张西昌. 民间艺人的身份归属与知识权益——以库淑兰现象为分析样本[J]. 郑州轻工业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17(3):90-95.

中图分类号:G122;J528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9/j.issn.1009-3729.2016.03.015

文章编号:1009-3729(2016)03-0090-06

民间艺人的身份归属与知识权益

——以库淑兰现象为分析样本

The identity ownership and intellectual rights of the folk artists

—Taken Ku Shu-lan phenomenon for example

张西昌

ZHANG Xi-chang

西安美术学院 美术史论系, 陕西 西安 710065

摘要:民间艺术的传承及承载主体——民间艺人——是知识产权保护的核心。但在现有司法程序中,往往因为无法确定具体的权利人而导致权益归属模糊。同时,民间艺人在中国传统文化语境中的身份地位低及话语权缺失的现实,也极大地影响了公民对于民间艺术知识产权的认知程度。虽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制度的出台预示着政府对民间艺人文化贡献的官方认可,但对于民间艺人群体而言,能获得经济补助的仅仅只是极少数。在发现民间艺人的现有采风制度中,存在着发现者(采风者)与民间艺人之间关系失衡问题。从知识产权法角度来看,发现者对作品的占有只是对其物态形式的拥有,并不享有其著作权,但这些作品往往成为发现者随意处理的私物,从而构成事实上的侵权。传统手工艺衍生品市场需要逐步培育,应该在商业和知识产权保护规范的基础上,对传统手工艺资源进行宣传和保护。建立相应的传统手工艺衍生品付费制度,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给予贫弱的民间手工艺人以帮扶。

关键词:

民间艺人;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
库淑兰现象;
剪纸;
采风制度;
知识产权;
手工艺衍生品

收稿日期:2016-02-17

基金项目:西安美术学院院级课题的阶研究成果(2015XK037)

作者简介:张西昌(1976—),男,陕西省扶风县人,西安美术学院讲师,中国艺术研究院博士后,主要研究方向:工艺美术及非物质文化遗产理论。

自1960年代起,国际社会开始关注原住民传统文化资源的保护问题,民间艺术作为其重要的组成部分而被涉及,并借此提出了相关的知识产权议题,逐渐引起了各国政府、公益机构、民间组织及学术界的关注。虽然中国在知识产权的保护和研究上相对滞后,但就遗传资源、传统知识和民间文学艺术等传统资源而言,基本与国际同步,并于1990年代开展了相关研究。

从非遗保护工作的性质来看,民间艺术的传承及承载主体——民间艺人——理应是知识产权保护的核心。但在现有司法实践中,往往会因为无法确定具体的权利人而导致权益归属模糊。同时,民间艺人在中国传统文化语境中的身份地位低及话语权缺失的现实,也极大地影响了公民对于民间艺术知识产权的认知程度。而且,目前的理论研究也未能就该话题进行系统、深入的研究,更多集中于对作品与知识产权保护之关系的探讨上。

作为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评定的“杰出中国民间艺术大师”,库淑兰在由封闭的乡土空间逐渐走向公众视野的过程中,其剪纸作品及人生故事被一再演绎和关注。笔者认为,除了库淑兰剪纸作品的本身价值之外,由其人生遭际和作品传播所交织生成的“库淑兰现象”,更能从不同角度印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复杂性,期望引起当下社会的反思。

自1990年代以来,学术界对库淑兰的研究多集中在对其作品的美术分析方面,尚未见有从知识权益角度所做的探讨。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及其理论研究的角度来看,民间艺人不仅是其知识资源的活态载体,同时也是文化生态的核心体现。如今,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知识资源已越来越脱离原本的乡土空间,而进入到他文化的消费语境之中。鉴于此,本文拟以库淑兰及其剪纸作品为个案,基于民间艺术文化

生态的新视角,从知识权益层面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主体——民间艺人——的身份归属与权益进行探讨,以供学界参考。

一、身份界定: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机制属性

传承人制度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核心,这是由非物质文化遗产与民间艺人的关系所决定的。尽管目前传承人所享受的津贴补助与体制内的美术工作者仍有本质上的不同,但在此之前,民间艺人一直游离于政府利益机制之外。

在我国,民间艺人的主体是农民和城镇手艺人。当代著名美术教育家靳之林将以农耕为主业、手工技艺为副业的人员称为“能手”,而非艺人^[1]。意思是说,依靠土地而非完全以出卖手艺为生的人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民间艺人”,他们的技艺和作品大多是为自身或所属特定群落的生活自需而存在的。所以,在一定的社会体制中,此类艺术群体与体制内的主流美术家具有本质上的区别。

农民生活的相对封闭性及其生产的目的性,使其与主流文化和政治形态具有一定的距离。而且,将人民大众分为农户和非农户的二分法,使得民间艺术的创作群体一直游离于文化艺术的边缘地带。那么,那些生活在乡村空间之中的艺术能手,其所创作的作品是否具有社会价值?其界定标准又是什么?都值得我们重新思索。

在传统的乡民生活中,剪纸创作大多是针对自己的民俗生活所需,在特定的相对集中的时间内所进行的艺术劳动。但是,库淑兰经过当时文化馆干部的引导,其剪纸作品突破了传统的剪纸艺术形式和功能。换句话说,库淑兰的剪纸作品不仅用于狭小的乡民生活空间,还把自己的人生感受和生活故事转化为艺术图

像,供自己乡俗文化圈之外的文化消费所用(见图1)。那么,她与体制内的美术家的区别在哪里呢?仅仅只是社会身份的区别吗?

在有生之年,库淑兰因为痴迷于剪纸,有时会忘记做饭,被丈夫殴打并砸锅予以惩罚,县文化馆的干部曾出资为其购买锅灶,这件事被库淑兰编成歌谣唱到:“库淑兰做这剪纸,实为她的身和口来么先。”剪纸能换来国家干部为她买锅,内心的自豪感溢于言表,同时也令人内心五味杂陈。作为由联合国认定的民间艺术大师,库淑兰一直生活窘迫,居无定所。其去世前夕,陕西省创建文化先进县工作指导委员会办公室曾经下发过文件,其中规定由旬邑地方政府每月按20元的生活费供给库淑兰,但是这笔钱直到2003年年底才拿到(库淑兰当年年底去世),因此,并未对改善库淑兰的生活起到帮助作用。

库淑兰去世的2003年,中国成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出台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公约》的签约国,并确立了对传承人进行生活补助的规定,以改善传承人的生活状况。我们认为,在这种物质体恤中也包含着对于传承人文化角色

和精神价值的确认。但在此之前,各地政府所颁布的《民间艺术保护条例》《工艺美术保护条例》均未体现出对民间艺人价值的认可与保护。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曾召集专家议定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几项参考标准:第一,传承人所传承的文化应是具有特殊文化价值的民间文化表现形式;第二,所传承文化的濒危程度和稀有程度;第三,传承人代表性作品的数目、地方特色、个人特点和风格,以及创造和创新;第四,目前传承的状况,包括传承代数、传承方式、徒弟数量、仪式、文字、曲谱、舞谱等的情况;第五,传承技艺的艺术价值;第六,技艺技巧难度和复杂程度;第七,传承人及技艺宣传和推广的程度,包括社会影响、行业知名度、市场化程度、展出、展演情况、规模,以及受到奖励、被调查和记录的情况、对本民族或社区的文化和社会影响等。这些标准在理论上虽使认定制度有所细化,但目前我国传承人评定所存在的现实问题仍然很多。而且,传承人的名额极其有限,这种单一的制度体系无疑具有很大的局限性。

起初,传承人的津贴由当地的文化部门发



图1 库淑兰剪纸作品

放,但很多民间艺人并不能够按时如数拿到该项补助,之后改由中央财政直接拨发给民间艺人,这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传承人制度的有效实施。传承人制度并非一种纯粹的经济抚恤行为,有相当一部分传承人并不依赖该项津贴,而是看重该荣誉称号及其带来的隐性经济效益。对于作品难以市场化、生活窘困的传承人而言,这些津贴则显得弥足珍贵,这是目前传承人津贴制度中很难解决的现实矛盾。

传承人制度的出台预示着政府对民间艺人文化贡献的官方确认,但相对于民间艺人这一庞大的群体而言,能获得传承人补助的仅仅是极少数。对此,民间艺术工作者管祥麟曾向国家文化部门提出过设立“中国民间艺术家保护基金”的建议;2010年歌唱家谭晶也曾以人大代表的身份提出了《规范发展本土文化,研究制定扶持本土文化发展的国家战略与政策》的建议,其中即有为老艺术家设立专项基金的内容。这些提议可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制度的有效补充,只是到目前为止,还未得到社会及政府层面的有效回应。

二、发现与汇编:采风制度中发现者与民间艺人之间的关系失衡

2003年4月,由左汉中主编、文为群编著的《剪花娘子库淑兰传奇》一书由湖南美术出版社出版发行,书内附有196张库淑兰不同时期的剪纸作品。是年底,库淑兰因病住院,在医药费无着落的情况下,家属想到了编著者曾经答应支付的由录用作品图片所产生的稿费。据悉,此书的编著者文为群曾获得1万多元的稿费,作为主编的左汉中收益不详。因此在库淑兰重病期间,她的儿子曾分别致电文为群和左汉中,希望能够支付稿费,以救济病中的母亲,但无任何结果。2009年,台湾汉声杂志社以作者身份,授权上海锦绣文章出版社出版发行了

库淑兰的精装书册《剪花娘子——库淑兰》,当时,库淑兰已经离世5年。经笔者调查了解,大量出版的与库淑兰作品相关的书籍,库淑兰本人及其家属没有从中获得知情权及经济报偿。

关于美术作品的汇编权属及酬劳问题,在《著作权法》未出台之前,文化部曾于1985年颁布了《图书、期刊版权保护试行条例实施细则》,其中涉及到对民间文学艺术整理者和素材提供者权利进行保护的相关规定:“民间文学艺术和其他民间传统作品的整理本,版权归整理者所有,但他人仍可对同一作品进行整理并获得版权。民间文学艺术和其他民间传统作品发表时,整理者应当注明主要素材提供者,并依素材提供者的贡献大小向其支付适当报酬。”同时,在该条例第10条中对此作了具体说明:“民间文学艺术和其他民间传统作品发表时,整理者应在前言或后记中说明主要素材(包括口头材料和书面材料)提供者,并向其支付报酬,支付总额为整理者所得报酬的30%~40%”。

笔者认为,就传统手工工艺品的搜集整理而言,对于整理者的专业技术势必会有所要求,但专业水平并不占据绝对要素。比如,民间美术的研究人员在乡间搜集整理剪纸手工艺品,并将其整理成册予以出版发表,其所获得的应当只是这部著作的版权,而非所搜集整理的剪纸艺术品的著作权,因为在著作的编写汇编过程中,作者虽付出了自己的智慧和创造力,但就具体的剪纸作品而言,其仍旧是原创作者的智力创造。从理论的角度而言,出于对资料和素材提供者的感谢和尊重,应当在作品出版和发表时征求原创者的意见,并按相关标准支付给原创者一定的报酬(实际上,民间艺术生态的多元性往往使得现实情况极为复杂)。

作为采风的被发现者,库淑兰曾被人质问道:如果没有上世纪的民间美术研究热潮,“如果没有文为群这样的基层美术干部,如果没有

像汉声等出版社的关注,还会不会产生今天的库淑兰?”很明显,这种思维充斥着优势地位的强权思想,同时也折射出采风制度中发现者与民间艺人之间关系的失衡。1980年代,民间艺术得到主流美术的某种认同,采风以及帮扶活动在官方的各种文化机构中展开,很多杰出的民间艺人及作品被“发现”。这些艺人中的极少数也因此获得荣誉,但获得荣誉更多的是具有官方身份的“发现者”。在知识产权制度中,“发现者”享有权益保护,但其“发现物”则是指没有生命或无感情的人类之外的自然物。很多艺术能手却在这种潜规则的发现制度中被忽略了。虽然作为个体的人,发现者和被发现者在人格上未必不平等,但在采风制度的历史习惯中,这种不平等到目前为止依然存在。发现者可以廉价甚至无偿掠走民间艺术品,原作者亦或出于朴素的情感赠送其作品,或出于对政府的感激心理捐献其作品,或出于卑微的心理将其作品上缴给政府,或者只是接受了象征性的费用以做买卖。从知识产权法的角度而言,发现者(采风者)对作品的占有,只是对其物态形式的拥有,但并不享有其著作权。但实际上,这些作品往往成为发现者随意处理的私物。诚然,对于收集和汇编工作来讲,这些发现者必须具有一定的专业知识和辨别能力,而且有对民间文化保护的热情和责任感,也为此付出了巨大的心力。因此,汇编权是要被予以尊重和保护的。客观来讲,多数发现者从汇编权中获得了经济回报和社会认可,但是大量被发现者的精神权利和经济权益往往被忽略。

库淑兰从乡土语境走上了艺术“圣坛”,从这个角度上说,她似乎是幸运的,很多人甚至认为,如果没有发现者,像库淑兰一样的民间艺人可能会就此埋没。人与其他无生命的发现物不同,如没有相应的环境机遇,其创造性可能也会大打折扣,其作品可能就只会在极小的范围里

流传,得不到更多人的认可和赏读,对于艺术的发展会造成极大的损失。有的发现者夸大自己的“发现”也是基于这样的心理^[2]。发现库淑兰的旬邑县文化馆干部文为群(后升任馆长),曾经利用库淑兰的作品赚了不少钱。自1986年以来,旬邑县文化馆也曾以征收或低价购买的方式从库淑兰处获得作品,并以高价出售和倒卖这些作品,并没有付给老人相应的费用。另外,台湾汉声杂志社在授权上海锦绣出版社发行《剪花娘子——库淑兰》的简体本之前,也并未征得文为群的同意。当然,按照常理来讲,对于著作再版,作者一般不会有反对意见,问题是文为群没有拿到再版的报酬,也没有进行维权。

三、弘扬与获利:民间工艺衍生品市场有待规范

近年来,随着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出现热潮,市场上也出现了以民间艺术资源为卖点的传统手工艺衍生品。比如,台湾汉声杂志社在北京下设的北京汉声巷文化创意发展有限公司,推出了一系列以传统手工艺品为元素的衍生品:有蓝印花布、风筝、年画、剪纸等;有以库淑兰剪纸为封面装饰纹样的多种笔记本,库淑兰的剪纸及歌谣都被作为工艺品的设计元素;有“库淑兰单杯茶礼盒”,其中包括口杯、杯垫、茶叶袋、外包装礼品盒等。在北京汉声巷文化创意发展有限公司推出的诸多衍生产品中,一部分属于集体创作(作者不明)的民间工艺品,而库淑兰剪纸则是有明确作者归属权的民间工艺品。虽然在艺术衍生品中大量使用库淑兰的剪纸作品图像,某种程度上起到了宣传民间艺术的作用,但宣传与商业利用是并存的,虽然开发商需要一定的前期投资或承担相应的商业风险,但出自于商业目的的预设性更大。同时,笔者调查发现,许多以库淑兰作品图像生产的衍生品,商家均声称已经合法购买了版权。但笔

者从调研得知,库淑兰家人根本不知情,也不知晓此类侵权事件的发生,而且他们通常也不具备维权的法律意识、意愿和经济能力。

在目前艺术衍生品市场化的过程中,当代艺术家大多采取无偿授权的方式,意在培育国内的艺术品衍生市场,这种做法与其说来自于艺术家的文化责任,倒不如说源自于艺术商人的商业利益。但是具有较高知名度的当代艺术家与民间艺人的生活状况具有天壤之别,库淑兰虽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授予“民间艺术大师”称号,但其生活一直处于基本温饱的状态,她的作品却成了他人获取名利和累积财富的素材。对此,管祥麟曾经撰文道:“多少年来,我们对众多有成就的民间艺术大师的生存背景和创作环境知之甚少。可以说,我们长期忽视了这一重要的社会底层人文元素,从某种程度上我们依然存在严重的认识偏差。民间艺人得不到应有的重视和必要的保护的现象,已成为这一领域的盲区。所谓上层主流文化中‘拿来主义’的主观倾向或者称为‘历史惯性模式’,对待民间文化至今仍持‘摘野花’的态度。因为它是野花,可以居高临下地随意采撷,无需代价,也无需负责任(据不完全统计,在已经出版的大量民间文化出版物的图文介绍中,有半数以上没有标明艺术品作者姓名、年龄及艺术品详细出处,更谈不上支付稿酬了)。这反映出主流文化对待民间文化作者的不公正态度。”^[3]

面对上述事实,我们自然会产生这样的诘问:是不是可以有一种具有较强可操作性的制度,为像库淑兰一样的民间艺人和艺术生态提供生活和创作的资金?如果一种机制只是维护强者更强、富者更富,而对于导致贫富悬殊的法理却置之不理,那么这种机制在客观上就保护了“掠夺”。当然,传统手工艺衍生品市场需要逐步培育,应该在商业和知识产权保护规范的

基础上对传统手工艺资源进行宣传和保护。建立相应的传统手工艺衍生品付费制度,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对贫弱的民间手艺人进行帮扶,他们对社会文化做出了很大贡献,而其自身的利益诉求并没有得到关照,更遑论满足,这于法、于理、于情都是说不过去的。

四、结语

我国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已经近十年了,通过立法对民间文化艺术进行保护的呼声也愈来愈高。法律是什么,用列宁的话说,它就是“写满了人民权利的一张纸”。法制的本质是民主,是从最根本的人权角度维护公民首先是劳动者的权益;同时,法律的公正最终应该体现在维护人际之间的平等上,而不应被强权者所利用。笔者认为,在民间艺人还没有取得应有的社会身份归属之前,法律的天平就很难保持平衡。

库淑兰的人生遭遇不排除个人际遇的因素,但社会不能推卸自己的责任。通过立法保护民间文化艺术,归根到底是对于人权的捍卫。民间艺人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活态载体,与传承人一样,是中华文化之瑰宝,应该通过具有可操作性的法律制度对其权益进行维护。

参考文献:

- [1] 靳之林. 中国民间美术[M]. 北京:五洲传播出版社,2010:105-106.
- [2] 文为群. 魂系剪花娘子[EB/OL]. (2012-12-18)[2016-01-10]. http://blog.163.com/hanjing_734/blog/static/180360220126217444596/.
- [3] 管祥麟. 追忆大师库淑兰[EB/OL]. (2012-10-18)[2015-12-11]. <http://guanxianglin.blog.sohu.com>.



引用格式:宗迅,朱丽博. 郑州郭家大院的空間构成及其使用变迁[J]. 郑州轻工业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17(3):96-102.

中图分类号:TU241.5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9/j.issn.1009-3729.2016.03.016

文章编号:1009-3729(2016)03-0096-07

郑州郭家大院的空間构成及其使用变迁

Spatial composition and its use change of Guo's courtyard in Zhengzhou

宗迅, 朱丽博

ZONG Xun, ZHU Li-bo

郑州轻工业学院 艺术设计学院, 河南 郑州 450002

摘要:被称为郑州市区“最后的四合院”的郭家大院,是该地区保存相对完整的传统民居,虽规模不大但五脏俱全,是历史街区重要的组成部分,其不仅包含着居民自身家庭的记忆,同时也承载着有相同历史境遇和生活经验的人们的集体记忆。从空间形态看,郭家大院由上房、临街房、东西厢房围合而成,是由厢房北端设置的二门和隔墙分割为两个独立空间的二进式合院民居。新中国成立以前,郭家大院基本保持、延续了传统民居累世同居共财的传统民居使用模式。随着社会环境及家庭结构的变化,郭家大院曾经秩序井然的传统四合院内部不断地被加建、改建,院落及房屋的使用方式日趋复杂化,最终发展成了现在的大杂院格局。

关键词:

郑州郭家大院;
空间构成;
传统民居;
大杂院

收稿日期:2016-04-02

基金项目:河南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重点项目(2013-ZD-098);郑州轻工业学院博士科研启动基金项目(2013BSJJ070)

作者简介:宗迅(1977—),男,河南省洛阳市人,郑州轻工业学院讲师,博士,主要研究方向:建筑与城市科学、环境设计与建筑环境心理。

每座城市都拥有自己独特的城市风貌和历史记忆,其形成、发展、壮大都是从小规模的族群聚居开始,历经世代建设、经营、筛选,在一次又一次思想文化的冲击下日益形成的集体意识和实体形态。然而,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飞速发展,在城市化进程中,大多倾向于扫除那些“充满麻烦”的城市结构,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崭新的“理性”秩序。因而,除了少数优秀历史建筑得以保留外,大量富有地域特色、文化传统、历史信息及城市记忆的古老街区、历史建筑、传统民居遭到破坏,造成历史文脉被割裂、文化空间被破坏,所带来的是千城一面、城市记忆丧失和城市文化认同的危机。

郑州市作为河南省省会、中原经济区核心城市和中原地区经济文化中心,历史悠久,是我国最古老的城市之一,是中华民族和中华文化的发祥地之一,其历史文化遗存丰厚,拥有中国历史文化名城、中国优秀旅游城市等诸多头衔。近年来,郑州市经济、人口、交通高速发展,城市面貌日新月异,已成为中国中部地区的主要经济中心之一。近些年,随着乡土建筑文化遗产保护意识的加强和保护工作的推进,郑州市已有一批民居建筑入选历史文化名镇名村、传统村落及不可移动文化遗产名录,得到社会各界越来越广泛的关注。人们日渐认识到保护文化遗产、留住城市记忆,不仅能够延续城市历史文化,保护城市特色,还能够加强城市居民的认同感和凝聚力,塑造城市的精神^[1-2]。

然而,在城市的发展和建筑更新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问题。除了遗存丰厚的遗址、遗迹之外,目前郑州市区范围内能完整反映其传统历史风貌的历史街区已不复存在,传统民居遗存也已是凤毛麟角,院落整体保存相对完整的更是屈指可数。位于郑州市管城区的书院街,东临紫荆山路,西临南大街,南临商代城墙遗址,历史上曾因天中书院在此建设而得名,历史

悠久,处于城市中心地带。伴随着城市漫长的发展历程,该街区承载了不同历史时期的文化记忆,是郑州市传统历史风貌保存相对完整的历史街区之一。位于书院街的郭氏住宅,始建于清,为郭姓人创建并世代独姓使用,被人称为“郭家大院”。近来,该院因郑州市地铁二号线建设而即将被拆的消息引起媒体及众多文物保护志愿者等社会各方的关注,被称为郑州市区“最后的四合院”^[3-5]。郭家大院作为该地区保存相对完整的传统民居,虽规模不大但五脏俱全,是历史街区重要的组成部分,其不仅包含着居民自身家族的记忆,同时也承载着有相同历史境遇和生活经验人们的集体记忆,在历史文化名城、历史街区的保护与发展中应得到重视。

此前已有研究者对郑州市历史街区的保护与发展进行研究探索,分析其形成与发展历程、城市发展的过程中历史街区风貌更新所面临的主要问题,对街巷空间的尺度、比例、使用功能、建筑形式的表现等方面也进行分析,并提出保护发展策略及规划意向^[6-8]。本文拟从相对微观层面,以郭家大院为研究对象,分析在社会发展及家庭内外部环境变化过程中传统民居及其使用方式的变迁,以期对文化遗产、城市历史遗存的保护积累研究资料。

一、郭家大院概况

本课题组分别于2013年8月、2013年9月、2016年4月,通过建筑测绘、居民访问等方式对郭家大院进行了三次现场调查。

被称为“郭家大院”的郭氏住宅位于河南省郑州市管城区紫荆山路与书院街交叉口东北侧,“书院幽荷”小游园的西北角,以南是“郑州商城遗址”的南城墙,门牌号为书院街112号(见图1)。据郭家人介绍,清朝时期,由于家中人多房少,郭家这一支系从东大街迁至此地置地建房。当时,郭家还在附近有100多亩地,在

北大街还有一个玻璃厂,生产煤油灯罩和暖水瓶,经营生豆芽,开杂货铺(卖土特产)、糕点门市部等,雇有长工两三人、短工若干(麦收时)。新中国成立前共有老爷(受访者称呼)、4个爷爷及姑奶、父辈5兄弟及其子女30人左右在该院子里居住(见表1)。

二、郭家大院的空间构成及使用方式

1. 传统四合院的平面形态

四合院是合院式民居的统称,是中国北方地区常见的院落空间布局形式,是在地势较平坦地带,按传统的中轴对称、封闭严谨的空间序列布局的,以满足家族中情相亲、功相助的需求,体现家族生活长幼有序、上下有分、内外有别的要求^[9]。四合院一般由复数的房屋按照一定的规律围合而成。常见的有四面围合的四合院、三面围合的三合院、两面围合的二合院等。以四合院为例,正面的房屋称作正房(上房),左右的房屋称作厢房(厦子),与正房相对、临近道路的房屋称作倒座(临街),由此构成一个四面围合的合院单元。如在此基础上沿中轴线向后延伸,在正房的后面增加左右厢房、正房,又可构成一个新的围合单元。以此类推,最终可形成由复数围合单元构成的院落。这些独立围合的单元以“进”计数,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几进”院落。另外,在围合空间的构成方面,也有以“四合院”为基础,在靠近倒座的厢房两山墙之间建隔墙,再在中间开门(如北京四合院的垂花门),

使原本独立的一个围合单元变为两个独立的围合空间,从而形成二进院(见图2)。

2. 郭家大院的平面形态及使用方式

郭家大院目前留存的房屋为传统的抬梁式坡屋顶硬山建筑,有上房、临街房、东西厢房、西院临街房。从平面形态看,上房位于院落的南侧,正门设在院落北侧紧邻书院街的临街房屋(倒座)中间;东西两侧为厢房,厢房北端曾设隔墙将院落分割成了两个独立围合的单元,墙中间开门联系两个单元,隔墙与二门虽已不存在,但依郭家后人指引,所在位置可以确认。可以看出,郭家大院是一座由前后两个独立围合空间构成、座南面北的二进合院住宅。据书院街老居民介绍,新中国成立前郭家大院周边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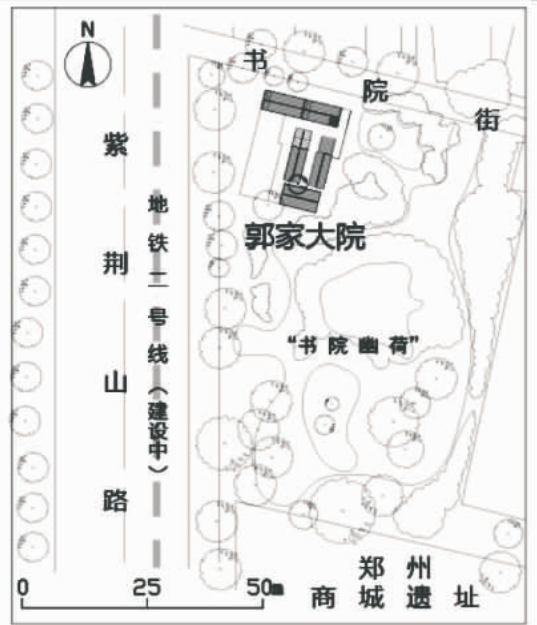


图1 郭家大院在郑州市的位置

表1 郭家大院相关人物

辈分	相关人物(仅体现本文分析过程中涉及的主要人物)				
曾祖父	A(老爷)				
祖父	A-a(长子)	A-b(次子)	A-c(三子)	A-d(四子)	姑奶
	大爷爷	二爷爷	三爷爷	四爷爷	出嫁后搬离
父	A-a-1	A-a-2	A-b-1	A-c-1	A-d-1
	大伯	二伯	父亲	四叔	五叔
子	居于 A-b-1 中间				郭家外甥(表哥)

注:■为产权关系者,表中、文中的称谓为受访者对其的称呼,字母及编号表示辈分关系。

民居大多是这样有前、后院的二进格局,具体情况仍需进一步考证。据郭家后人介绍,郭家大院最初的大门也在中间,为了能多住人,1910年代把门改到东侧。但后来,郭家的后人中有数人尚未成人便不幸夭折,风水先生认为改门影响了郭家风水,因此郭家人又将大门改建到了现在的位置。郭家大院的西侧是郭家人用8分菜地换的3分地大小的院子,在此曾养过牲口,也曾建过厕所。原来的东西厢房都比现在宽,民国时期翻建时,郭家大院东侧邻家房子的主人是房科(相当于房管局工作人员)。由于院子在哪、怎么盖都需要房科审批,邻居想要自己家的院子大一些,在审批时不同意郭家的建房申请,变相逼迫郭家的房子往西挪,因此东厢房被迫变窄。为了对称,郭家人只好将西厢房也变窄,由此建成了现存的规模。

从郭家大院上房(民国18年建)、临街房(民国20年建)、厢房(民国23年建)、西院临街(郭家后人讲为民国34年建)的建造时间上看,现在的郭家大院应是保持了民国时期的基本格局(见图3)。

从当时的使用方式上看,临街房中间为大门、过道,两侧为房,东边一间曾是供来访的亲朋好友留宿用的客房,西边一间曾是家中的磨坊。穿过过道(宽1.9m),进入院内,左右各有

厢房一间,厢房的北侧与倒座之间有2.8米的距离,为遮挡门外的视线,原设有一字型照壁,现已不复存在。东侧厢房放置杂物,西侧厢房曾是郭家在从事农业生产、商业经营时期,雇用的长短工、伙计等服务人员休息、就餐,以及收纳农具的场所。与厢房内(南)侧相连的另有左右各三间的厢房,中间原有隔墙及二门,遗憾的是目前门的结构样式已无可考证。由倒座、两侧厢房及隔墙所构成的空间是一个独立围合的单元,为家庭以外的人员活动及家庭生活辅助性物品的存在空间。内院正面为院落的核心建筑,即三开间面宽9米的正房(上房),中间一间开门,大门正对宅院的中轴线;东西两间各设窗,进入室内,中间与东侧一间由墙分割,隔墙中间开门;中间与西侧一间由木制隔门分割,中间设门。中间一间为堂屋,放置牌位、寿匾、条几、八仙桌、圈椅等,用于举办祭祀、节庆、婚丧嫁娶等活动,为家族精神活动的核心场所。两侧卧室为长辈居住:西侧为家族最长者居住的地方,是整个住宅的主卧室,住着老爷、老奶;东侧卧室为家族长子居住,住着大爷、大娘。上房北边两侧左右对称三开间的厢房面宽8.4米,左侧厢房南端的一间独立开门(曾经是郭家的厨房),中间一间开门,北边一间设窗。两房之间又有隔墙将其分为两室,北端一间为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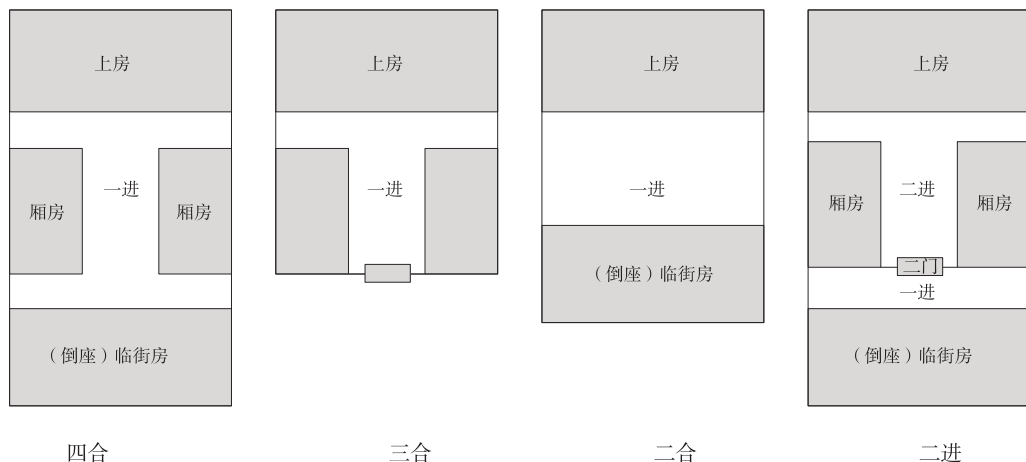


图2 传统四合院平面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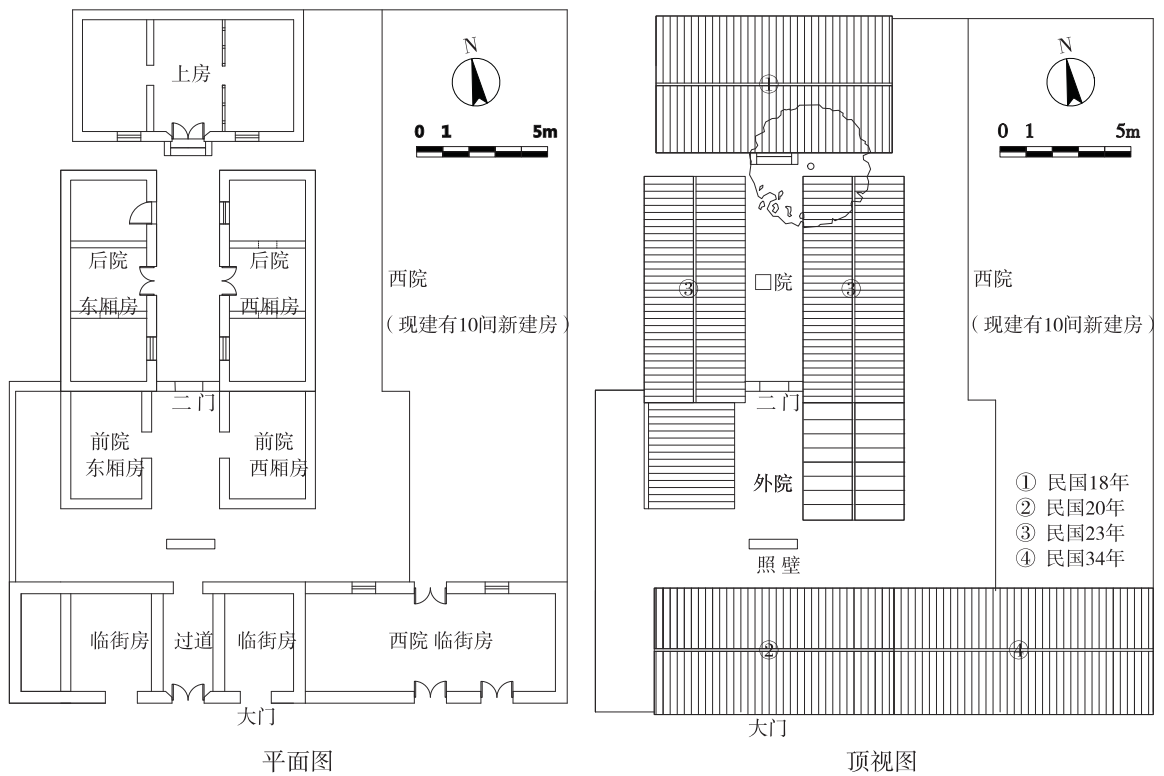


图3 郭家大院复原图

室,中间一间为堂屋,可以理解为现代意义上的一室一厅。右侧厢房中间一间开门,南北两间设窗。进入室内,中间一间与南北两间之间设墙开门,中间为堂屋,两侧为卧室,也可理解为现代意义上的两室一厅。厢房是已婚男丁及家人居住的地方,内院主要是家庭成员的饮食起居空间。据郭家人说,当时郭家的居住方式严格遵循了四合院按长幼次序居住的传统。但随着子女的成长及家庭成员的变化,根据家长的安排,也时有局部调整的情况。除此之外,郭家大院基本保持着大家族传统累世同居共财的复合使用特征。

三、郭家大院使用方式的变迁

然而,郭家大院并没有定格于其初建时的使用格局,随着社会环境和家庭结构的变化,其使用方式也在不断地发生着变化。

老爷(A)、大爷(A-a)及二爷(A-b)去世以后,三爷(A-c)开始掌管郭家在外面的生

意,四爷(A-d,以下以字母编号表示)掌管家中内务。A-d主张遵循传统,延续大家庭的共同生活方式,反对分家,在居住生活方面延续了按长幼次序各居其所的传统,全家人依然同灶共餐。只是由于人口增加、居住面积不足,将前院的东厢房改做厨房,将原来内院的厨房改为未出嫁的二姑居住(出嫁后搬出),打破了内外有别的局面。另外,A-a-1家在上房居住,A-a-2家在临街房居住(大门及过道公用),A-b-1家在内院西厢房居住,A-c家在西院临街房居住,A-d家在内院东厢房中间及北边一间居住,郭家的外甥一家在外院西厢房居住(后移居外地)。直至新中国成立初期,由于郭家人口不断增加,郭家人的居住方式由A-d不断调整。但基本延续了传统四合院住宅的使用方式,保持着大家族累世共财的使用特征。

新中国成立初期,按土地改革政策,郭家内院东厢房中间、北边一间及外院的西厢房被收为公产,外姓人开始入住进郭家大院,出现了杂

姓同居的状况。当时的郭家虽然没有进行实质性的分家,但已由大家庭分化成几个各自独立的小家庭,大院的使用方式也发生了变化。1950年代中后期,A-c家迁出大院,西院临街房转为A-d家使用,其他家庭基本维持了原来的使用状况。各家根据自己的生活需要,开始分灶单过,在院内临时性地搭灶做饭,到了冬天就把灶移到屋内。于是,传统四合院的生活秩序被打乱,各个房间的使用功能也更为复杂了。

之后,郭家在人口增加而居住空间不足时,各自在院落里临近自己房子的位置加建了厨房。A-a-1家、A-a-2家、A-b-1家分别在上房和东厢房之间的夹道里、大门西侧至西院临街的屋檐下、原来二门的位置各自搭建了厨房。A-a-1家还在上房的西侧加建一间居住兼做厨房的房间,A-a-2家还在内院东厢房至临建房之间改建了两间平房,临街房东面又加建了半间做居住用。2010年前后,为了方便老人使用,A-b-1-①又在内院临西厢房处加建了卫生间(见图4)。另外,郭家大院的临街房及外院东边改建的两间平房也外租他人作商业之用,其使用情况进一步复杂化,从以往

单纯的住宅发展为商住两用。曾经秩序井然的郭家传统的四合院,随着内部不断的加建、改建,最终发展成了现在的大杂院格局。

如今,郭家大院周边与之有着相同历史境遇的传统民居已不复存在,遗留下来的只是一些零星的单体建筑。2003年,郑州市政府下令保护郭家大院,将院落纳进“书院幽荷”小游园,成为该园的一部分,对其周边环境也进行了改造。2013年,因郑州地铁二号线的过境问题,再次将郭家大院推向舆论的焦点。最终,经各方努力,建设部门对郑州地铁2号线疏散用地方案做了一定调整,避开了郭家大院,使郭家大院得以原地保存。如今,郭家大院已成为一个反映该片区传统民居及居民居住生活变迁情况的孤例。

四、结语

在历史延续和文化遗产的过程中,城市遗迹是体现历史长河中一点一滴积累起来的历史记忆,它不仅存在于有着重要价值的历史建筑和历史遗迹中,也遗存于传统的民居建筑中,它不应仅定格于文献记载之中,也应存活于居民的日常生活之中。对于郑州郭家大院,从空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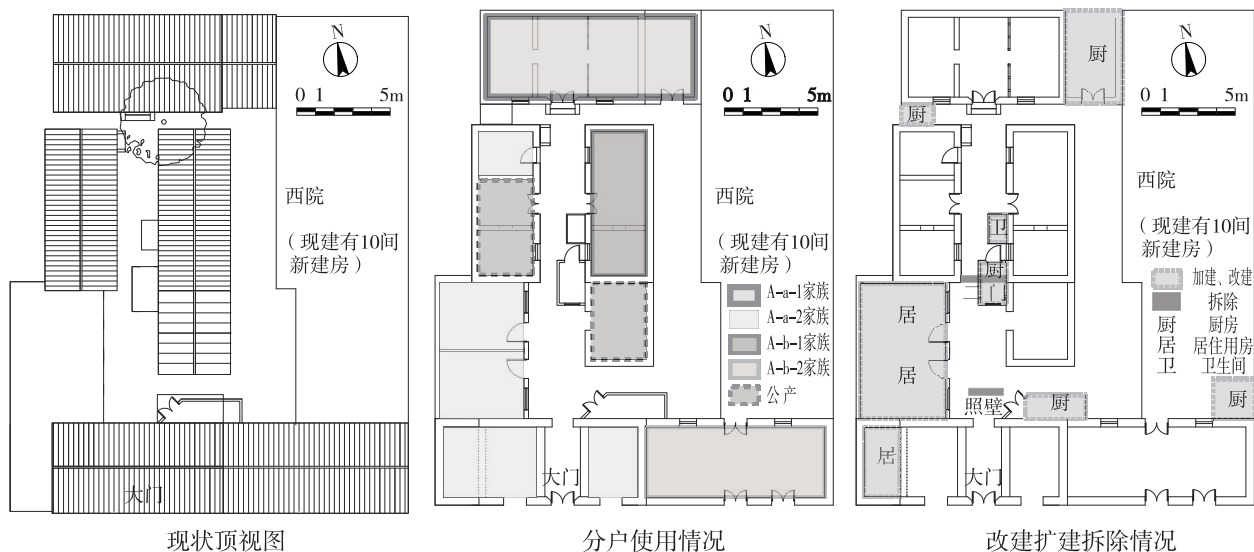


图4 郭家大院现状图

形态看,由上房、临街房、东西厢房围合而成,是由两厢房北端山墙中间设置的二门和隔墙分割为两个独立空间的二进式合院民居。新中国成立以前,郭家大院是由家长调控来保持、延续大家族累世同居共财的传统民居。随着社会环境及家庭结构的变化,大院也在不断地发生变化,曾经长幼有序、上下有分、内外有别、井然有序的传统四合院住宅内部不断地加建、改建,院落及房屋的使用方式一步步复杂化,最终发展成了现在的大杂院格局。郭家大院曾多次卷入社会发展、城市建设的洪流,几经周折最终得以原地保存。郭家大院无疑已成为反映郑州历史街区中传统民居及其居民居住使用方式的最真实载体,不但包含了居民自身家族的记忆,同时也承载着有着相同历史境遇和生活经验的人们的集体记忆,是郑州市城市历史记忆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经历了郭家大院留存问题争论之后,留住城市记忆、传承城市历史文化、保持城市特色、加强城市居民的认同感和凝聚力、塑造城市精神,已成为社会各界对文化遗产价值新的认识与肯定,也对文化遗产保护提出了新的要求。然而,错综复杂的所有制关系、现代生活方式与传统居住空间的矛盾等,仍是制约传统民居存续的现实问题。随着社会的发展、物质条件的改善、人们思想意识的发展进步,传统民居如何

焕发出新的活力,如何创新出适宜的传统民居的存续形态,仍将是社会各界持续关心并为之共同努力的方向。

参考文献:

- [1] 朱蓉,吴尧.城市·记忆·形态:心理学与社会学视维中的历史文化保护与发展[M].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2013:12.
- [2] 张海燕.城市记忆与文化认同[C]//田根胜,黄忠顺.城市文化评论:第4卷.广州:花城出版社,2009:96-104.
- [3] 王影.郑州“最后的四合院”亟待保护[N].郑州日报,2011-05-26(05).
- [4] 王杰(文),张翼飞(图),马健(图).郑州最后的四合院[N].郑州晚报,2007-10-24(C04-05).
- [5] 沈翔.郑州城最后的四合院[N].东方今报,2013-05-24(A14).
- [6] 李悦.郑州市书院街历史街区更新策略研究[D].郑州:郑州大学,2013.
- [7] 王大艳.郑州市老城区传统街巷空间探析[D].郑州:河南农业大学,2012.
- [8] 袁媛,徐维波,韦峰.居住性历史街区保护更新的规划探索:以郑州书院街为例[J].华中建筑,2012(9):140.
- [9] 王其明.北京四合院[M].北京:中国书店,1999:5.



引用格式:王雪洁,周雪,肖旺群.机械产品形象系统设计研究[J].郑州轻工业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17(3):103-108.

中图分类号:TB472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9/j.issn.1009-3729.2016.03.017

文章编号:1009-3729(2016)03-0103-06

机械产品形象系统设计研究

Study on the design of mechanical product image system

王雪洁¹, 周雪¹, 肖旺群^{1,2}

WANG Xue-jie¹, ZHOU Xue¹, XIAO Wang-qun^{1,2}

1. 安徽工业大学 艺术与设计学院, 安徽 马鞍山 243032;

2. 华东理工大学 艺术设计与传媒学院, 上海 200237

摘要:产品形象系统是企业形象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机械产品形象系统设计是一个从局部到整体逐步建立的过程,可以从产品周期、产品家族、时代发展三个维度考虑。产品周期维度是产品形象系统构建的基本维度,应在设计理念与策略、造型、人机界面、工程规范、宣传销售等方面对产品形象进行统一而连续的塑造。随着企业的不断发展,产品形象系统不断完善,这时的产品形象则要彰显产品家族特征,通过对机械产品的模块化、通用化和标准化设计,最大限度地提高机械产品的设计参数和生产过程的可重复使用性,以体现产品的稳定性、一致性和连续性。随着时代的发展,机械产品朝着智能化、模块化、个性化、多功能和节能环保方向发展,机械产品形象系统设计理应在延续产品稳定性和不断创新的平衡中不断地发展完善。

关键词:

产品形象系统;
企业形象系统;
产品周期;
机械产品

收稿日期:2016-03-21

基金项目:安徽省教育厅人文社科重点项目(SK2015A384);安徽省专业综合改革试点项目(2015zy015);安徽高校人文社科重点项目(SK2016A0165);马鞍山市科技计划项目(2013Y7-1)

作者简介:王雪洁(1977—),女,安徽省宿州市人,安徽工业大学讲师,硕士,主要研究方向:工业设计、传统工艺。

通讯作者:肖旺群(1978—),男,安徽省望江县人,安徽工业大学副教授,华东理工大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高端装备产品形象系统设计、感性设计。

近年来,随着国内制造业的迅速发展,机械产品在技术方面与国际领先企业的差距正在缩小。2015年全球工程机械制造商50强排行榜中,中国有8家企业上榜,前10名中,中国企业有2家^[1]。但是,国内大多数机械企业在过去只重视工程技术创新,忽视了设计体系的构造和均衡发展,这导致其所生产的机械产品无法构建良好的品牌形象。品牌形象是企业发展的重要前提,在很大程度上制约着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以产品为中心,通过系统化的分析,对产品进行全方位的设计,使其构成独特且具有延续性的设计风格,可塑造企业的品牌形象,而辨识度高的产品形象能极大地提升产品的竞争力与附加值,增强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在从“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的战略目标实现的过程中,立足于中国企业实际发展状况,进行深入的产品设计研究,并建立一套与之相适应的、与我国制造业相匹配的产品形象系统,已成为当今我国制造业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之一。本文拟通过对企业发展不同阶段的考察,从产品周期、产品家族、时代发展三个维度构建产品形象系统理论模型,以供学界参考。

一、PIS 理论研究概述及存在问题

通过对各类文献资料的研究分析,可以了解到产品形象系统(PIS)在概念、理论归宿、总体构成及评价系统等方面的研究已经取得了初步成果。比如,李良^[2]在《工程机械产品识别设计策略研究》中运用形态语义学、认知心理学等理论,阐释了产品意象、产品识别的概念及其关系,提出了产品造型识别特征群这一概念;张凌浩^[3]在《基于基因遗传理论产品形象的延续与更新方法研究》中,对生物学中的现代遗传及变异理论与产品形象延续及更新的关联性进行了研究,为产品形象创新与品牌提升提供了一种新方法;车承刚等^[4]在《工业设计产

品形象系统建构之研究》中,运用“期望价值理论”建构出了基于体验经济概念下的产品识别系统;杨道陵^[5]在《产品形象系统 PIS 建构脉络》中,叙述了产品形象识别系统建构的4个阶段,即企业核心理念与产品策略研究、产品线形象框架结构研究与建设、产品模板系统与设计指导、PIS 管理体系的制订与实施。徐娟燕等^[6]在《基于 PIS 的焊接系列产品造型设计研究》中,从产品形象的理念建立和视觉设计两方面对焊机、焊枪和焊帽3款产品进行了系列化造型设计,为同类设计提供了参考;张久美等^[7]在《基于产品形象的大型机电产品外观视觉形象建构》中,通过理念识别、核心要素分析、造型特征设计等,倡导将产品形象的设计方法融入机电产品设计中,以塑造并提升大型机电产品的整体外观视觉形象。

借鉴相关研究成果,我们可以从狭义和广义两个方面对产品形象作如下理解:从狭义上讲,产品形象是产品在用户群中的视觉形象,是产品的视觉外观,是暂时的;从广义上讲,产品形象是产品在整个生命周期内的视觉与知觉上产生的、有关产品印象的集合^[8],产生这些印象的主体除了使用者之外,还包括决策者、潜在购买者、销售者等,是他们对于产品的视觉形象、使用体验、引发的联想等经过大脑分析处理后的形象,是对产品的一个综合的认识和印象,是持久的。

目前,学术界对产品形象系统的研究虽取得了一些成果,但也存在一些问题:缺乏根据企业发展不同阶段对产品形象系统进行理论模型构建,PIS 构建中仍存在大量企业形象系统(CIS)理论的影响,缺乏以产品为核心的宏观系统的研究。

根据现代系统科学,事物都是以系统的方式存在的,系统都是由相互联系的元素所组成的、具有某些特定功能的有机整体。因此,产品形象也是一个由产品形象相关元素构成的有机

系统,各元素彼此相互依赖、相互影响。从发展的眼光来看,随着企业的不断发展,产品形象系统设计将会具有不同的内涵,这也是工业设计从单纯产品型向策略型转变的重要体现。

二、PIS 与 CIS 的关系

随着市场的不断发展,机械企业需要面对越来越同质化的产品竞争,部分企业开始注重企业形象的塑造,国外的 CIS 开始在国内流行起来。但在推行 CIS 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问题,如更偏向于运用图像符号来表现意义和形象思维,没有建立起连续的产品形象,导致识别意向模糊,无法传达具有高度一致性的企业文化内涵;再如,企业文化理念与品牌的塑造需要长期累积,而部分处于发展初期的企业缺乏资金,急于求成,眼光短视,对发展 CIS 兴趣不大^[9]。对于国内大多数企业而言,PIS 更具实效性,也更加符合我国机械企业的实际情况。对 PIS 与 CIS 之间的关联性进行分析,有助于对 PIS 的深入研究及其理论模型的建立。

PIS 设计是产品的内在品质形象与外在视觉形象的统一,是塑造 CIS 的重要途径。PIS 的主体是产品,CIS 的主体是企业;产品形象的传播方式是产品的塑造,企业形象的传播方式是视觉识别;PIS 的目标是针对特定的目标人群建立起稳定的、具有延续性的产品品质形象,CIS 的目标是针对特定的市场树立起良好的企业形象。与市场的基本单元用户直接、密切接触的是企业的产品,所以要想树立起良好的企业形象,首先要塑造具有一致性和连续性、有品质的产品形象。PIS 是 CIS 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其子系统。PIS 从产生起便伴随着设计策略,包含着企业文化内涵,在企业所处的具体阶段进行相应的产品形象塑造。

PIS 具有高度的提炼性和继承性,它为企业形象的塑造提供了一个新思路,也更符合企

业发展的实际。CIS 的建立不一定是从整体到局部的发展,也可以是从局部到整体的扩张,是一个庞大而又持久的工程。从局部到整体的扩张,就是要根据各子系统的重要性区分优先级。PIS 是 CIS 构建的主要方面,其存在和发展决定或影响着其他矛盾的存在和发展,因此对于发展初期的企业来说,应优先建立 PIS。在 PIS 构建的过程中,应对 CIS 进行信息反馈,使之不断发展完善。CIS 的发展指引着 PIS 的方向,PIS 也会在时代的浪潮中优胜劣汰,不断完善,将信息反馈给 CIS,避免 CIS 的发展出现偏差。

三、机械产品形象系统理论模型构建

改革开放 30 多年来,伴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与需求的不断增长,我国机械行业迅速成长,市场对于机械产品品质的要求也越来越高。为了获得快速发展,我国机械行业在发展中一度偏重于机械产品的技术性能,而忽略了产品形象系统的设计。目前我国经济正处于“三期叠加”(增长速度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相重合)的特定阶段,机械企业应根据市场变化作出相应调整,除了更新技术外,还应建立起稳固、高品质的产品形象,这对于产出价值最大化具有战略意义。相对于普通的日常消费品,机械产品面向专门的行业市场,因此在设计、生产、销售、服务等方面应与日常消费品有所不同。

对于机械产品形象系统设计而言,应从全局着眼,树立整体观念,不断优化目标,使系统功能得到最大程度的发挥。将机械产品形象系统看成一个开放系统,结合机械产品的特点,从整个品牌发展的角度展开分析,可知:企业在刚开始构建产品形象系统阶段,产品形象系统的构建主要依附于产品研发生产阶段的各个环节,随后在整个产品周期中,产品形象开始在中发

挥作用;随着企业的不断发展,为了占领更多的市场,产品的种类在不断地增加,形成产品家族,这时的产品形象主要体现在产品家族中各成员的共同表达,传达出企业文化内涵,以便与其他企业产品区分开来。时代在变迁,在企业不断发展成熟的过程中,应顺应时代的发展趋势。这时的企业形象系统构建已较为完善,影响产品形象的主要因素是时代提出的新要求。

在机械企业发展的初期,产品形象系统是一维的,企业往往通过产品周期的各个环节来对产品形象进行塑造。当企业具有一定的研发能力、产品占有一定的市场份额时,这时的产品形象系统就达到了二维,可以着手产品家族设计,以增大市场占有率。在产品家族中,每一款产品都有自己的生产周期,有些是要根据市场需求进行调整的,有些则可以互相借鉴和通用,这时的产品形象是以家族特征的形式表现的,更加稳定。随着时代的发展,产品形象系统发展成了三维,要考虑到科技、社会都在不断发展,新的趋势、新的技术、新的文化的产生势必会带来新的需求,这将影响到产品周期的每一环节。适应新的需求,产品形象系统中适合时代要求的元素被保留下来并得到发展,不适应时代要求的元素则被淘汰出局。在产品家族量变的基础上经由新的刺激因素会产生质变,存留下更适合时代的产品,这时候的产品形象更深入人心,存在也更加久远。下面分别从产品周期、产品家族和时代发展三个维度构建机械产品形象系统理论模型(见图1)。

1. 产品周期维度

在机械产品形象系统设计中,一款产品的整个生产周期都伴随着产品形象的构造。产品周期维度是研究产品形象系统构建的基本维度。周期中的每一环节都影响着产品给人带来的视觉刺激、使用体验、情感联想等,对于产品形象品质的树立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在产品形

象设计过程中,应保持统一性和连续性,将单个的产品设计开发秩序化。下面从产品周期中对产品形象塑造产生影响的几个环节进行探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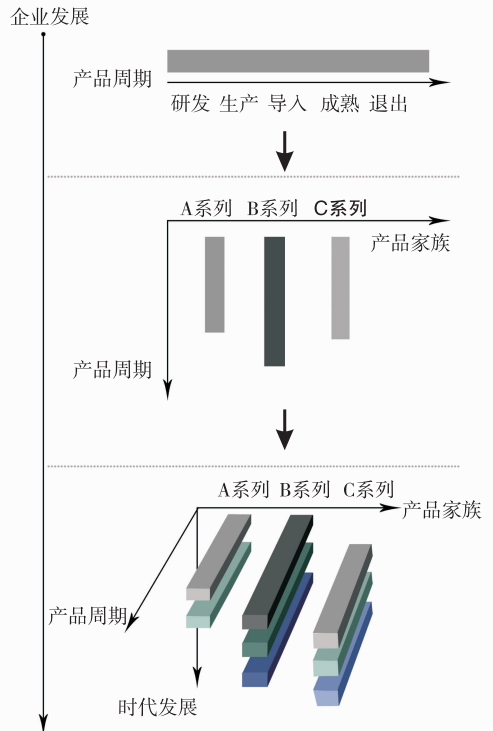


图1 机械产品形象系统理论模型构建

(1) 设计理念与策略

通过对市场、用户需求和企业自身定位的分析,明确机械产品所应具有的功能、产品的风格与所要传达的核心理念。这是整个产品形象设计的指导思想和实施纲领,用户最终接受的企业理念、企业精神和品牌观念都是在这一阶段确立下来的。由于机械产品的研发和使用周期相对较长,产品形象设计的理念与策略应具有前瞻性,既要使其在较长时间内不会被用户所抛弃,又要与市场上其他同类产品有差异化区分。

(2) 造型设计

机械产品的造型设计包括产品的形态、色彩和材质。机械产品首先必须满足用户对其技术性的要求,但不能忽视其造型。产品造型将直接从视觉上影响到人们的心理,而这种潜在的心理因素往往会影响到产品在人们心中的印象。应

根据产品所要传达的理念来对产品造型进行设计,如大型机械,形态上应庄重,力度感要强,因为形态美可以通过视觉感染力来消除人们对于大型机械的恐惧,以增强其安全感;若是强调产品的高效率,产品形态设计上则应简洁、轻巧、流畅。产品色彩也应与产品设计理念一致,大部分机械产品在色彩上应偏向于冷静、沉稳,这是由机械产品主要应用于工业生产而非日常生活的特点所决定的;某些产品色彩应比较明快,以打破沉闷的感觉,但配色应和谐。机械产品工作环境特殊,材质是保障机械产品的安全性能和施工性能的重要影响因素。机械产品所使用的材料多为钣金件,在与人接触的界面应尽量采用具有亲和力的材质。通过对形态、色彩和材质进行设计和整合,从视觉上对用户进行刺激,可引发用户的联想,从而形成对产品的整体视觉形象。

(3) 人机界面

人机界面是机械产品直接与人作用的界面,除了使用界面外,还包括安装界面和维修界面。随着机械行业的拓展,机械产品的工作环境越来越复杂多变,其操作界面应符合使用者的认知习惯和生理习惯,以减轻其认知负担和操作负担。人机界面的设计除了为用户提供精确高效的操作界面外,还应在复杂恶劣的施工环境中,做到“以人为本”,注重产品的安全性和操作舒适度、方便性、无污染等因素,尽量减少机械产品自身和外部环境对人造成的不良影响。这些需要从细节着手,而细节往往是产品品质的重要体现。人机界面应从体验入手,对用户进行知觉和思维上的刺激,使之产生更深层次的产品联想与印象。从用户体验来说,获得宜人的、愉悦的用户体验,是决定购买某一产品的关键因素。即便部分机械产品的购买决策权与使用权相分离,用户体验也是影响决策者购买行为的重要因素。

(4) 工程规范

机械企业的工程规范在机械产品形象的品质塑造过程中起重要作用。机械行业的标准可

以分为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和企业标准三个等级。依据标准化准则,产品的某些零部件、设备及能源等的结构形式、尺寸、性能等,应按照国家与行业统一的标准选用;产品的人机界面、说明书等所包含的符号、计量单位、名词术语等也应符合标准。因为这些标准影响到产品形象的专业化、在安装维修的过程中的方便性和使用的可靠性。

(5) 宣传销售

机械产品的宣传多采用行业展会、专业刊物广告等方式进行,一些大型行业设备,一般用业务员拜访企业的方式进行销售。在宣传销售方面,产品的展示、包装、宣传册等的设计风格应与产品理念一致,以建立起统一的、整体的产品形象。

此外,在对机械产品的维修、保养、软件升级,以及产品使用寿命终止的后续处理中,企业若能给用户以周全的服务,会对产品形象品质的提升具有推动作用。

2. 产品家族维度

一款产品在特定市场中成功地建立起高品质的产品形象,还不足以形成稳固的产品形象系统,会不断有其他企业新的同类产品对其进行冲击。产品家族的建立是中长期的产品形象系统建造阶段,如在没有品牌影响力的情况下就开始着手家族化,其风险将是巨大的。不同层次的市场具有不同的需求,机械产品的家族化就是要覆盖更广的市场,满足不同市场的个性化需求。建立产品家族的根本目的是为了满足不同市场的多样化和个性化需求,通过提供不同的产品种类开发潜在市场。产品家族的核心是模块化、通用化和标准化,最大限度地提高设计参数和生产过程的重复使用性,以降低成本,缩短开发周期。需要注意的是,产品家族化的主要目的在于覆盖更广泛的市场需求,并使产品具有家族识别性,而不仅仅是为了降低产品开发成本。产品家族的每一款产品在自身的产品周期中,都要融入产品家族的通用特征,通过系

列产品来体现产品形象的稳定性、一致性和连续性。在一段时期的机械市场中,标志性的产品家族特征会给消费者带来巨大的视觉冲击,留下深刻印象。而强化产品形象系统,可以加强机械产品与用户的情感联系。

3. 时代发展维度

《连线》前主编凯文·凯利在《机器想要什么》一文中提到:“在技术的进化过程中,我们能看到与生命进化相同的趋势——走向普遍化、多样化、社群化和复杂化。”^[10]随着时间的推移,机械产品的DNA逐渐形成,从而逐渐进入机械产品形象系统的长期塑造阶段;通过机械产品的更新换代将产品的特征稳定地遗传下来,不断繁衍。人们对于产品的使用需求是不断发展变化的,一旦习惯了某一款产品并达到“专家”级的熟悉度时,便会产生更高的要求 and 期望^[11]。同时,在不同的时代,科学技术、经济状况、文化潮流都在不断地发展演变,机械产品形象系统作为一个开放的系统,会受到这些因素的影响。依据系统固有的开放性特性,产品形象系统设计应重视并善于利用这些外部条件,兼顾全局,努力完善系统自身。机械产品形象系统一旦具有了遗传性,这种遗传性将指引产品家族特征的建立和单个产品生命周期中产品形象的塑造。在实践中,对应不同的时代,机械产品形象系统适应时代的部分会作为体系发展的基因而保留并遗传下来,不适应的部分则会遭到淘汰,使得整个机械产品形象系统不断优化,并与变化着的外部环境相适应。就像遗传基因会发生突变一样,产品形象中遗传物质也会产生不稳定传递,使产品形象特征出现新的变异,影响产品家族的进化,而“基因”突变是创新的源泉。随着时代的发展,机械产品正朝着智能化、模块化、个性化、多功能和节能环保方向发展,机械产品形象系统理应在保持产品稳定性和不断创新的平衡中不断发展完善。

四、结语

机械产品形象系统塑造是一个复杂的系统

工程,该系统最显著的特征是整体性。系统的效能不是其构成元素的功能之简单叠加,而是依据所处的实际环境情况有机地组织起来,使系统在复杂的相互作用中表现出统一性和协同性,从而使系统整体性功能达到最大化。根据国内机械企业的实际情况,逐步建立起产品形象系统,使产品价值最大化地呈现出来,这对于在激烈的国内和国际市场竞争中树立稳定的、突出的、公众可信任的产品形象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参考文献:

- [1] 中国工程机械商贸网. 8家中企上榜 Yellow Table 2015 工程机械 50 强 [EB/OL]. (2015-07-22) [2016-02-12] <http://news.21-sun.com/detail/2015/07/2015072210494315211.shtm>.
- [2] 李良. 工程机械产品识别设计策略研究[D]. 长沙:湖南大学,2013.
- [3] 张凌浩. 基于基因遗传理论产品形象的延续与更新方法研究[J]. 包装工程,2007(8):170.
- [4] 车承刚,冯永华. 工业设计产品形象系统建构之研究[R]. 台中:行政院国家科学委员会东海大学,2007.
- [5] 杨道陵. 产品形象系统 PIS 建构脉络[J]. 装饰,2012(5):133.
- [6] 徐娟燕,陈颖捷. 基于 PIS 的焊接系列产品造型设计研究[J]. 机械设计,2015(1):126.
- [7] 张久美,胡光忠,徐刚. 基于产品形象的大型机电产品外观视觉形象建构[J]. 机械设计,2015(2):123.
- [8] 杨颖,周立钢,雷田. 产品识别在品牌策略中的应用[J]. 包装工程,2006(2):163.
- [9] 晏群,肖旺群. 关于产品形象系统(PIS)理论的研究与探讨[J]. 中国包装,2009(10):74.
- [10] 凯文·凯利. 科技想要什么[M]. 熊祥,译. 北京:中信出版社,2011:102.
- [11] 张乐乐. 从感性工学角度研究产品形象识别系统的显形[D]. 上海:上海交通大学,2007.